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学友文库

清绝帝制

eBOOK
网络资源 免费下载

清绝帝制

努尔哈赤崛起

清朝是由满族贵族建立的我国历史上最末的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帝国的前身是女真族的著名首领努尔哈赤所建的“大金”汗国。为了同辽、宋时代女真族完颜阿骨打建立的金国相区别，历史上把努尔哈赤创建的金国称为“后金”。努尔哈赤实际上是清王朝的奠基者。

满族是我国历史上长期居住在“白山黑水”之间广大地区的一个古老民族。它的前身“女真”这个族名始称于五代时期，此前在隋唐时期称“靺鞨”，南北朝时期称“勿吉”，两汉时期称“挹娄”，周秦时期称“肃慎”。从五代至明末崇祯，沿称女真族一直未变动，改称“满洲”（满族）是明崇祯九年（1636年）。努尔哈赤是这个民族的一位杰出人物。

明王朝统治下的女真人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东海（野人）女真三部分。努尔哈赤自称是明永乐年间任建州左卫指挥使猛哥帖木儿（又称孟特穆）的后裔，姓爱新觉罗，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出生于建州左卫苏克素护部一个女真族奴隶主的家庭，祖父觉昌安（又名叫场），父亲塔克世（又名他失），分别担任过建州左卫都指挥、建州左卫指挥。努尔哈赤从小聪明好学，身体健壮，喜欢阅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练就一身格斗武艺。他10岁丧母，继母为人刻薄，在家倍受虐待，于18岁娶妻之后，便被迫与父分居，小家庭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为了生存，他曾在草原牧羊，上长白山采参，跑抚顺城贩马，还一度投到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麾下当兵，真可说是尝遍了生活的辛酸。不过，血的洗礼却锤炼他钢铁般的意志，冷酷的现实反倒激发了他振兴家族的雄心，于是这个中等身材，大耳凤眼、行动敏捷、斗志顽强的女真族英俊青年，顺应明末历史发展的趋势，走上了统一女真各部，武装割据东北，问鼎中原的道路。

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一件影响努尔哈赤一生的重大事件发生了，这一年春天明辽东总兵李成梁，偏信一名叫尼堪外兰的女真部落首领的挑拨，采取残酷的方式将他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擒杀了。努尔哈赤对此极为愤慨，他写信责问明朝政府说：“祖、父无罪，何故杀之？”明廷经过调查，纯属冤狱，只得承认是“误杀”，并命努尔哈赤沿袭父职任建州左卫指挥，还赠送30匹马，发给30道敕书进行安抚。上述事件的发生对努尔哈赤的生活道路的影响是巨大的，袭任父亲的官职，使他在东北地区女真各部间开始知名；祖父、父亲一贯忠于明朝却落得个惨死，使他与明室产生了对立情绪，暗暗下决心要与朱明对抗了。不过时年25岁的努尔哈赤既明智又有远见，他深知区区30匹马、30道敕书，以及祖父、父亲遗留下来的“十三副铠甲”，是根本不足同“庞然大物”明朝翻脸抗衡的，于是便把复仇的矛头指向陷害祖父、父亲的罪魁尼堪外兰，借机起兵，替祖父、父亲报仇。明万历十一年五月，努尔哈赤率部进攻尼堪外兰，尼堪外兰战败，躲进明营。努尔哈赤经过3年时间与明朝守边将领交涉，获准派部下赴明营杀死了尼堪外兰。

自此以后声威大振，努尔哈赤用了30年的时间，通过采取远交近攻，“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报，逆者以兵临”的策略，统一女真各部，“环满洲而居者，皆为削平，国势日盛”。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接受部下尊号称汗，建国大金，年号天命，隐喻有天命所归的意思，还将赫图阿

拉城（今辽宁新宾县永陵乡）改名兴京，定为国都。随着努尔哈赤在东北割据的军事实力的扩大，以及明王朝统治势力的进一步衰落，从此他公开同明朝决裂，把攻明提上了日程。

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天命三年），恰是努尔哈赤六十大寿，这一天兴京后金的宴殿上，红烛将大厅照得如同白昼，努尔哈赤的儿子们频频向他敬酒。酒过三巡，努尔哈赤郑重向众宣布：“我已下了决心，今年内一定要征讨大明！”同年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在兴京“告天”誓师，宣读了与明朝结有“七大恨”的讨明檄文，然后披甲上马，亲率步骑兵马两万，直扑辽东明军边防重镇抚顺。当时守卫抚顺的明将是李永芳，在后金军队发动了一次进攻后，便大开城门出降了。七月，后金兵远道奔袭猛攻清河城，经过一场激战，明守城副将邹储贤在城破时力战身亡。

抚顺、清河被后金兵攻陷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北京，神宗皇帝以及众臣“举朝震惊”，决定对后金发动一次惩罚性的战争。经过调兵、点将、筹饷和置办武器等一系列准备，神宗任命兵部左侍郎兼右金都御史杨镐经略辽东，特赐允先斩后奏尚方剑一口，率领47万大军向后金杀去。杨镐统帅的明军能投入战场实战的人数仅9万，兵分四路，合击的目标是后金的都城赫图阿拉（兴京）。努尔哈赤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即集中优势兵力，然后各个击破的战法，指挥八旗劲旅分头迎击。

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后金天命四年）三月，明军和后金兵在抚顺以东，位处浑河上游与苏干河合流的萨尔浒地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从三月初一开始，这次鏖战一共进行了5天，明军方面三路大军被歼，一路大军被吓跑，将士仅死者即达6万余人，而后金方面，据说死亡人数不到200人，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之战”，它以后金大获全胜而结束。以此战役为转折点，在东北战场上努尔哈赤的铁骑，由防御转入了主动进攻。相继攻占东北重镇沈阳和辽阳，随后把后京都城迁往沈阳，并把沈阳改名盛京。

努尔哈赤攻明的最后一战发生在明熹宗天启六年（1626年，后金天命十一年）正月十四日，努尔哈赤亲率13万大军征明，十七日兵渡辽河，二十三日前锋抵达明军山海关外前卫重镇宁远城下。就在这里，他遇上了强劲对手，“慷慨英发，气可吞胡”的一代名将袁崇焕。努尔哈赤致书袁崇焕许以高官厚禄劝降，遭到严辞拒绝。从二十四日清晨起，后金军对宁远发动猛攻，袁崇焕命部下发西洋大炮还击，雨点般的炮弹落地开花，后金兵被打得人仰马翻，死伤惨重，此外，明守将施放弓箭、擂石兼抛火药包，矢石与火力直压得后金兵抬不起头来。空前的恶战连续进行了3天，努尔哈赤本人也被炮火击伤，二十七日被迫撤离宁远，“大怀愤恨”退归沈阳。

努尔哈赤此次攻明在宁远受挫，身心均受到严重的损伤，加之年岁已高，同年七月，他突患毒疽（音 ），不得不遵医嘱前往汤泉疗养。八月病情恶化，死在回盛京途中距沈阳40里的 砮砮（音 ài dài）堡。终年68岁

皇太极借刀杀人

明天启六年（1626年，后金天命十一年）八月，努尔哈赤病死后，他的第八子皇太极，以军功、谋略及个人威望均在众兄弟贝勒之上，被推举为继承人。同年九月，皇太极祭一盟誓即后金大汗位，并宣布第二年为天聪元年。

他就是 10 年后改金为“清”、改女真为“满洲”的大清开国皇帝清太宗。

皇太极像努尔哈赤一样骁勇善战，但在谋略上却高他父亲一筹。先借袁崇焕之剑斩毛文龙，随后又借明崇祯之刀杀袁崇焕，巧施妙计除敌手，这便是皇太极一手导演的“杰作”。

毛文龙是明末杭州籍的抗金将领，原是明东北边将李成梁的部下，后在广宁巡抚王化贞手下担任军职。后金努尔哈赤攻占辽东时，他下海占据了辽东沿海岛屿，从逃散的辽民中选招数万士兵，多次袭击后金后方，为明朝立下汗马功劳，对后金军的西进、南下，起到了一定的牵制作用。而后金士兵不习海战，加上渡海船只缺乏，对毛文龙部则无可奈何。因此明朝皇帝很看重毛文龙，一再封赏提职，官居总兵却挂将军印。对这些皇太极一一看在眼里，忧在心头。至于袁崇焕，皇太极当然记得父亲兴兵以来，首次受重创是在袁崇焕坚守的宁远城；自己即汗位后，率大军进军辽西，宁远、锦州之战，后金军威受挫，就是因为面前屹立着一个袁崇焕。皇太极心中对毛文龙和袁崇焕的痛恨，达到了咬牙切齿地步，经过反复思考，一个“借刀杀人”巧除敌手的构想，很快在皇太极头脑中形成。

原籍是广东东莞的袁崇焕，明万历年间中进士，本来是个文人，但在明东北边防吃紧之时，心思报国，单骑出山海关考察形势，自请守辽，筑宁远城（今辽宁兴城），并在宁远、锦州地区，先后取得重挫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两次胜利。就在他宁锦之战一周年之际，新登帝位的明思宗朱由检（崇祯皇帝），于崇祯元年（1628 年，后金天聪二年）七月十四日在北京召见了。崇祯问这位新任命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的将领说：“女真人作乱已 10 年，东北大片的疆土陷于敌手，你不辞长途跋涉应朕的召见，有什么好的建议与打算要讲吗？”袁崇焕回奏道：“如果皇上绝对信任我这个臣子，并给我以全权，我保证在 5 年之内，平定作乱的女真人，收复整个辽东失地。”崇祯高兴地称赞：“5 年内平定女真作乱，到时朕一定不吝封侯重赏！”接见中间，崇祯曾退到别室休息，给事中许誉卿担心 5 年收复辽东的保证兑现不了，小声地请袁崇焕谈一下他复辽的具体计划。袁崇焕颇不耐烦地说：“看到皇上因辽东事焦虑不安，我说 5 年内能复辽，不过是为了安慰一下皇上罢了，你又何必钻牛角尖呢？”许誉卿听后马上面色严肃起来；“当今皇上是很英明的，你怎么能这样随便许愿呢？5 年到期你兑现不了许下的诺言，你怎么办？”直到此时袁崇焕才突然感到失言了，他一言既出，就有如泼出去的水，覆水难收啊！袁崇焕就是带着“后悔不迭”的心情，匆匆赶回到了山海关宁远前线。

皇太极对明的情报工作是出色的，崇祯同袁崇焕的那番谈话皇太极很快就知道了。他审时度势，觉得这将是实施他“借刀杀人”，除掉自己眼中钉，肉中刺的敌对强手的大好机会，于是在明崇祯二年（1629 年，后金天聪三年）正月，主动给袁崇焕写信提出明金和谈，企图借袁崇焕之手先除掉毛文龙，以解决日后南下征明，毛文龙在身后牵制之忧。

正如皇太极所料，袁崇焕求和的心理是迫切的，他深知上一年向崇祯许下的“5 年复辽”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幻想通过跟皇太极和谈，诱使后金退还已被攻占的辽东。经过皇太极与袁崇焕之间，信使的多次往返，公开或秘密的几度和谈，皇太极“佯许还辽”，“使杀文龙”，终于得到袁崇焕的“答书密允”，袁崇焕萌动了对毛文龙的杀机。明崇祯二年（1629 年，后金天聪三年）六月，袁崇焕借前往辽阳前线视察之机，亲率一支由水手和甲士

组成的小分队，渡海来到毛文龙所在的海岛营寨，他以慰问为名向毛文龙的部众发放了 10 万两饷银，并在毛文龙的陪同下检阅军队和发表讲话。许多听者都被袁崇焕慷慨激昂的演说感动了，讲台下一片涕泣声。突然袁崇焕的话锋一转，面向站在身旁的毛文龙列举了 12 项该问斩的罪状，随即对环列自己左右的亲兵一声大喝：“还不给我动手！”一名手捧崇祯所赐尚方宝剑的魁梧甲士，乘毛文龙正惊愕不备，挥剑将他斩于阅兵台前。崇祯帝在接到袁崇焕斩毛文龙的奏报后，十分震惊，但事已至此，又正是要用他抵抗后金的时候，只好对他先斩后奏的行为表示赞同，不过在内心却从此对这位袁大将军产生了疑忌，因为当时的京师正盛传一种流言：毛文龙了解袁崇焕同皇太极不少和谈机密，毛文龙的被斩同袁崇焕杀人灭口有联系。

皇太极听到毛文龙被杀，高兴得了不得，不仅对袁崇焕只字不提“归还辽东”之事，并大胆构思了一个置袁崇焕于死地的反间计。就在毛文龙死后不到 4 个月，皇太极亲统 10 万大军，避开明军重兵设防的宁、锦一线，向山海关以西绕道内蒙，从喜峰口进入关内，接着攻占遵化，围攻蓟州，这一年的十一月中旬，后金兵的前锋进抵北京城下。袁崇焕在宁远闻警，从山海关调集所部，日夜兼程驰援京师，自蓟州即尾随后金军队，在十一月二十日，同皇太极指挥的八旗劲旅在北京德胜门外展开了一场血战，总算挡住了后金军队的进攻势头。不过，崇祯也一再拒绝袁崇焕提出让所部进城休息的请求，可见他对袁崇焕的疑忌正进一步加深。恰在这时，皇太极驻北京南海子的军营内，发生了一起由皇太极精心安排的事件，一名被俘的明廷太监逃跑了，这太监姓杨，在军营里曾装睡偷听到，后金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相互低声说道：“袁巡抚与大汗有密约”，攻占北京“此事可以马上成功”。他逃回紫禁城后有重大军事机密求见崇，非常肯定报告了袁崇焕“通敌”。崇祯生性多疑，他早对袁崇焕擅杀毛文龙的用心有看法，今再跟“通敌”一事联系起来，浑身不寒而栗，即以有要事相商召见袁崇焕、祖大寿等人，乘机命锦衣卫逮捕袁崇焕押入大牢，第二年八月，以叛国罪将袁崇焕凌迟处死。据目击者说，当时刑场围观的群众恨透了卖国贼，袁崇焕处死后人们争食其肉。其实这是一桩大冤案，直到清乾隆修编国史时，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洪承畴降清

明崇祯十五年（1642 年，清崇德七年）二月十八日午夜，乌云遮月，冷风嗖嗖，被清太宗皇太极手下大将豪格部围困了半年多，山海关外明边防战略要地之一的松山城，由于明守城副将夏承德为敌作内应，清军架起两副云梯爬上了夏承德负责防守的南城楼，然后迅速展开向纵深切入，接近凌晨攻占了全城。明蓟辽总督、宁远—锦州一线明军前敌统帅洪承畴，仓皇出逃，在城郊因马失前蹄为清兵所俘获。当晨雾消散，太阳在地平线上探出头来之时，洪承畴双手被反绑着，由一队骑兵押进清将豪格的大营。

宽敞军帐中，烛光一片通明，10 名彪形刀斧手雁翅般两旁一站，正中上首一把虎皮交椅上，端坐着傲气十足的豪格，他频频大声召唤：“快快将洪承畴给我押上来！”随着一声应诺，一名被五花大绑、头脸满是尘土的中年瘦汉，自军帐外由两个士兵推至豪格面前。此人便是当年大败李自成农民起义大军于潼关而名震全国的洪承畴。此刻，他虽一副兵败被俘狼狈相，但面

对豪格立而不跪，并反唇相讥豪格兵围松山半年多无所作为，自己只是因副将通敌内应才落到今天的地步。豪格被气得嗷嗷直叫，喝令刀斧手要将洪承畴推出帐外斩首。不过豪格的机要幕僚闪出劝住了他：洪承畴不是一般战俘，他是明清兵戎相见以来为清军俘获的最高级官员，且以大败李自成闻名遐迩，这样的人物应奏报太宗皇帝处理。

清太宗皇太极早就听说洪承畴是一位文武全才，崇祯十四年（1641年，清崇德六年）八月下旬，他亲率精骑驰援攻打锦州，在松山前线见到洪承畴布阵章法严密即产生了要活捉收降的意念。九月，盛京传来了他的宠妃宸妃病危的消息，他只好召集诸将大臣将前线事务安排一番，便骑上“四蹄踏雪乌骓马”连夜赶回沈阳去了。不过还是晚了一步，宸妃弥留之际皇太极还是没有赶到。就在皇太极因宸妃之死心情哀伤到了极点的时候，松山前线传来了清军攻占该城并生擒到洪承畴等人的捷报。这消息对皇太极来说真是太好了，他猛的一下从盘龙御床上弹坐起来，亲拟一道300里加急的命令发往松山豪格处，让自己的长子立即把洪承畴押送到盛京来。也真是洪承畴命不该绝，正当豪格审问洪承畴被气得七孔生烟，喝命刀斧手要杀掉他的节骨眼上，皇太极的一纸命令救了他一命。洪承畴获悉这一戏剧性情节后，不禁对皇太极这个从前认为是杀人不眨眼的“敌酋”产生了“好”感，初步打消了一死了之的念头。

洪承畴被押解到盛京后，清太宗皇太极并没有立即审问他，而是接受了“智囊”范文程的建议：先打打这位作俘虏仍傲气十足的明总督的威风再说。

农历二月末的大清都城盛京，正是滴水成冰的季节。在一间没生火炉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一张木床破羊毛毡垫子上，跌坐着一个蓬首垢面的中年瘦男人，他身穿灰粗布囚服，神情沮丧，目光滞呆地望着面前的小木桌，桌子上放着一大碗苞米大糗粥和一碟小葱与大酱。这居室及饭食，是清太宗皇太极命人精心给洪承畴安排的，目的是要让这位来自南国且素有洁癖的明总督，切身品尝一下“阶下囚”的滋味，以便在思想上解除他的武装。

忽然，地下室的门开了，一个头顶双眼花翎、身着满式裘官服，步履沉稳的人，在数名士兵护拥下走了进来，只见他双手向洪承畴一拱：“洪大人，这厢有礼了！”他见洪承畴望也不望他一眼，稍稍一怔，接着又说：“在下范文程，久闻洪大人之大名，今日幸会，深感荣幸。”

听到“范文程”三字，洪承畴心中一惊，他早听说皇太极身边有个范文程，是其父努尔哈赤留下来的“智囊”和“文胆”，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汉奸，不觉转脸两眼紧盯着范文程：“你这个士林的败类，无耻的汉奸！你不配跟本大臣讲话！”

“洪大人，你且息怒，”范文程停了一下，接着说：“满汉乃一家。古贤王猛扞虱跟前秦皇帝苻坚纵谈天下大事，后又辅佐这位氏族人称霸北方，而历史上又有谁骂王猛是‘汉奸’呢？”

洪承畴正要开口反驳，没提防到室顶一小块剥落石灰正掉在自己的囚衣前襟上，他下意识地用手将衣上的尘土拂落于地，双目一闭就不再言语了。

眼见此情景，范文程不觉微微一笑，双手朝洪承畴一拱：“洪大人请歇息吧，在下还有点公干，就此失陪了。”转身便缓步走出了地下室。

就在同一天的晚上，范文程来到皇太极的寝宫。他把自己会见洪承畴的经过禀报了一番，最后说：“皇上您别发愁，像洪亨九（洪字彦演，号亨九）这样身处囚室还怕尘土把衣服弄脏的人，他该是多么地看重个人的生命啊！”

他绝不会为他的皇上去死的，向陛下俯首称臣不过是三五日内的事了。”

在清太宗跟范文程此次谈话后的第三天，他们派往北京搜集明朝军政情报的探子给送回了一份情报，说当时的北京城都认为蓟辽总督洪承畴在松山前线已经尽忠死节，士大夫们纷纷为他举哀，崇祯皇帝还下令在正阳门两侧为洪承畴建烈士祠。随此情报一同附来有一份近日在北京出版的黄皮京报（一种政府批准允许出版的民办报纸），上面刊登着一则：洪承畴的一个家仆，为了筹集一笔盘缠将洪承畴的妻妾及十名家仆送回福建老家，上疏崇祯皇帝，极为详细地描述了其主人尽忠死节的经过；崇祯皇帝读后感动得热泪盈眶，并亲至洪承畴祠祭奠。当皇太极看完黄皮京报后，不觉喜形于色，他命人宣范文程入宫，让他把京报送给被囚的洪承畴一阅，并通知说自己准备一两天内在大清门里的崇政殿接见他。

洪承畴自接读范文程送来的京报后，坐了整整一夜没有合眼。想到崇祯是一个刚愎自用，对将帅疑忌嗜杀的皇帝，而自己现在“所统三军俱没，地方俱失”，即使清方让自己活着回去，但这丧师失地之罪，明廷能不追究吗？加之目前北京士大夫们都认为自己壮烈死难，连皇帝也为自己立祠祭奠，难道就这样死去吗？最后终于发出了一声长长地叹息：“罢、罢、罢，像我现在这身衣着，这副狼狈样子，让我去崇德殿晋见大清皇帝，这不是让我当众出丑吗？”没想到，洪承畴这一句叹息的话，恰好为在囚室门外监视他的人所听到，他很快就禀报到了清太宗皇太极那里。

第二日黄昏时分，洪承畴冰冷的囚室中熊油灯刚刚点亮，铁门突然缓缓地打开，接着走进来十几个人，其中一人高声唱道：“皇上驾到，洪承畴还不跪下接驾！”走在最前头的皇太极连声“免、免”，大步流星地走到洪承畴面前；“这屋子怎么连个炉子也不生？洪先生，让你挨冻了。”随即解下自己披着的貂皮大氅，亲手披在洪承畴的身上。

皇太极的动作使洪承畴大感意外，他愣愣地仰望着站在自己面前这位传奇式的大清皇帝，好半天嘴里一个字也说不出。忽然，他感到双腿一阵发软，“通”的一声，双膝不由自主便跪在地上：“臣对抗天兵，自知罪重，蒙皇上不杀而思养之……”皇太极打断了洪承畴的话：“不必说了，不必说了。”双手将洪承畴从地上拉了起来，接着又转脸对左右侍从说：“你们赶快命人给洪先生沐浴更衣，今晚就换一间暖和的客舍让洪先生好好休息。”跟着又对洪承畴说了一句：“洪先生，朕与你明天在崇政殿见，你一定要来啊！”说罢，喜形于色，迅速地离开了这间寒气袭人的囚室。

多尔衮入京定清鼎

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清崇德八年）八月九日，这一天清太宗皇太极处理完各项军政事务，跟平日一样回到了盛京皇宫的卧室，当晚约10点钟左右，这位雄踞东北的大清开国皇帝，因脑溢血歪倒在卧炕上猝然去世，终年52岁。

由于皇太极生前没有明确指定继承人，他死后兄弟子侄们经过数天的幕后台前的活动与斗争，皇太极的第九子6岁的福临，幸运地成为皇室各方都能接受的人物，被推出继位，第二年改元顺治，他便是顺治皇帝。大清的实权落到了摄政王多尔衮的手里。

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的第十四个儿子，是太宗皇太极的最小的一个弟弟。他年轻且有勇有谋，努尔哈赤在世时很受钟爱，岁数不大便经常随军出征；皇太极时期，他曾在北京近郊血战名将袁崇焕，在攻大明、征朝鲜、伐蒙古各战役中，多次被任命为独当一面的大将，并立下了汗马功劳。当他为6岁孩子顺治帝摄政后，实际就是大清国的最高统治者，不过他并不以此满足，他想通过自己的手，实现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入主北京君临中原夙愿，从而达到当真皇帝的目的。

多尔衮是个聪明人，他清楚地记得太宗皇帝皇太极收服洪承畴加封厚赏时，部下诸将很不高兴，都认为洪承畴不过是一名被捉的战俘，皇上如此优待他做得太过分了，而皇太极却哈哈大笑开导大家说：“比如走路，我们都是些瞎子，现在得到一位引路的人，我怎能不高兴呢？我这样优待洪先生，正是为了将来夺取中原啊！”多尔衮深知日后要进山海关夺取中原，必然要跟汉族人打交道，非要依靠熟悉大明国情和中原的风土人情的汉族谋士不可。他当摄政王后不久，遇上了豫亲王多铎要抢夺汉族大学士范文程妻子的事件。多铎是多尔衮的同胞小弟，他见范文程的妻子有姿色就想夺为己有。多尔衮知道这件事后便叫人把多铎找来，当着满朝文武和王公大臣的面严厉地训斥了他，并罚了款。多尔衮不避亲贵，秉公处理，在清国震动很大，一方面满族权贵们再不敢轻易欺凌汉族大臣，另一方面汉族谋士们也消除了内心的疑虑，更加竭力为大清献计献策了。范文程感激涕零，不久即上书多尔衮，说明当时关内的形势极有利于清军进兵中原，建议要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时机夺取大明的天下。

因为这年正月，农民起义军首领李自成称王于陕西西安，建国号“大顺”，随后他亲统大军东攻明朝，一路斩将过关，势如破竹，三月十九日，崇祯帝在煤山上吊自杀，接着李自成全军浩浩荡荡进入北京，接管了明王朝的权力。进京后的农民军领导人，显然为胜利冲昏了头脑，一味地忙于拷问明官僚勋戚追索钱财，忙于筹备登基即位，甚至开科取士，漠视离北京不远的山海关还存在明宁远总兵官吴三桂，他手中还握有战斗力较强的数万精兵，特别是似乎忘了山海关外还有一个武装割据东北地区的大清政权，剽悍的八旗劲旅正虎视眈眈，随时都可能开进关内从农民军手中抢夺胜利果实。

清摄政王多尔衮采纳了范文程进兵中原的建议，四月初他奏明顺治帝，在举行授权远征仪式后，便率大军离开盛京向南行进，想乘明王朝内乱之机，坐收渔人之利。

在多尔衮乘明乱同李自成农民军争夺天下的斗争中，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倒向谁于胜负极为关键。吴三桂原籍江苏高邮，后客居辽宁辽阳。他出身将门，父亲吴襄曾任宁远总兵。吴三桂小时喜玩枪弄棒，青年中过武举，后来承袭其父军职。崇祯帝为了防御清军，特任他为大将，领4万精兵驻关外宁远重镇，扼守东北通向关内咽喉，拱卫京师。

当李自成农民军逼近北京之时，崇祯帝曾一日连下数道诏书命吴三桂放弃关外阵地，迅速率军入京勤王。可是当吴三桂的军队走到半路，派出的侦察人员从前方带回了令吴三桂震惊的消息：李自成已率农民军进了北京，崇祯皇帝自杀身亡了。吴三桂不觉倒吸了一口冷气，失声说：“完了，完了！现在前有李自成，背后又有多尔衮，我这几万人马夹在中间，该怎么办呢？”他领军退回山海关去了。

进京后的李自成很看重吴三桂的作用，他授意已被农民军软禁着的吴襄

给儿子吴三桂写信，说明京中全家一切安好，劝他向农民军投降，并讲李自成已许诺归降后父子可封侯。吴三桂收读信后认为李自成看重自己，跻身新贵的机会来了，答复立即收拾本部人马不日到京投降。可是就在吴三桂带着麾下部众入京朝见李自成的时候，又有人传来了他的父亲吴襄被农民军勒令捐饷 20 万两银子，他的爱妾陈圆圆给李自成部将刘宗敏夺去府内了。吴三桂初听不相信，但他派出的探员从北京回来证实消息是确实的。这一来吴三桂马上翻脸变卦，飞身上马率军从原路返回山海关。为了报私仇夺回爱妾陈圆圆，吴三桂一方面在山海关演兵校场上命令所辖部队人人身穿白衣白甲，自己带头朝北京方向跪拜遥祭崇祯帝，诡称君亡国破之仇不报誓不为人；另一方面又暗派人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出关哀求摄政王多尔袞借兵共同进攻李自成农民军。

四月中旬，多尔袞收到吴三桂的乞援信。他对吴三桂信中的所谓“泣血求助”，即只是向清借兵而非归降很不以为然，对恢复明中央政权更不感兴趣，给吴三桂的复信表示应允出兵，但要他归降，许诺吴三桂“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

李自成在北京听到吴三桂不仅不归降自己，还口出狂言要为崇祯复仇，不禁大为震怒，便亲率 20 万人马并带上吴三桂的父亲，浩浩荡荡向山海关扑来。

吴三桂眼见李自成大军即将兵临城下，吓得一夕数惊，只好写了降书派心腹连夜出关送往清营乞援。多尔袞在距山海关约 160 公里的连山收到吴三桂的第二封亲笔信，见他已愿归降，又恐李自成占领山海关后果不堪设想，当日便下令拔营向南疾进，以一昼夜朝前推进 100 公里的速度，于四月二十一日黄昏抵达山海关近郊，距关门仅剩 8 公里之遥了。接着，多尔袞在“一片石”的地方，跟李自成的先头部队发生遭遇战，并打败了农民军，于第二天黎明来到了山海关门前。吴三桂听说清兵已到，亲率 500 精锐骑兵赶往前去迎接，一见到多尔袞便翻身下马跪拜称臣。多尔袞急忙将吴三桂扶起，并下令宰杀乌牛白马，摆开香案祭天，与吴三桂折箭盟誓以示真诚合作。吴三桂也立即按清俗剃发留辮，表示正式降清，并主动大开城门，引清兵进了山海关。

按照多尔袞的部署，肩系白布条的吴三桂的宁远兵被安排攻打头阵，其阵后则隐蔽着清兵精锐。吴三桂因背后有清兵撑腰，命令所部疯狂向农民军扑来。李自成立即针锋相对，下令挥师迎头痛击。霎时之间，山海关前杀声冲天，鼓声动地，马倒沙场，血染旌旗，这是一场空前的恶战，彼此杀得难解难分。毕竟农民军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对方，吴三桂军渐渐招架不住。骤然，一股夹着沙石的怪风自东面山坡之侧卷起，尘土蔽日，五步之内，人马难辨。多尔袞认为此时机会已到，命隐蔽在阵后的清军绕过吴三桂军的右侧，迅速扑向李自成军的左翼。跟吴部血战半日的农民军已感到人困马乏，这时突然发现向自己冲杀过来的是精锐的清兵，纷纷大吃一惊，阵脚顿时乱了起来，随着阵线被清军的突破，农民军向后撤退变成了溃败，连李自成也喝止不了，最后只得骑马跟随残部于四月二十六日回到北京，3 天后登武英殿仓促举行了登基典礼，正式称帝。仪式结束后的第二天凌晨，大顺皇帝李自成便率部匆匆离开北京向西退去。他占领北京仅 42 天。

听到李自成从北京退出西去的消息，坐在中军大帐内翻阅探报的多尔袞不觉“哦”了一声，他低头一盘算：现在我们是该进北京了吧？他想到八哥

皇太极每当对一件大事最后做决定前，总爱对大学士范文程问：“范章京对这件事的意见呢？说说看。”于是立即派人把汉人谋士范文程请了来，一见面就开门见山道：“范先生，我父兄几代人挺进中原，君临天下的夙愿要实现来得如此之快，这真出乎意料，何时进京为好？你看……”

范文程沉思了片刻，然后像放连珠炮似地说：“摄政王爷，逐鹿中原，唯强者先下手得之。所谓‘花开堪折直须折，莫等无花空折枝’！”

“对，对！”多尔袞连声说，“来人，传我的令：马上进京！”

就在李自成退出北京后的第二天，多尔袞在发出让吴三桂“勿用来京”，继续向西追击李自成残部的命令后，便跨上他那匹“四脚踏雪火龙驹”，带着数百名亲随警卫赶到北京朝阳门外。在这里，多尔袞又在众多降清的明朝将吏的跪迎拜送下，改坐杏黄缎轿向余烟未净的武英殿奔去。清朝爱新觉罗家族统治全国，即自这一天——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一日开始。

史可法殉难

南京是明太祖朱元璋开国定都之地。自第三位皇帝朱棣于永乐年间迁都北京之后，南京改称陪都，也称南都。当北京被李自成农民军攻破，崇祯帝吊死于煤山，众多明朝皇族宗室纷纷逃往南方以后，陪都南京自然成为政治中心。南都兵部尚书史可法、户部尚书高弘图、兵部侍郎吕大器等人聚在一块商议提出：向全国发布起兵勤王的檄文，号召共赴国难，复兴明朝中央政权，为了师出有名，建议先立一位宗室亲王入承大统。在南京的其他官员一致表示同意，于是就在南逃的宗室亲王内挑选起新君来。

当时与崇祯皇帝血统最近的南逃宗室亲王中，能供选择入继大统当皇帝的人选有两个：一位是崇祯帝之叔潞王朱常淩（音 f ng）；另一位是崇祯帝之兄福王朱由崧（音 s ng）。尽管潞王在外的名声比福王好，而且得到著名大臣史可法等人的支持，但中国封建社会帝位的继承，按常规大都从上往下传，若立福王，这是同一辈相承，当然比立潞王逆辈相传，合乎封建社会帝位继承的规矩些，因此，在凤阳总督马士英的支持与活动下，福王先被立为监国，不久即登基称帝，改元弘光，建立起第一个南明小朝廷。

当上弘光皇帝的福王是一个只知道玩乐吃喝的昏君。他在南京的小朝廷当时正面临着清兵即将南下进攻的严峻形势，可是他一点也不考虑防御大计，却一方面在南京大修新宫殿，内廷居然高悬着“万事不如杯在手；百年几见月当头”的对联，另一方面派人往苏、杭等地为后宫选美女。

弘光朝的朝政被东阁大学士马士英把持着。此人明神宗年间中过进士，崇祯年间任过巡抚，但他为官贪污受贿，声名狼藉，一度受到降职处理。这一回仗着拥立福王称帝有功，重用有恩于己的阉党阮大铖（音 chéng），结党营私，卖官售爵，变尽法子，搜刮民财。当时南京城内流传着这样的童谣：“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

在弘光朝的文武大臣中，身材不高，但两眼炯炯有神的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史可法，却是一位秉性耿直、为官廉洁的人物。这位出身于小官吏家庭的陕西人，青年时考中过进士，后参与对李自成农民军作战有功，被提升为南都兵部尚书，他对马士英的所作所为屡次表示不满。像这种人在马士英看来，当然是眼中钉、肉中刺，终于逼着弘光帝朱由崧把他派往扬州督师，

抵抗清军的侵犯。

史可法本来是很不愿意离开南京的，他担心自己一走朝廷上的事会给马士英、阮大铖等人弄得更加一塌糊涂，但君命难违，守土卫国也应该尽个人的一份力量，所以最后还是遵命赴任了。不过“扬州督师”这个官并不好当，所辖当时在长江北岸的四支军队的将领，都是些“头上长角、身上带刺”的人，他们一个比一个骄横跋扈，不仅时有纵兵扰民之事发生，而且为争地盘和捞好处，甚至不惜彼此兵戎相见。史可法到扬州后，首先是详细了解“江北四镇”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等四员战将的底细，他得知高杰是其中作战最勇敢，部下纪律也最差的一人，于是有一天夜晚，他换上便服，仅带了两名参谋人员和数名警卫，骑马径直往高杰的军营跑去。高杰早就风闻有人在史可法那里告了他的状，看见史可法突然深夜来到自己军营，不觉大吃一惊。史可法进军帐后让高杰也在身旁坐下了，然后非常诚恳地说：“我早就该来看望你们，因事太多把身子缠住了。”接着用眼环视了一下随高杰一块坐下的众都将，继续说道：“诸位跟高将军驻军江北，吃了许多苦，我今晚来主要是向将士们表示慰问的，各位辛苦了！”高杰原以为史可法此来是为追究自己放纵部下扰民之罪的，听罢史可法的这几句话，主动起立将身向前一欠说：“末将对部众管教不严，出现了不只一起抢百姓粮食，甚至残害百姓的事，现在想起深感愧疚汗颜，谨请阁部大人治罪。”史可法对高杰部队扰民和残害百姓的行为是痛恨的，也真想对高杰从严惩处，但考虑前线部队军粮军饷不能按时发放，这同在朝把持大权的马士英、阮大铖等人经常克扣和延发军资军饷有关，高部出现扰民事件跟马、阮等奸臣的违纪行为，也有或多或少的关系，而当前抗清守土，又正需要军事人才，高杰原是从李自成农民军那边投降过来的，高部多为农民军战士，有着较强的战斗力，目前守扬州正用得上他们。想到这里，史可法把手摆了一下，对高杰和众将缓缓地说：“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抗清保国，不能扰民失掉民心，以前的事就不追究了，希望各位今后严格管束部队，不能再有扰民害民之事发生，再有违纪扰民之事发生，本督师定严惩不贷。我准备上疏皇上，提请派高将军所部驻扎瓜洲，切实保证拨发全部军粮军饷。瓜洲乃长江咽喉要地，让你部驻军瓜洲，是朝廷的一种倚重，望诸位不要有负信任。”史可法的这一番话，义正辞严而又情重恳切，使高杰等众将感动不已。他的话音刚一落，高杰忽的一下跪拜在地：“今生我们愿谨遵阁部大人将令！”

史可法原是进士出身，本是一个文官，但有过参与对农民起义军围剿的经历，在军事生活中他深知为将者关心士兵疾苦和以身作则的重要，当士兵没吃饭自己不先动筷子，冬天士兵没穿上棉衣，自己一定不先着棉衣，因此颇受士兵们爱戴，加上作战立有军功，所以在将领之间也有一定的声望。此次来扬州督师，能很快控制了不易指挥的高杰部，这使“江北四镇”中其他三支明军将领们刮目相看。史可法可算“趁热打铁”，很快又约见了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这三位镇将，跟他们推心置腹谈心，一同分析南明弘光朝廷面临的严峻形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勉之以大义，鼓励大家抗清为国立功。这些将领们深为史可法忠诚精神所感动，均表示愿听从他的指挥，很快就率领所部按史可法的安排，进驻仪征、凤阳和淮安三城。史可法争取到“江北四镇”将领的支持，调整好四镇将的防地后，自己坐镇扬州，不仅加强了防御清兵进攻的力量，还产生了一旦遇到可乘机会，还准备兴师北上，让弘光帝回到北京哩。

正当史可法积极筹划防备清军南下进攻之时，清摄政王多尔衮给史可法送来了招降书，让他劝弘光帝削号归藩，自己投降清朝。多尔衮的招降书还威胁说：清兵已整装待发，弘光小朝廷君臣若不识时务，我军随时均可投鞭断流，一鼓而下金陵，不过到那时，你们将后悔都来不及了。

史可法收到多尔衮的劝降信后，立即回了一封大义凛然的信，信中驳斥了多尔衮对南明的诬蔑，宣称弘光帝乃大明神宗皇帝之孙、崇祯皇帝之兄，他的继承大统是“名正言顺，天与人归”，弘光帝驾临南京时，“万姓夹道欢呼，声闻数里”，可见是完全合法的；至于自己，抱定决心“鞠躬致命，克尽臣节”，以图报效国家，绝不投降。

多尔衮见史可法坚决拒降，十分恼火，决心以武力统一全国，先派一小股清军自山东南下试探进攻，但为史可法指挥的明军所阻。史可法决定以攻为守，命高杰率部向开封进攻，准备开辟另一条战线以牵制清军。没料到高杰兵到河南睢（音 su）州，为暗中准备降清的睢州总兵许定国设宴伪装接风，用酒灌醉杀害。高杰的被杀和许定国的叛变投清，使清军找到机会突破了南明的徐州防线，清将豫亲王多铎率领大批人马直朝江南杀来。

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正当南明前线形势恶化之际，弘光朝廷内部又爆发了一场内争，对马士英、阮大铖把持朝政早已不满的镇守武昌的大将左良玉，在东林党人的鼓动下，以“清君侧”为由，兵发武昌顺江东下直逼南京。马士英和阮大铖担心左军打进南京，自己的权位性命难保，以弘光帝名义飞调史可法部队回京设防。后因左良玉中途病死军中，一场风波才宣告平息。不过这个时候，南明原泗州守将李遇春，原徐州守将李成栋，已先后投降清朝，他们为清军作前导，带领清军大队人马兵临扬州城下了。

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清顺治二年）四月，史可法带着数名随从由南京对岸浦口匆匆赶回扬州。他召集部将和扬州知府任民育商议，分头发动全城军民奋起守城。

史可法知道仅凭本城的现有军事力量是抵御不住清军进攻的，使派人出城四方调兵和求援。但响应者极少，原“江北四镇”之一的刘泽清已投降清军，守卫扬州外围阵地的两员将领李栖凤和张大禄也先后投敌。响应更可法呼吁援助的除总兵刘肇基所部 2000 人外，还有著名的民间义士庄子固所率领的队伍 700 人。这些援军加上史可法自己原有的部队，守城的将士总人数约有 2 万人。他们同全城百姓一道，开始不分昼夜构筑工事和巡逻。

四月中旬，清军完成了对扬州城的包围。15 日那天，叛将李遇春举着清豫亲王多铎的帅旗来到扬州城下，他自称是清军的使节，大声叫喊要史可法出来答话，史可法站在城楼上当着众人之面厉声痛斥了李遇春的变节行为。李遇春却厚着脸皮反问史可法：为什么一定要为不信任他的弘光帝卖命？史可法被激怒了，他拉弓一箭就射倒了李遇春，引起守军将士一片欢呼。此后不久清帅多铎又向史可法送来了一封附有优待条款的招降信，史可法读后撕得粉碎，叫人把它扔到大江去了。再后多铎又前后送来过 5 封劝降信，史可法连启封都不启，把信都用火烧掉了。

多铎见史可法坚决拒降，便下令加紧攻城。史可法在城防工事内部署有十余尊葡萄牙式大炮，他命在清军走进大炮射程内即开炮射击，每当一阵炮轰之后，清军就丢下一大批尸体。但大炮弹药是有限的，总兵刘肇基向史可法献计说：“扬州城内地势高，城外地势低，阁部大人可否来一个‘关羽水淹七军’？派人掘开淮河堤。把水灌进敌人阵地，这样就不愁他们不退。”

史可法听后认为这个办法是好，但那样办，淮南一带的老百姓可就遭殃了。他连连摇头：“此策不可行，这个办法实行不得啊！”

随着城外清军增援部队的大批到来，多铎也有了装备着重炮的攻城炮队，扬州城墙多处被炮弹打坏，城内开始出现人心不稳，有个名叫高凤歧的监军，趁黑夜带了兩名亲信偷缒下城，投降了清军。史可法自知扬州已难久守，于四月十八日在大营召见了素有忠义的副将史德威，他拿着上弘光帝的《遗表》一道，留给母亲、伯叔兄弟、夫人、部将的《遗书》四封，流着眼泪对史德威说：“以死报国，这一点你我是同心的。今有一事拜托，请你一定答应我。”史德威拜伏于地说：“请阁部明示，未将只要一息尚存，决不有负所托。”史可法双手把他从地上拉起，将遗表遗书郑重放在他手中之后继续说：“我还有一个小小的愿望：我死以后，请把我葬在太祖高皇帝的旁边，万一不行，埋在扬州城外梅花岭也可以。”史德威泣不成声，重重地点了一下头。

此后又过了7天，清军统帅多铎见史可法坚决不降，亲自带队猛攻史可法分工防守的扬州城西门。史可法下令开炮还击，打死清兵数千。忽然一声巨响，西北角城墙倒塌了数丈，成千上万的清兵像潮水一样地从城墙缺口涌了进来，史可法命令守军照着冲入的清兵放箭，刹时间箭似飞蝗，成排的清兵倒下了。不过清兵太多，多铎又下了不惜一切代价非要取城的命令，眼看着清兵尸体越积越多，而后面的清兵仍继续朝前上。史可法见扬州城守不住了，“嗖”的一声拔出佩剑照着自己颈脖就抹，参将许瑾急忙用双手把他抱住了。史可法受了伤，但没有死，他的部将领着数十人立即护卫着他突围。当走至东门，与一批清兵突然遭遇，一阵肉搏之后，史可法及其部下只剩不足10人了，他自己也受了重伤。面对众多的清兵，史可法毫无惧色，他大声喊道：“我就是史阁部，走，带我去见你们的主将吧！”

史可法被清兵用绳索捆绑着双手推到了清帅多铎面前，多铎马上从座位上站起来并吩咐松绑，他口称史可法为“先生”，说只要替大清收服江南，定当重用和厚赏。史可法冷笑一声，大声宣布：“我乃大明朝重臣，岂可偷生苟活，成一个被后人骂的万世罪人！我没有别的话要说，现在来就为只求一死。”多铎气得半天口开不了，最后把手一挥：“你既然要做忠臣，本帅就成全你，推出去！”史可法哈哈一笑，对多铎说：“与扬州共存亡，这是我早就想好了的。即便你们把我碎尸万段，我也心甘情愿。我只有一个要求，你们现在占领了扬州，请千万不要杀害无辜的百姓。”话一说完，就昂首跟着清兵走出，“慨然就义于扬州之南城楼上”。后来，有人想寻找史可法的遗体，但没有找到。史可法的一位部将同他的家属商议，把史可法生前穿过的衣帽和使用过的笏板，一起埋葬在扬州城外的梅花岭上，这便是今天人们凭吊的史可法“衣冠冢”。

史可法死后，清兵对扬州城内的百姓进行了血腥的屠杀。据不完全统计，短短10天内，这种疯狂的报复使数十万人丧生，繁华的历史名城扬州几乎成了一座坟墓。后来有人写了一本《扬州十日记》，记载下了清贵族犯下的这一笔罪行。

史可法之死，使南明弘光朝失去了最有力的一根支柱，不久南京为清军攻占，存在不到一年的福王政权便灭亡了。

在福王政权之后，江浙地区建立过鲁王政权，福建地区建立过唐王政权，云贵地区建立过桂王政权。历史上将上述这些政权统称之为“南明”。不过

这些南明小朝廷都存在时间不长，在清军的进攻下，它们均相继灭亡了。

郑成功收复台湾

清顺治三年（1646年，南明隆武二年）十二月，这时虽是隆冬季节，但南国的广东，南澳岛上主调仍是一片郁郁葱葱。在连营数里的一座大军营门前两旁，分别写着“明忠孝伯招讨大将军国姓”和“背父救国”字样的两面抗清大旗，正在牢牢树立的两根三丈多高的旗杆上迎风猎猎作响。——这是四个月前与叛明降清父亲郑芝龙公开决裂后，只率随从数十人来南澳招兵买马的郑成功所新建的一个抗清营地。由于郑成功对故国的忠诚和他的“大义违亲”的行动，正好符合清军“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报复罪行后江南广大百姓的抗清要求，所以他的扩军很成功，很快就集合起了近两万人的队伍。这支招募来的义军在郑成功的率领下，乘船开到厦门鼓浪屿训练一段时间后，同他的叔叔明镇江总兵郑鸿逵所带领前来联合抗清的部队进行整编，组成了有较强战斗力的水陆两军。这是郑成功以后坚持抗清和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我国领土台湾的基本武装力量。

郑鸿逵是对郑成功一生帮助和影响最大的一个人。他原是南明镇江的守将。当清军占领南京，弘光小朝廷覆亡之际，他深感本部难以继续在镇江立足，加上考虑到自己的哥哥，即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现为福建总兵，在福建地区他说话还是说一个二的，因此他率领自己的镇江守军主动撤离，想尽快跳出清兵的包抄，经浙江回到福州。就在他的部队路过杭州的时候，凑巧遇上唐王朱聿键的车驾，彼此都有“同为天下沦落人”之感，于是他动员唐王到福建领导抗清，取得同意后便护卫着唐王来到了福州。

在福州，唐王会见郑芝龙父子是非常高兴的。特别是他见郑芝龙之子郑森，生得身材魁梧，面如满月，唇若涂朱，两道剑眉下一双充满机智的大眼，浑身洋溢着一种勃勃向上的青春朝气，简直喜欢得眼睛笑成一条线。当他听完郑芝龙关于福建兵力、物力和财力的情况禀报后，特意让郑森详谈了一下今后如何“夺取南京，扫荡中原”的大计。唐王深深为小将军的真知灼见所折服，他把郑森叫到跟前来，用手抚着他的肩膀说：“你这孩子真招人喜欢，本王就认你为子侄，赐你同国姓，改姓朱，叫朱成功吧。愿我大明中兴伟业能在你手中取得成功。”郑森忙双膝跪下，无限感动地说：“臣感谢唐王赐姓，能与太祖高皇帝同姓，这是臣的无上光荣。臣发誓终身以中兴大明为己任，为此即使粉身碎骨、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唐王连忙双手扶起郑森，并亲手把“招讨大将军”印挂在他的身上。从此郑森改叫“朱成功”（历史上沿用他原姓称为郑成功），不少人后来尊称他为“国姓爷”。

就在唐王给郑成功赐姓并授予招讨大将军印后不久，郑芝龙和郑鸿逵等人拥戴唐王在福州正式登基，建立了又一个南明政权，朱聿键即隆武帝。郑芝龙被封为平国公，郑成功被封为忠孝伯。随后隆武帝还筑台拜将，准备誓师北伐。

不过过了近一个月，郑成功还未见有丝毫要出兵北伐的动静，经打听，他父亲的一位亲信告诉他：最近清任命早已降清的洪承畴为“招抚大学士”，专门向江南抗清的将领策反，就在隆武朝筑台拜将之后不多天，洪承畴给郑芝龙送来过一封信，这可能与没誓师北伐有关系吧。

郑成功一听就火了，马上跑到父亲那里问。郑芝龙见儿子已知道此事，便只好将信拿出来给郑成功看。这封信虽是洪承畴跟郑芝龙叙乡谊，谈谈自己在清朝那边如何受重用，情况是多么好，但弦外之音不是明明暗示郑芝龙如降清，也会同样受信任获重赏吗！郑成功看完信后恨得牙齿咬得格格响，他一把将信撕了，问他父亲：“您准备步洪承畴这个老贼的后尘吗？”郑芝龙没明朗表态，用几句敷衍话把儿子支走了。但实际上，郑芝龙却是暗中下了决心，准备找适当的时机，向清军投降。

这一年的八月，清将博洛率大军进攻福建，在郑芝龙的暗助下，很快攻占福建的门户仙霞关，然后长驱直入攻破建宁，隆武帝被迫退往汀州，被清兵俘虏，南明隆武朝灭亡了。恰在这时，郑芝龙接到了博洛的一封招降信，他认为降清的时机已到，马上召集郑鸿逵、郑成功请开将开会，公开宣布说：“我已决心马上投清，希望大家跟我一块走，识时务者为俊杰嘛。……”他的话还没有说完，郑成功从座位上“突”的一下站了起来：“父亲，您手上还有数万精兵，您脚下还有不小的地盘，我们大家也都支持您抗清，复明的中兴大业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嘛，您怎么能干降清这种可耻的事呢？叛明投清是会成为千古罪人的啊！”

儿子掷地有声的话语，有如一声响雷在会场上炸开了，立即引起人们的一阵小声议论。郑芝龙恼羞成怒，为了稳住阵脚，他指着郑成功大喝道：“来人，给我把这个逆子绑了！”马上出来了一群亲兵，五花大绑地迅速将郑成功捆了起来。“先押下去，这小子简直是反了”，郑芝龙恶狠狠说完这句话后，用手朝诸将摆了一摆：“现在散会。”

这一天晚上午夜时分，天空只有几点疏星，四周静悄悄的。郑鸿逵来到郑成功的囚室，他命令士兵打开房门并给侄儿松了绑。两位抗清志士紧紧拥抱，但又不敢哭出声来。最后，郑鸿逵紧握着成功的手说：“贤侄，今晚你就快走吧，去干你认为对的事吧！我们后会有期，只要你在外树起抗清大旗，我一定会拉出自己的队伍前去跟你站在一起的。”

两名站在门外放风的士兵也深受郑氏叔侄的壮志豪情所感动，他们对郑成功恳切地说：“小将军，我们在这里呆不下去了，我们愿意跟您一起抗清，愿意追随您到天涯海角，请您让我们跟您一块走吧！”

郑成功挥泪向叔叔告别，他同两名士兵很快就消失在墨一样的黑夜里。

九月，清将博洛率兵进入福建泉州，郑芝龙正式投降了清朝。清方面赏他个“三等精奇尼哈番”的官。但后来利用完了，被清廷流放到黑龙江省的宁古塔，以后终于将他杀死。

顺治五年（1648年，南明永历二年）五月起，郑成功开始了大规模的抗清活动，以后几年，他破同安，占泉州，下揭阳，并与另一抗清明将张煌言联合，攻入长江，连下瓜洲、镇江，一度兵锋直逼南京城下。明永历帝听到郑成功抗清获胜，十分高兴，下诏慰问，并先后封他为延平公、延平郡王，还赐予尚方宝剑，允他先斩后奏，便宜行事。但郑成功终因没有稳固的）后方，兵力数量有限，或因内部意见分歧，抗清活动连遭失利，所控制的地盘也越来越小，而清廷又下令让闽、粤沿海居民后撤内迁，采用封锁的办法想困死退驻厦门和沿海小岛的郑军，这就使郑成功今后招兵、筹粮、筹响都遇到了困难。他只得从孤悬在海中的台湾岛寻找出路了。

台湾古称“夷州”，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神圣领土。欧洲荷兰殖民主义者，趁明王朝国力衰落，从明嘉宗大启四年（1624年）以后，就侵占了台湾。

他们用枪炮逼着老百姓给修盖了两座城堡，先建的一座城堡叫王城（今台湾东平地区），后建的一座城堡叫赤嵌（今台湾台南地区）。两座城堡的墙壁是用糯米和糖调和灌浆而砌成，彼此隔海相望，由武装荷兰士兵把守。荷兰殖民者不仅强迫岛上中国居民服劳役，还摊派高额的苛捐杂税，人民群众恨透了这些殖民主义吸血鬼，不断起来反抗，但均遭到荷兰殖民武装的镇压。

郑成功既然下了决心要收复台湾，以作为自己抗清的安全后方，便下令部队修造船只、筹集粮草，加紧训练水军，准备渡海赶走荷兰侵略者。

郑成功收复台湾是“先礼后兵”。在进军台湾前，他先给霸占台湾的荷兰殖民统治者揆一写了一封信，郑重宣布：“台湾是我中华领土，决不许外人侵略霸占，现在我限令你们立即撤走，将神圣领土归还我国！”揆一收到郑成功信后非常焦急不安，决定先派出翻译何廷斌前来刺探军情。

何廷斌是流落台湾的汉人，他为生活所迫给荷兰人当翻译。他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心的中国人，他来到厦门一见到郑成功便倒身下拜，含着眼泪介绍自己的身世经历之后，情真意切地说：“国姓爷要收复台湾这是很得民心的，台湾老百姓早就恨透这些红夷（当时中国人对荷兰侵略者的蔑称）了。有什么用得上我的地方，国姓爷尽管讲，小人一定尽力。”接着，他从怀里掏出一张亲手暗中绘制的台湾地图，双手递给了郑成功。

郑成功接过地图展开一看，只见上面把荷兰人的据点、设施以及台湾的地势、交通等，标明和介绍得一清二楚。他又把自己的探报取出一对照，看得出何廷斌所献的地图军事参考价值极高，不觉喜形于色。他双手扶起何廷斌，十分认真地说：“先生此图贡献不小，今天的谈话请先生保密，事成之日，定当重谢。”

根据何廷斌提供的情报和地图，郑成功经过仔细的研究和周密的部署，在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南明永历十五年）三月末，亲率将士2.5万人，分乘100余艘战船离开厦门，由何廷斌领航，经澎湖，然后趁海水涨潮时机，绕过沉船与暗礁，于4月1日凌晨，悄悄地进了鹿耳门，顺利地登上了台湾岛。

当荷兰殖民统治者揆一发觉郑军已兵临王城，这一惊非同小可，他大惑不解地叫道：“鹿耳门航道早就淤浅，到处是礁石，中国船队怎么能从那儿过来？我的上帝，这真是不可思议！”只好下令仓促应战，王城内的枪声开始像爆豆般地响了起来。郑成功立即命令炮兵开炮还击，王城内顿时起火，荷兰侵略者乱成一团。

在海面1：，双方的舰船也展开了激战。荷兰人的船只虽然高大，但在浅水滩头行动笨拙；郑成功的水军多是小巧快船，行动快速灵活。数十只小船咬住一艘大船。荷兰侵略军的最大一艘军舰“赫克托”号，便是为围着它的郑军60余只小船发排炮击沉的。

荷兰总督揆一眼看战事对己不利，只得命令他的部下全龟缩在两座城堡里，派出使者到郑成功那里求和，说只要郑军退出台湾，愿献上10万两白银犒劳郑成功的部队。

郑成功厉声对揆一派来的使者说：“我军不是为白银而来台湾，我们是收复中国的神圣领土，如果你们赖着不走，我军就要用大炮把你们轰走！”紧接着，又发动了对赤嵌城的猛攻，并采纳一位台湾当地人的建议，从城外高处切断了赤嵌城的水源。仅仅过了3天，赤嵌城内的荷兰人支持不下去，在城头扯起白旗投降了。

盘踞王城的荷兰殖民者还想顽抗，但郑成功采取了围点打援的高招。在长达 8 个月的围困中磨损了侵略军的斗志，他们的头目只好被迫到郑成功大营乞降，最后垂头丧气地分批离开了台湾。

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是郑成功对中华民族和祖国的一个伟大贡献，他因此成为民族英雄受到后代炎黄子孙的高度赞扬。

“三藩”之乱

康熙八年五月（1669 年 6 月），年仅 16 岁，刚刚亲政不久的康熙帝一举清除了顽固、保守的鳌拜集团，掌握了朝廷的权力。他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措施，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当他还没有来得及订立起一整套新的制度时，1673 年爆发了以吴三桂为首的大规模的叛乱，清朝的统治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康熙帝的统治能力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这次大规模的叛乱是由三位汉人藩王发起的。这三位藩王是：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因此历史上把它称为“三藩”之乱。

“三藩”之乱不是偶然发生的，有它的深刻的历史渊源。

吴三桂降清之后，摄政王多尔袞封他为平西王，命令他带步、骑兵 1 万西征。从此，吴三桂对清王朝忠心耿耿，1645 年出镇锦州，1651 年率兵入川，攻占成都，1652 年攻入贵州，1658 年春，攻占昆明，迫使南明永历帝逃往缅甸，1661 年 8 月，吴三桂率清军大举侵入缅甸，1662 年，俘虏了永历帝。南明政权最后灭亡。作为清王朝的一名忠实走卒，吴三桂可说是出生入死，个顾性命，不遗余力。

作为主子的清廷也给了吴三桂优厚的回报：让他以平西王身份留镇云南。与吴三桂经历相仿，得到酬报也相似的还有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耿精忠足承袭祖父耿仲明的王位。耿仲明、尚可喜早在后金时期便归顺了清兵，1649 年，他们分别领清兵南下，卓有功绩，加封王号。1654 年，尚可喜留镇广东，1660 年，耿继茂（耿仲明之子）留镇福建，这样，清廷便完成了它“三藩并镇”的部署。

显然，清廷的这种分封和处置包含着很深的机心：一、这几个人对于清王朝的建立和天下统一功劳太大了，不分封不足以笼络人心。二、但他们毕竟是明朝旧臣，是清朝的“贰臣”，清廷对他们本能地存在戒心。因此，清廷采取了“以藩屏周”的策略，将他们放在边防地带镇守，这样既满足了他们的虚荣心，又可作为清政府的屏障，让他们对内镇压民众的反抗，对外防止强敌的入侵，可谓一举数得。

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王自然也懂得朝廷的别有用心。但是，既然已经做了奴才，只要主子还能容忍，这种奴才也还要做下去。何况，他们还可以役使更多的奴才。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王就是带着这种心态，把镇守地变成了一个独立王国。首先，他们拥有重兵。耿精忠、尚可喜各有兵力 15 佐领（每佐领统辖约 200 人）及绿旗兵六、七千。吴三桂拥有 53 佐领和绿旗兵 1 万 2 千。其次，他们有很大的人事权，可以自命官吏。借助这种权力，他们大事罗致人才，树立党羽。第三，他们在控制区内，可任意把持和掠取当地资源。吴三桂在云南，不仅“广征关市，榷税盐井、金矿、铜山之利”，而且招徕

商旅，从事各种非法贸易。在这样的独立王国之内，各藩王对百姓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和压榨，吴三桂不仅把明黔国公沐氏的田庄全部据为己有，同时还已归各族农民所有的明代卫所军田重新圈占，把耕种这些土地的农民变成自己的佃户，强迫他们纳租纳税。在藩王及其爪牙们的残酷统治下，三藩控制区的百姓“苦疲难堪”，生活十分痛苦。

“三藩”割据势力的不断发展，严重威胁着清朝政府的国家统一。康熙亲政后，一再说：“天下大权，应掌握在一人手里，不可旁落。”还说：“生和死，是人之常理，朕并不忌讳。但是天下大权，应当统一。”表示了他对国家统一的积极态度。他对“三藩”割据势力的发展，已经十分关切，曾把三藩、河务、漕运三件大事书写在宫中柱子上，说明这三件事是他关注的焦点。

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月，镇守广东的尚可喜上疏请求回辽东养老，让他的儿子尚之信承袭王爵。康熙认为撤藩的时机已经成熟，命吏部议复，意思说：藩王既然活着，没有儿子承袭王位的先例；藩王既然回乡养老，他的家属兵丁等也应一起带回去，而绿旗官兵应该留在省里。这样，清政府撤销了尚氏的藩封。这件事惊动了吴三桂、耿精忠。他们不得不也提出撤藩的请求。然而，这不是他们的衷心，他们想以此试探清廷的态度。对吴三桂的请求，清政府中产生了不同的意见：一派主张撤；一派担心吴三桂兵力强大，如果造反，难以对付，因此主张姑息迁就，以不撤为宜。朝廷中多数大臣都不主张撤，正当20岁英年的康熙作出果断的决策，他说：“吴三桂蓄谋已久。如果不早点下手，一定会养痍遗患，到后来不可收拾。何况形势发展到了这种地步，撤也反，不撤也反，不如先发制人！”康熙下达了撤藩的诏令。

1673年11月21日，吴三桂杀死云南巡抚朱国治，发动了叛乱。吴三桂利用明朝旧将与清廷的矛盾，因此在叛乱的开始，得到了广泛的响应。1673年11月，贵州提督首先响应，1674年3月，耿精忠在福州起兵，1674年4月，郑成功儿子郑经占领泉州。吴三桂率军攻入湖南，占领常德、长沙、衡州，并且攻入江西。一时间，反清战火四起，波及全国11个省。

然而，吴三桂发动的这场叛乱纯粹是为了维护藩王割据势力，是违背民心的，缺乏号召力。同时各路义军互不统属，因此很快被清军镇压下去。战争形势发生逆转。1678年3月，为了鼓舞士气，吴三桂在衡州称帝，建立周国，结果适得其反，在政治上更加孤立。八月间，吴三桂病死在衡州。1679年正月，清军攻占长沙，吴三桂军退守贵阳。1681年清军攻占贵阳，直下昆明，吴三桂的儿子吴世璠失败自杀，1680年尚可喜儿子尚之信被杀，1682年，降清的耿精忠被处死。延续八年的“三藩”之乱，终于被清廷彻底平息。

康熙帝在平定“三藩”之乱以后，威望大为提高，统治地位进一步巩固。

雅克萨之战

外兴安岭、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我国各族人民长在这里劳动、生息、繁衍。

17世纪，俄国资本的原始积累加速，代表封建贵族和新兴商人利益的沙俄政府更加积极向东侵略扩张。明代崇祯五年（1632年），沙俄扩张至西伯利亚东部的勒拿河流域后，建立亚库次克城（今俄罗斯雅库次克），作为南

下侵略中国的主要基地。从这以后，沙俄政府不断派遣武装人员入侵中国黑龙江流域。

明崇祯十六年（清崇德八年，1643年）夏，沙俄雅库次克的长官鄂罗文派波雅科夫率兵132人，沿勒拿河下行南侵，于这年冬天越过外兴安岭，侵入中国领土。11月，这些侵略者到达精奇哩江（今结雅河）中游达斡尔头人多普蒂乌尔的辖地后四出抢掠。一次，波雅科夫抢不到粮食，竟杀食达斡尔族50人。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年）夏初，波雅科夫率领人马闯入黑龙江，一路遭到我国人民的抗击。有一次波雅科夫派出25名沙俄士兵外出抢劫，被朱舍里人（即虎尔哈人，女真族的一支）击毙23人。波雅科夫所部到处挨打，清顺治三年（1646年），他率残部逃回雅库次克。

波雅科夫回去后扬言，只要派兵300，修上3个堡垒，每个堡垒驻扎50人，其余150人到各地去收取贡赋，就能征服黑龙江。波雅科夫带回的有关黑龙江流域的情报和他提出的武力侵入黑龙江流域的打算，引起了雅库次克统领普什金的极大重视和赞许。普什金接到波雅科夫的报告后，立即上奏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

清顺治六年（1649年），雅库次克的长官派哈巴罗夫率兵70名，从雅库次克出发，年末越过外兴安岭侵入黑龙江，强占我国达斡尔头人拉夫凯的辖区，包围达斡尔头人阿尔巴西的驻地雅克萨城寨（黑龙江左岸阿尔巴金诺），遭到了中国人民的抵抗。哈巴罗夫自知兵力不足，他将大多数兵士交斯捷潘诺夫统领，自己带领少数人于次年五月初七（1650年6月5日）回雅库次克求援。不久，哈巴罗夫带来了138名亡命徒。这年夏末，哈巴罗夫携3门大炮和一些枪支弹药，再次侵入黑龙江，强占雅克萨城寨。哈巴罗夫在盘踞雅克萨期间，作恶多端。他下令将全部男俘溺死。清顺治八年（1651年）六月，侵略军攻占雅克萨与呼玛尔之间桂古达尔的城寨时，一次就杀死达斡尔人661名，掳去243名妇女和18名儿童。同年九月底，哈巴罗夫又率领200多人侵入黑龙江下游乌扎拉河口（今俄罗斯宏加里河）我国赫哲人居住的乌扎拉村，赫哲人英勇抗击。在攻打哈巴罗夫的冬营失利后，他们请求清政府给予支援。顺治九年（1652年）二月，清政府命令宁古塔章京（清代军职多称章京）海色率所部攻打哈巴罗夫军，战于乌扎拉村。我军民协力奋战，打死沙俄军10名，打伤哈巴罗夫等8人。顺治十五年（1658年）六月，顺治十七年（1660年），清政府曾先后派兵攻打过沙俄侵略军，并取得了胜利。

经过我国军民的多次打击，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的俄军一度被肃清。后来，沙俄军又到雅克萨筑城盘踞。清政府反复同沙俄交涉，都无济于事。清朝皇帝决意出兵征讨沙俄侵略军。为此，清政府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之后，为驱逐沙俄侵略军进行了一系列战争准备，比如，设置黑龙江将军统一管理边疆军政，加强边疆驻军，建立墨尔根、齐齐哈尔等军事基地，实行屯田政策，制造战舰和运粮船只，征集军粮，建立驿站，侦察水陆进军的道路和敌军情况，征集熟悉战地情况的向导，等等。所有这些，都为保障反击作战胜利和反击取胜后建立起一条较完整的边防奠定了基础。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九月，康熙帝派员前去勒令盘踞在雅克萨等地的沙俄侵略军迅速撤离清朝领土。侵略军头目米呈尼可夫不予理睬，反而率兵由雅克萨窜至爱珲劫掠。清将萨布素将米呈尼可夫击败，并焚毁了沙俄侵略军在黑龙江下游建立的据点，雅克萨成了一座孤城。这时，米呈尼可夫不但不投降，反而向国内求援，妄图顽抗到底。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正月

二十三日，清帝命都统彭春赴爱琿指挥，收复雅克萨。三月五日，清军从沙俄军俘虏口中弄清了雅克萨城的设防和兵力情况。四月，彭春等统率 3000 人，从爱琿出发，分水陆两路向雅克萨开进。五月二十二日，清军抵达雅克萨城下，当即向侵略军头目托尔布津发出通牒：命沙俄军迅速撤离雅克萨城，还我清朝领土，否则，大兵必将攻破雅克萨城，歼灭侵略军！托尔布津不听清军通牒。五月二十五日黎明，清军炮击雅克萨城，城垣渐毁，侵略军力不能支。托尔布津遣使要求在允许其保留武装的条件下撤离雅克萨。经彭春同意，俄军撤至尼布楚（今俄罗斯涅尔琴斯克）。

沙俄侵略军撤离雅克萨后，并未死心，图谋再犯。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秋，莫斯科派兵 600 名增援尼布楚。尼布楚头目得知清军已撤离雅克萨时，便于这年 8 月由托尔布津率大批沙俄军再次到雅克萨，筑城盘踞。康熙帝查明军情后，于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十三日（1686 年）下令反击。同年七月二十四日，清军 2000 余人进抵雅克萨城下，将城围困起来，勒令沙俄侵略军投降。托尔布津不理睬。八月，清军开始攻城。托尔布津中弹身死，改由杯敦代行指挥，继续顽抗，等待援兵；清军在雅克萨城的南、北、东、挖壕围困，在城西河上派战舰巡逻，切断守敌外援。沙俄侵略军被清军围困近一年，826 名侵略军只剩 66 人了，雅克萨城旦夕可下。

这时，沙皇急忙向清康熙帝请求：除遣使议定边界外，乞撤雅克萨之围。康熙帝立即答应了俄国沙皇的请求，准许沙俄军残部撤往尼布楚。康熙二十七年（1688 年）八月二十日，清军后撤至爱琿和墨尔根。

雅克萨反击战结束后，中俄双方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 年）七月二十四日缔结了《中俄尼布楚条约》。条约规定以外兴安岭至海、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为中俄两国东段边界。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均为清朝领土。在中俄谈判期间，清朝准噶尔首领噶尔丹叛乱，为应付国内变乱，康熙帝在谈判中一再退让，失去了石勒喀河西面音果达河一带的领土，又将尼布楚等地划给了俄国；对属于中国的乌达河（乌第河）地区，清朝也作了“暂行存放”，“再行定议”的让步。

台湾归属清版图

郑成功赶走荷兰人，收复台湾，成为彪炳千秋的民族英雄。

但从历史的角度看，郑成功攻取台湾的最初目标是建立一块牢靠的反清复明的根据地。在收复台湾后，随即建立了郑氏政权，与清政府对抗。这样，台湾实际上仍处于与统一的中央政府版图割裂的状态。清政府出于统一中国，巩固政权的考虑，决计将台湾收归版图。于是清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战和互补，剿抚并举的方针，先后使用和谈、招抚、封锁和围剿四种手段，历时 40 余年，最终统一了台湾。

最早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是福建水师提督施琅。施琅曾是郑成功之父郑芝龙的部将。后又随郑成功起兵抗清。因诛杀犯罪的仆役触怒郑成功，父兄子侄几尽杀光，唯独施琅侥幸逃脱，投归清朝，被授予水师提督、靖海将军之职。康熙六年（1667 年），施琅上书皇上：台湾一日在外，国家便无宁日。15 岁的康熙帝对施琅上书非常重视，下诏召施琅进京，面奏所见。次年三月，施琅奉旨进京，再次向康熙奏明统一台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统台大计正式

列入清政府的议事日程。

郑成功在康熙元年（1662年）病歿台湾，其子郑经承继郑氏政权。此时集团内部发生权力争斗，人心惶惶，政权支柱不稳。清政府没有趁此大好机会武力攻台，而是遣使与郑氏议和。郑经迫于解决内部纷争，以除后顾之忧，遂密令心腹与清使谈判，还上缴了明朝廷赐予郑氏的敕命等，骗取了清政府的信任。第二年6月谈判仍在进行。而在这拖沓的谈判中，郑经已平息内乱，稳定了政权，便马上翻脸拒和，并率军登陆金厦，在福建沿海与清朝对抗。

清政府虽知中计，但仍未放弃和谈的努力，在以后的20多年中，屡屡遣使主动与郑氏和谈，但因郑经顽固坚持“台湾远在海外，非属版图之中，对他们要以外国之礼相待”的立场，致使和谈屡屡失败。清政府作出的最后一次和谈努力是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十二月。清政府表示完全满足郑经提出的“不削发，只称臣纳贡，照高丽、朝鲜事例”的要求，但郑氏集团还是将和谈的大门关死。和平方式走到尽头，一场战争不可避免。

清政府在实行和谈政策的同时，对郑氏集团广泛展开招抚纳降，以达分化瓦解的目的。清政府很早就规定，凡海上武官率众投降者，不问真伪，一律照原职补官。还下令对沿海等地与郑军有乡邻戚党关系的人实行保护，不许挟嫌陷害。康熙十八年（1679年），清政府在漳州开设“修来馆”（又称招来馆），招来的文官照原衔报补，武官一律保留现职。对士兵和平民分别赏银20两和50两。士兵愿入伍者立即拨营领饷，愿回乡者送回原籍。对来而复去又来者，屡来屡赏，不加追问。对郑军间谍，不但不究，反诱以厚利，收为己用。这一招抚举措，深得人心，来降者甚众。康熙十九年（1680年），郑经的总督朱天贵一次率文武官600余人，兵士2万余人，大小船只300余艘归清。清政府借投诚的郑军将士及他们带来的战船和海战技术，迅速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水师，并在郑氏旧将施琅的统率下，作好武力攻台的军事部署。

招抚纳降虽然瓦解和削弱了郑氏政权的力量，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收回台湾的问题。清政府在和谈与招抚并举的同时，还采取了严密封锁台湾岛的政策，以挫动郑氏政权的经济支柱，削弱郑氏的军力、物力和财力，为武力攻台奠定基础。

台湾经济对外依赖性很强，对外贸易较为发达。郑氏政权利用对外贸易维持生计和军用开支。但其粮食和用于造船的木材均需从大陆和外国进口。清政府抓住这个弱点，一方面专门遣使发布恩诏于与台通商各国，断绝其与台来往。另一方面采取严禁出海和内迁沿海居民的“迁界禁海”的办法，封锁大陆与台湾的经济往来。清政府的封锁政策使得郑氏集团的财源断路，军需财政日益难支，只能频频加重对百姓的苛捐杂税。百姓自然怨声载道，陡增离心。由于粮食紧缺，郑氏军队不得不分兵屯田，军力自然削弱。战船因得不到木材而连年失修，海战优势也丧失殆尽。

经济封锁虽效果良好，但对清政府本身也不是没有影响。长年的迁界禁海，使得沿海土地荒芜，百姓流离失所。对外贸易的停顿，国家财政税收也不堪重负。于是武力收台已迫在眉睫。

早在吴三桂发动三藩之乱时，郑经曾跟他遥相呼应，率兵登陆，在厦门、泉州一带作乱。三藩剿灭后，郑经退归台湾，不久病死。郑氏一些部将违背郑经的意愿，杀死了他指定的继承人，拥立他12岁的儿子郑克塽（音shu ng）上台。统治集团内江又起，郑氏集团出现政治危机，清政府武力攻台的最好时机来到了。

康熙帝在清政府最后一次与郑氏集团和谈的前一年已密命福建水师提督施琅专筹攻台事宜。施琅从首次上书康熙，奏明解决台湾问题起，已过去 30 余年。年已 60 余岁。

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六月十五日，施琅率领水师出征。施琅在战略上稳扎稳打，逐步推进，以攻取澎湖为第一步，然后直逼郑氏老巢。在战术上采取速战速决，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方针。

郑军派出久惯海战的大将刘国轩坐镇澎湖，当听得巡哨船报告清军战船密密麻麻飘向澎湖后，他胸有成竹，马上调船遣将，镇守各处要隘关口。郑军对这场海战也早已有所准备，他们知道清军武力攻台是迟早的事，所以在澎湖修建炮城，排列战舰，静候清军到来。刘国轩熟悉海峡气候，知道每年此时常有台风，便采取严密布阵，以守为攻的战术。

清军依仗船多，顺风，直冲敌阵。不料船多顺风此时反倒变成劣势，挤在一起，难以把持，进退两难。郑军各营镇战船四面出击，围着拥在一起的清军船队猛攻。清军船队施展不开，极为被动。一马当先的施琅的指挥船被郑军船只包围。施琅眼部被流弹擦伤，血流满面，倒在甲板上。部下大惊，施琅却翻身站起，大吼“无妨！”他包好头，继续指挥战斗。郑军炮船围着施琅的帅船不放，情势危急。一些清军将官见郑军气势凶猛，畏怯不前，只见提标右营游击蓝理驾船独冲敌阵，救援主帅。他一连击毁两条敌船，自己也中炮负伤，铠甲烧透，腹裂肠流。但他不肯退却，在另一名勇将金门镇千总游观光的配合下，帮助施琅指挥大军退出战场。

第二天，清军诸将上中军船议事。施琅头部裹伤，沉脸呵斥十数个懦怯将领：“尔等不思协力迎敌，互相观望，若无蓝理，本军门岂不险乎！”随即命人绑了推出斩首。众将齐跪在地，请求宽恕，施琅方才稍平怒气。令重赏蓝理二千两白银，游观光一千两白银。

随后施琅与诸将共商破敌良策。一将献上五梅花阵法：“郑军船少，我军船多，可以五只船结为一队，攻击郑军一条船。不结队的则当游兵、奇兵、援兵，相机接应。这样既不会自相冲撞，又能各尽其能。”施琅听后大喜，下令用此法破敌。次日，施琅又亲驾小船潜探郑军营寨。回营后忽闻天空雷声大作。施琅暗喜，以为天助。因他深知六月打雷，就不会有台风。

二十二日清晨，清军编队出战。施琅中军编为八队直冲敌阵，50 只船为左军，50 只船为右军，从西侧外围进入战场，80 只船作后援。郑军果然上当，全军出动围住清军中军猛打。清军 50 余条中军船拼死抵抗，双方炮火如电闪雷鸣，浓烟遮天蔽日。战至中午，清军大将林贤的战船被郑军大将刘国轩指挥的十多条战船团团围住，炮弹石矢雨点般落下。林贤弹尽石绝，砸碎铁锅装入炮膛杀敌。连中三箭的林贤正欲下令放火自焚时，施琅率船队赶来救援，杀退围攻的敌船。施琅登上林贤的战船，对林贤抚背赞道：“今日如若得占澎湖，你是第一功啊！”

这时，清军左、右军和后援船队从外层包围了战场，清军内外夹攻，郑军损失十之七、八。刘国轩见大势已去，忙带残兵退回台湾。

清军攻占澎湖，台湾的郑军闻风丧胆，一批将领纷纷派人与施琅接洽，准备里应外合，配合清军。刘国轩见人心瓦解，便向郑克塽提议降清。而郑氏权臣冯锡范却倾向建威中镇黄良骥的主张，放弃台湾，逃往吕宋。最后刘国轩一批主张回归祖国，和平统一的将官占了上风，迫使冯锡范与刘国轩一

道说服了郑克塽降清。郑氏派冯锡范等人到澎湖送缴册印，奉表归降。施琅率军和平登上台湾岛。

消息传到京都，康熙帝大喜，脱下“龙袍”赏给施琅，并封为靖海侯。同时封郑克塽为汉军公，移驻北京；封刘国轩为天津总兵；对郑族人氏、投降官兵、亡明宗室都给予优厚待遇，妥善安置。不久康熙下诏，将郑成功、郑经父子灵柩归葬南安。

随后，施琅力驳朝廷一些人“放弃台湾不管”的主张，上疏奏请设府台湾，委吏主政，以免被荷兰人重占。康熙帝十分赞同，下令设台湾府，辖三县，归福建省属下。从此，台湾正式隶属中央政府，列入清朝版图。

雍正即位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阴历十一月十三日，做了60年皇帝、年近70岁，在京郊的畅春园病逝。他的第四个儿子胤禛（音 yīn）即禛皇帝位，这就是清朝历史上著名的雍正皇帝。

雍正继位这件事，统治阶级内部展开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

皇位继承问题是关系到政权是否稳固，统治能否延续的重大问题。历代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作为一代英主，在政治上有过许多建树的康熙，自然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他一生中生了35个儿子，20个女儿，儿子长大成人的有20个，其中一人出继，实际19个。这么多的皇子，一个个都是皇位的觊觎者。康熙大概是预先考虑到了这点，担心儿子们将来为争夺皇位而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早在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就把刚刚二岁的皇二子胤禔（音 réng）立为皇太子。皇长子名胤禔（音 tí），是惠妃所生，算庶出。胤禔是康熙第一个皇后孝诚皇后所生，康熙按立长立嫡的传统体制，立他为皇太子。康熙对他进行了精心的培养。聘请最有名的学者张英、李光地、熊赐履、汤斌、耿介做他的师傅。康熙经常带他和其他皇子出去打猎或巡视，有时康熙出征，命胤禔留在京城，代理政事。康熙把许多重要事务的处理都交给了他。从胤禔本人来说，长得聪明俊秀，能文能武，在皇族中确实是出类拔萃的。似乎这一切都已十分圆满，十分顺理成章。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走向与主观愿望相反的方面。由于皇太子立得早，在皇太子周围集结起一股依附和拥戴他的政治势力，这股势力以索额图为首。索额图排斥异己，把大学士明珠排挤出权力中心。另外，长期的皇储地位也助长了胤禔的野心。胤禔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贪财好货，酗酒好色，因不能早登大位而性情暴躁。皇太子这个权力中心的出现，和皇太子的恶行的增长，大大出乎康熙的意料，也为康熙所不容。康熙一方面大权独断，在传位问题上绝对不容任何人置喙，一方面行政注重宽仁，在伦理上讲求孝道。而皇太子的所作所为已与康熙的主张背道而驰，因此康熙对皇太子加强了控制，并采取了严厉措施。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以“背后怨尤，议论国事”、“结党妄行，威吓众人”罪名，将索额图拘系，随即将他处死。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九月，康熙带胤禔、胤禔及几位小皇子从木兰狩猎返京途中，随行的皇十八子胤禩生了重病，可是胤禔对这个小弟弟毫无关切之心，康熙对此十分不满，用兄友之义责备他。胤禔不但不听劝告，反而暴怒。与此同时，胤禔还在晚上宿营时，在康熙的帐篷周围走来走去，并从帐

篷缝隙中偷看，这些异常举动引起康熙的猜疑、恐惧，以为胤禔要谋害自己。康熙于是在路上就将胤禔拘禁起来。一回到京城，立即举行告天仪式，正式宣布废掉皇太子，罪名是“不法祖德，不遵朕训”。并且将他圈禁起来。

皇太子的被废，似乎给其他众皇子带来了希望。诸皇子为了争立皇太子，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皇长子胤禔本受康熙钟爱，常奉命出征，或处理政务，因为是庶出，未能立为太子，心怀怨恨。他曾请喇嘛巴汉格隆行魔胜术，幻想咒死胤禔，这次胤禔被拘系，他向康熙建议，杀了胤禔，而且不必父皇动手，由他动手。康熙一听，十分恼怒，加上行魔胜术的事被告发，康熙革去他郡王爵位，将他终身监禁。皇八子胤禩（音 sì）也是一个精明能干，很有心计的人。他的能量最大，善于邀买人心，党羽很多，野心也不小。就在废黜胤禔以后两个月，康熙命令朝臣商议立嗣，出乎康熙的意外，朝臣们竟然众口一词，推举皇八子胤禩为皇太子，其中有国舅佟国维（康熙妻兄）、武英殿大学士马齐、领侍卫内大臣阿灵阿等，还有皇九子胤禔、皇十子胤禛、皇十四子胤禵等。胤禩深孚众望，不但没有使康熙高兴，反而引起他的猜疑。康熙从皇太子的废立中得出的教训之一，就是绝对不准结党谋位。其次必须讲诚孝。胤禩在这些方面，又是与康熙抵触的。1714年11月，康熙出巡塞外，驻骅遥亭。胤禩往祭亡母，竟然只派一个太监去遥亭向康熙请安。康熙大为恼怒，老帐新帐一起算，指斥他“自幼阴险”，“大背臣道，觅人谋杀二阿哥”，“与乱臣贼子等结成党羽，密行奸险”，等等，总之一句话，“不孝不义”，于是将胤禩锁拿，交议政处处理。

皇子们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似乎激恼了康熙，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四月，康熙出人意料，以独断的手段复立胤禔为皇太子。理由是胤禔被陷害，因镇魔而得狂疾，因此举动失常。现在狂疾已愈，故复立为太子。然而胤禔本性已定，难以改变，复立之后，又聚集党羽，准备抢班夺权。康熙入1。一年（1712年）！一月，康熙丙废太子，指荐他“狂疾未除”，“秉性凶残，与恶劣小人结党”，凤奶从此遭长期禁锢。

围绕立储的长期纷争，使得康熙愤想抑郁，心态失常，心力交瘁。从这以后，直到康熙去世，没有再立皇太子。康熙在这个问题上，始终坚持独断立场，不容任何人插手，甚至不许任何人议论。而他自己，往往担心大权旁落，疑神疑鬼，态度反复无常，办事多疑善变。

胤禛模在这场错综复杂的皇位争夺战中，以他高超的手腕和特殊的禀赋，终于赢得了胜利。凤旌生母是德妃吴雅氏，出身低微。但他交由皇贵妃伶氏抚养。修氏是怪国维之女，隆科多的姐姐。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侯氏册封为皇后，恩模认她为养母，对她格外孝敬。隆科多以国舅之亲，任步军统领，掌握着拱卫北京和畅春园的兵权，他成了激浪笼络的首要对象。恩模不同于其他皇子，他是不露声色地暗地里结交朋党。除了隆科多，还有年羹尧。他是脱婚妃子的哥哥，多年担任四川陕西总督。此外还有福建道员戴择、礼部侍郎蔡涎等。恩模表面上态度超然，常与佛教徒来往，多次声明对皇位不感兴趣，似乎是追求怕情悦性，与世无争的闲人。他与诸皇子的关系不亲不疏，同等对待，四方讨好。对康熙，他表现出特殊的孝敬。康熙在第一次废太子时，气得生了病，拒绝治疗，机模冒着死罪劝康熙治病，为此事，后来康熙对他有特别好感。撒棋书法精好，仿效康熙笔体，这点也很受康熙赞赏。他办事认真。凡是康熙要他办的事，事无大小，都办得非常妥当完善。他执法严肃，奖惩分明，表现出杰出的办事才能。他幼年时，脾气喜

怒不定，康熙曾教导他“戒急用忍”，输模经过长期磨练，终于练成喜怒不形于色的脾性，凡事善于忍让。凡此种种，他后来居上，赢得了康熙的赞誉，说他度量过人，深知大义。然而，康熙生前似乎并没有明确将他立为储嗣，便去世了。

那么，胤禛是怎样登上皇位的呢？现在唯一的依据是雍正七年（1729）颁布的《大义觉迷录》。这是一部颁之学宫，令天下士子颂读的官书。据书中记载：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阴历八月，康熙在热河行围一个多月，返京后又去南苑行围。十一月初七，回畅春园，说是“偶冒风寒”。初九因冬至将近，命胤禛到天坛斋戒，以便代他行祭天仪式。十三日凌晨，病情突然恶化，传诸皇子入见。皇三子胤祉、皇七子胤祐、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禔、皇十子胤禛、皇十二子胤禔、皇十三子胤祥以及步军统领隆科多至御榻前，传遗诏如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下达诏书时，胤禛并不在场，他赶到畅春园，进见康熙问安，直到康熙去世，隆科多才向胤禛宣述遗诏，胤祉等向他叩首，于是胤禛即皇帝位，改元雍正。

雍正即位后，隆科多和皇子们差不多被雍正处死精光。加上《大义觉迷录》在雍正即位后七年问世，因此，人们总觉得雍正继位，其中似乎另有文章。

乾隆下江南

乾隆时代，清朝的统治达到了鼎盛阶段，经济已经恢复，并且得到较大的发展，政府的财力也比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更加充裕。但是，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带来的不是社会的进步，而是统治阶级的加速腐化和堕落。

康熙皇帝是比较注意节约，力戒浮费的。他曾六次南巡，主要目的是为了治理河务，安抚民心，促进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因此他比较深入地考察治河工程，调查民情，态度比较谦虚，生活上比较俭朴，一般驻跸官署，不修行宫，注意不致于扰民。然而即便如此，也是“把银子花的像淌海水似的”，不知挥霍掉多少劳动人民的血汗。

乾隆即皇帝位以后的头十来年，他必须处理雍正朝遗留下来的许多积弊，梳理各种矛盾关系，树立自己的形象，因此，他治理朝政是兢兢业业的，也是精明强干的。到了乾隆十五年（1750年），当他成功地解决了西南苗民问题，降顺了四川的金川土司之后，这位虚荣心极强的皇帝，奢侈之心也大大膨胀起来。他作出了南巡的暗示。地方官立即迎合，递上了“江南绅士百姓殷切盼望皇上巡幸”的奏章。乾隆貌似无动于衷，将奏章交付廷议。朝中大臣们廷议的结果，认为“南巡关系地方军政，河务海防，以及民间疾苦，必须举行”。乾隆这才作出南巡的决定。他打出向祖父学习的旗号，叫“法祖省方”，目的是治理河务，修筑海塘，了察民情。同时又把太后推出来，叫作“奉太后巡幸”；可是他内心里想的却是，“江南名胜甲天下”，人一生中岂可错过。

乾隆仿效祖父康熙皇帝，也来了一个六下江南。前四次都是奉太后巡幸。乾隆四十二年皇太后病逝。第六次巡幸江南时，乾隆已经74岁。

历次南巡一般都是正月十五日前后从北京动身，陆路经直隶（今河北省）、山东到江苏的清口渡黄河，乘船沿运河南下，经扬州、镇江、丹阳、常州、苏州进入浙江境内，再由嘉兴、石门抵杭州。回銮时，绕道江宁（今南京市），祭明太祖陵，检阅军队，大概四月底或五月初返回北京。整个南巡，水陆行程约 6000 里。

为了供皇帝车马行走，专门修筑了御道。御道的修建，要求极为严格：标准是帮宽 3 尺，中心正路 1 丈 6 尺，两旁马路 7 尺。路必须是笔直的。为此，许多民居被拆毁，坟墓被挖掘，良田被毁坏。凡是石板、石桥，都要用黄土铺垫。皇帝车仗经过之前，一律泼水清尘。途中建筑行宫 30 处，以备驻蹕；除了行宫，许多地方还搭盖黄布城和蒙古包帐篷以供住宿。每隔二、三十里，设尖营，供小憩打尖用。进入江南后，主要是水程。共有船 1000 艘，皇帝和后妃乘坐的船名“安福舡”和“翔凤艇”，动用拉纤的河兵 3600 人，分作 6 班，每班 600 人。整个南巡队伍，包括皇帝、后妃、王公、贵戚、文武百官以及担任警卫扈从的士兵，共 2500 多人。动用马 6000 匹，骡马车 400 辆，骆驼 800 只，征调夫役近万人。队伍在陆上行进，浩浩荡荡，迤迤百里；在船上行驶，舡舡相接，旌旗蔽空。所经之处，地方文武官员身穿朝服，跪着接驾；缙绅监生焚香俯伏于道路之侧。为了表示皇帝爱民敬老，还要物色一批妇女老人捧香跪迎。一些 80 岁以上的老人，身穿黄绢外褂，手捧香火，也杂在跪迎的队伍之中。

途中的生活条件和设施，与在宫中没有什么差别：每天早晚照样鸣钟奏乐。茶房所用乳牛，多至 75 头，膳房用羊 1000 头，牛 300 头，都是从北京提前运到镇江、宿迁等地，随时宰用。乾隆对饮食最为讲究，对饮水尤其重视。在避暑山庄，一定要用荷叶上的露水烹茶。在南巡途中，饮用水都是远道运来，在直隶境内，用香山静宜园的泉水；到德州，入山东境，用济南珍珠泉水；过红花埠，入江苏境，用镇江金山泉水；到浙江，用虎跑泉水。饮水都是如此讲究，其它饮食，都是从全国各地运来，地方官的进献，土产物，山珍海味，更不用说了。

为了迎接皇帝的南巡队伍，为了使圣心开悦，地方上不惜工本，竭尽奢华、铺张之能事。首先是沿途搭建彩棚、牌楼、景点、香亭。那些彩棚都搭得非常豪华。比如直隶保定府长芦隘口，是各省商人会聚的地方。富商们早就从苏州、杭州买来彩缎和各种奇玩，在路旁搭起各种各样的彩棚，有的像楼阁，有的像亭台，各自争奇斗妍，绵延几十里。其次是大肆修建园林，添设奇花异石，供皇帝观赏。苏州狮子林、扬州九峰园，都是为供皇帝御览进行改建或扩建的。九峰园中有无数奇石，其中有九个最高的奇石，个个像苍颜白发老人。乾隆看了后，特别欣赏，竞选中其中两个，命人搬到北京御苑中去了。扬州平山堂本来没有梅花，乾隆第一次南巡时，盐商们捐资植梅一万株，以供皇帝观赏。为了显示繁荣和热闹，焰火、演戏，也是沿途必备的。乾隆南巡开始时间，大都在元宵佳节前后，出此沿途大张灯火。第五次南巡时，临近镇江，只见运河南岸立着一个硕大无比的仙桃，用绿叶映衬，鲜嫩可爱。当御舟驶近，忽然间烟火大发，光焰四射，那颗仙桃轰（音 hu）然裂开，中间原来是一个巨大的舞台，上面有几百人，正串演寿山福海的新戏。这是盐商们为讨乾隆欢喜，挖空心思设计的。也就是这次南巡中，直隶新成知县制作“爆灯”，突然发生爆炸，烧伤 10 多人。

从上面列举的事实可以看出，乾隆的六次南巡，耗费了巨额的社会财富。

但乾隆毕竟是位有作为的皇帝，首先，他游乐而不废政务。在南巡途中，他带着处理政务的班子，各地报告，奏章直接送沿途驻蹕行宫，乾隆的审阅批复与在宫中没有两样。第二次南巡时，正值平准战争，乾隆一边巡幸，一边阅读前方奏报，指示方略，发布命令。利用召见地方官机会，考察属员，昏聩的江西巡抚郝硕，就是在考察中就地免职的。其次是视察河务海塘工程。乾隆二次南巡时，视察了徐州治河情形，命令将土堤改筑成石堤。他大力表彰治河功臣，也造就了一批治河专家，如裘曰修等。他两次视察了浙江海宁的海塘工程，命令修筑了柴塘与石塘两道塘坝，对于抗御海潮侵袭，发挥了良好的作用。第三，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做大量笼络东南士人的工作。他到江宁，目的是祭明太祖陵。他喜欢舞文弄墨，吟诗题额。有一位江南老名士叫沈德潜，67岁中进士，担任过翰林院编修，这时退休在家。是清代著名诗人。乾隆南巡时，让沈德潜陪同，两人常以诗唱和。有一次游西湖，恰逢天降春雪，乾隆诗兴大发，吟道：“一片一片又一片，三片四片五六片，七片八片九十片……”可是到第四句，文思衰竭，再怎么也吟不下去了。这时是沈德潜替皇上解了围，续道：“飞入梅花都不见。”乾隆大喜，把身上的貂皮大衣脱下赏给了他。

然而，这些功绩终究不能弥补六下江南造成的劳民伤财、去俭倡腐的过失。乾隆中叶以后，贪污腐化之风盛行，吏治愈益败坏，晚年更宠信和珅这个大坏蛋，激化了社会矛盾。清朝统治从此一蹶不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也就进入了它的末世。

大贪官和珅

清嘉庆初年，我国民间有所谓“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说，这两句顺口溜，讲的是当时嘉庆皇帝一即位，便下令查抄他父皇的宠臣和珅之家，并勒令这个有名的大贪官上吊自杀，自己从中发了一笔大财的故事。这种事乃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物，它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政治的腐败和官僚的腐化已达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和珅姓钮祜禄氏，字致斋，满洲正红旗人。他虽生员出身，但小时家很贫穷，后来是靠袭世职当上清朝三等侍卫的。具体点讲，就是在乾隆皇帝身边当御前侍卫。

有一次，乾隆要外出巡视，到了临出发的时间了，掌管车骑仪仗的官员还没有找到皇帝的专用黄盖。乾隆非常生气，厉声问道：“这是谁干的？给朕说说！”有关的官员吓得只顾跪在地上叩头，一声也不敢吱。可这时却有一名站在一旁的青年侍卫态度从容地说：“启禀皇上，这应该是管黄罗伞盖官员负的责任。”乾隆随声转头望去，只见那名青年侍卫眉清目秀，身材修长，在众侍卫中有如鹤立鸡群，他突然感到此青年面容多像自己记忆深处的一个人啊！

原来乾隆弘历十八九岁当太子时，有一次入宫向父皇雍正请安，路过时看见一个面貌姣好的雍正之妃，面对菱花镜正梳理着头发哩。弘历忽然从背后用两手遮掩住此妃之目同她开玩笑。此妃不知是东宫太子，大吃一惊，用力将手中木梳往后一击，恰中弘历前额，弘历感到一阵剧疼，撒手狼狈逃去。第二天弘历在往母后处请安时，母亲见他面额有伤痕，一再询问，弘历据实

回答，没料到引起大怒，怀疑是该妃调戏勾引太子，立即命人传令赐妃子死。弘历得知此消息，不觉大惊，想坦白其冤，一时又不敢出面，经再三斟酌，决定前往妃子住处探视，正走在半路，就听人传来该妃已用白绫自缢，弘历只得快快而返。这一事件对弘历刺激很深，直到他登基作皇帝，脑海中仍留下歉疚的阴影。现在乾隆面对从容答话的和珅，好似见到当年的故人，一时也就把要出巡的事忘在一边了。他摆驾回宫后，就密召和珅进宫，让他跪近身旁，详细地询问了和珅的姓名、身世、读过了些什么书等等。和珅一一作了简明扼要的回答。乾隆见和珅对答如流，更加高兴，也许是“爱屋及乌”之故吧，当即传旨宣布：提升和珅为副都统，总管御用仪仗车马兼安全警卫。从此，和珅就交上好运气了。第二年，也就是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他先当上户部侍郎，不久又提升为军机大臣兼内务府大臣。在满朝的文武百官心目中，和珅正是官场上的一颗冉冉上升的耀眼之星。

和珅青云直上，连连升官，这当然与他会揣摩乾隆心思，办事使皇帝心情高兴有关，但光靠会吹牛拍马也不行，官运亨通之初，他还是认真依法办了一两件事的。例如，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他奉皇帝之命和侍郎喀凝阿同去昆明查办

云南总督李侍尧贪污受贿一事。李侍尧原是乾隆重用过的的心腹，为官也办过一些好事，现在突然要查清他的案子，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和珅到昆明后，未去惊动李侍尧，而是微服查访，等到掌握了确切的材料，就逮捕了一名李侍尧的亲信嫌疑人，然后即穷追猛攻，此人终于被迫供出了李侍尧索贿贪污的详情。再后便将此情连同自己到昆明后了解到的云南民风吏治情况，一并上奏乾隆皇帝提请裁处。这件事和珅干得极为干净利索，表现了他的办事能力。这也在广大朝臣的面前，证明了乾隆重用和提拔他和珅是正确的。这样一来乾隆面子格外风光，自然分外高兴，等和珅一返回京师，加官晋升，频频而至。到乾隆临驾崩前夕，和珅获得的官衔真多得吓人，除御前大臣兼都统、领侍卫内务大臣、大学士之外，还有理藩院尚书、《四库全书》正总裁等职务。甚至他同皇帝攀上了儿女亲家，乾隆的女儿和孝公主，嫁给了和珅的儿子做媳妇，由此可见乾隆对和珅宠爱之程度了！

和珅掌握了乾隆朝的大权后，就公开贪赃受贿。无论满汉大臣，或求升官，或求免罪，都得向和珅进献黄金白银，奇珍异宝。乾隆年间，江苏吴县有一个名叫石远梅的珠宝商，此人经常怀中揣着锦盒，盒内有锦囊装着黄金大丸，如将此金丸剥去外壳，就可见到里边藏有大珍珠。这些珍珠重的一粒可值2万金，较轻一点的一粒值1万金，就是最轻的一粒也值8000金，价格算得上够昂贵了。但是，当时的士大夫们都争着抢购，唯恐自己买不到，你要问他们买这么贵的东西干什么，大家都异口同声说：“还不是买了送去给和中堂和大人！”只此即可见和珅在当时贪赃受贿情况的严重了。

和珅趁着自己掌管国家财政收入和负责保管皇室财宝之机，连国家和皇室的财物也明拿暗偷回自己的家里。他的胆子也够大的，连全国各地进贡给皇帝的珠宝古玩，也敢先挑好的自己留用，剩下的才送进皇宫。有一次，皇宫内某处摆着一个直径一尺左右的碧玉盘，它是乾隆皇帝非常喜爱的一件摆设，可是有一天却为七王子不小心打碎了，他怕以后乾隆问到这个玉盘，急得团团转。他的弟弟成亲王劝道：“哥哥不要急，我们去求求和珅吧，他一定会弄回个碧玉盘补上的。”于是这兄弟二人找到了和珅，讲述了此事并求和珅给想想办法。和珅却装着为难的样子说：“这种玉盘岂是人间能随便找

到的，我恐怕也很难找到啊。”七王子听到和珅这么讲，吓得哭起来了。成亲王知道这是和珅故意拿一把，便用手招和珅到僻静处说了不少好话，和珅才答应去弄弄试试，约定第二天在某处会面。到约定时间，七王子兄弟一同前往，只见和珅已先在那里，他拿出一个碧玉盘给他们看，但见此盘的色泽及质量比原打碎的玉盘还要好，而且盘子的直径还要大，大约在一尺五寸左右吧。七王子哥俩躬身连连表示感谢。此事之后，宫中不少人都知道了四方进贡之物，大多先被和珅挑选回家，剩下者才送入皇宫，并非谣传之话。

和珅仗着乾隆的宠爱，见朝内外无人可对他奈何，便胆子更加大了。他曾在深更半夜穿着皇帝的服饰，在家中对着大镜子得意地哈哈大笑；还从皇宫内偷运出大量的珍贵木材给自家盖房子。

对于和珅的专权和贪财行为，当然也有看不下去的人，其中最主要的是太子瑆（读作珅），他没有对和珅发作出来，主要是见父皇宠惯着和珅，不愿意惹得乾隆生气于自己不利罢了。

和珅是一个脑子何等灵活的人，他怎能不知道乾隆年事已高，自己总有一天要和继位的太子面对相处。乾隆六十年（1795年），已是84岁高龄的乾隆决定将帝位传给第十五子颙琰，自己当太上皇，不过军机大事新皇帝仍要按太上皇的训谕办。和珅是最先知道乾隆上述决定的人，为了讨好新皇帝，暗示本人有拥戴之功，他在乾隆的决定正式宣布之前，按满族人以赠“如意”（一种工艺饰物）表示祝愿吉祥喜庆之意的习惯，急忙给太子颙琰送去一柄玉如意。可是，和珅却在暗中仍监视着新皇帝的行动，并随时向太上皇报告，这当然更增加了颙琰，即嘉庆帝对他的反感。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活了89岁的乾隆皇帝一命归西，嘉庆帝亲政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同月，清仁宗嘉庆皇帝下令对和珅罢官抄家，还将他逮捕关进大牢。从和珅家抄出来的财产有人作了统计，清单计有：“凡109号。赤金580万两，生沙金200万两，元宝银940万两，当铺75座，银号42座，土地8000余顷，花园一处，亭台64所，房屋近2700间。此外，尚有大量古玩、玉器、瓷器、绸缎、皮张、洋货、首饰、服装等。估价不少于8亿两黄金！”乾隆年间，政府每年收入总数是7000万两黄金，算来还不到和珅家产的十分之一。和珅称得上是一名富可敌国的大贪官了。

当时清朝的文武百官、民间的广大百姓对和珅的贪赃枉法罪行无比愤慨，有很多人建议对和珅应该千刀万剐处死。但嘉庆帝觉得和珅终究是他父皇的宠臣，不便处以凌迟，匆忙下了一道命令，勒令他上吊自杀了。

和珅死后，他那8亿两黄金的家财到哪里去了呢？须知中国近代史上庚子和甲午这两役战败的赔款，用和珅一家之私产即可报销了。不用细说，这笔巨款理所当然地流进了嘉庆的口袋里去了。当时曾有位大臣建议要公布和珅家产的处理使用情况，嘉庆听到后大发雷霆，他气哄哄地说：“看你敢追查一下试试？今后大小朝臣就不要再提和珅这笔家财了！”这话以“小道消息”在民间传开之后，有人就编出了“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顺口溜。

曹雪芹黄叶著书

曹雪芹是位伟大作家，所著长篇小说《红楼梦》是我国文学宝库的瑰宝，

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绚丽的奇葩。

曹雪芹名霫，字梦阮，辽阳（今属辽宁省）人氏，他家本是汉人，由于先祖归附“满洲旗”，称为老汉姓旗人。他家世代都是“包衣”。包衣的意思是“家里的”、“家下人”，也就是家奴。由于隶属多尔衮“正白旗”，随着满人入主中原，他家就由“包衣下贱”一跃而成为“从龙勋旧”。

曹雪芹的曾祖母姓孙，曾是康熙皇帝的保姆，一手把玄烨抚养带大。从曾祖曹玺起，他家一直受到康熙的亲信，接连3代承袭“江宁织造”的官职，享尽荣华富贵，长达60余年。

雍正（胤禛）利用阴谋手段登基为帝后，残酷杀戮、迫害曾经与他争夺皇位的兄弟，株连到了曹家，遭到抄家惩处。经过这场变故，曹家败落下来。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雍正并没置他家于死地，多少留了一点“浩荡天恩”。曹家从南京迁回北京，战战兢兢过了好几年。

雍正做皇帝做到第13个年头忽然“驾崩”，由他四子弘

历继位，是为乾隆帝。前此，曹家可能有个女儿选入宫中，作了弘历某种等级的妾侍，家运出现了“中兴”。可惜好景不长，曹家再次卷入政治斗争漩涡，又一次被抄家。曹家至此一蹶不振，彻底败落了。

曹家两次抄家，曹雪芹年龄有多大？由于史料短缺，曹雪芹生卒年月众说纷纭，见解尚未获得统一。

先从曹雪芹的卒年谈起。一为“壬午说”，依据脂砚斋甲戌本眉批“壬午除夕，芹为泪尽而逝”的话，定为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一为“癸未说”，依据敦敏《樊斋诗钞》中《小诗代简寄曹雪芹》一诗编于癸未年（1763年），则曹雪芹不可能前一年就死了。这样，卒年就成了悬案。

从卒年推断生年，亦有两说：一为“乙未说”。此说依据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三月七日曹颀奏摺报告亡兄曹颀之妻马氏“现怀身孕，已及七月”之事，认为出身的孩子就是曹雪芹。并且，曹雪芹生前好友张宜春诗自注说曹雪芹“年末五旬而卒”，正与奏折说法吻合。一为“甲辰说”，此说依据敦诚挽诗两次说明曹雪芹死时为“四十年华”，从癸未年（1763年）往上推，应为雍正二年（1726年）。

如果以“甲辰说”推断，第一次抄家，曹雪芹不过三四岁；第二次抄家，曹雪芹也不过十六七岁。从此，他结束了“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的公子生活。

曹雪芹一度过着投亲靠友、为官宦之家作馆课童和幕僚清客生活，敦诚赠诗劝道：“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人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曹雪芹在一番颠沛流离，饱受辛酸之后，定居北京西山一个荒僻的村庄，进行长篇巨著《红楼梦》的写作。

曹雪芹过着十分贫困的生活。没有钱买纸，他把旧年皇历拆开，把书叶子反过来折上，订成本子，作为稿纸。家人妻子，举家食粥，啼饥号寒，穷愁无路，经过艰苦不懈的努力，写成了80回小说。全书尚未最后完成或定稿，曹雪芹就英年早逝了。

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红楼梦》这部小说，以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为线索，反映了贾、王、史、薛四个家族的衰败过程。作品中人数众多，无不栩栩如生；人物关系盘根错节，极为复杂。语言优美，文采斐然。

《红楼梦》问世之后，反响异常强烈。200多年来，风靡读者，长盛不

衰。由于小说内涵丰富精深，研究者代有新人新见，逐渐形成一门专门学问，称为“红学”。红学家中，门派林立，对作品和作者见解殊异。不但对曹雪芹生卒年月，出身经历没有一致结论；以致对小说人物的品评，主题的指归、价值的取向，无不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人们唯一能够取得共识的是：《红楼梦》是部伟大的不朽的小说。

恐怖的文字狱

顺治四年（1674年）十月的一天，江宁（即南京）城门像往日一样看去熙熙攘攘，实则笼罩着肃杀和恐怖。清军虽然已占领这座明朝陪都两年多，但仍未松懈其严密的控制，一切进出城门的各色人等均要接受度牒检查。这不，一个正欲出城南下的中年和尚被守城兵扣住了。清兵因和尚持有大学士洪承畴发给的护行印牌引起了警觉，遍查其行装，从经笥中搜出南明福王答阮大铖的信件和一叠名为《变记》的史书手稿。和尚当即被押送至镇守江宁的清军主将巴山那里严加审讯。因为《变记》中记录了史可法等抗清志士的悲壮事迹，被视为“逆书”。和尚受到了严刑拷问，夹足木棍折了又折，血流没趾，和尚咬定《变记》为他自撰，与他人无干。巴山实在找不出和尚与具体的反清活动有什么联系，只好奉摄政王多尔衮之命将和尚械送北京，关入刑部大狱。次年四月，和尚以私撰逆书的罪名，流放到了沈阳，12年后死于冰天雪地的异乡。这个法号函可的广东和尚是臭名昭著的清朝文字狱的第一个受害者。“函可案”也成为血腥的清朝文字狱史的开篇之作。

以文字罪人，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早有先例。汉字的多义、隐喻、音形暗合的特点，在多疑权大的封建统治者眼里，常常被视为攻讦自己的武器。更不用说成篇成句的文字中所含的讥讪、嘲讽、影射、含沙，更是“谋逆”之为。北宋大诗人苏轼就曾以诗中“包藏祸心，诽谤谩骂”而开罪权者，系狱流放。没读过多少书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更是闹出许多因字杀人的荒唐。有人给他送贺表：“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他见了大怒：“‘生’者，僧也；‘光’则剃发也；‘则’字音近‘贼’也。”硬说送表者暗指他当过和尚，做过红巾“贼”，便把送表者杀了。似这样以文字造冤狱，虽不乏历代前朝，但大规模泛滥，集中出现，则在清代的“顺康雍乾”期间。

满族贵族统治全国后，深知本民族的经济文化与汉民族有一段差距。他们自觉地努力掌握汉文化，以求尽快平衡与汉族士大夫知识分子阶层的心理距离。而同时，他们又对汉族士大夫知识分子阶层的强烈反抗心有余悸。对汉文字的某些特殊功能格外敏感，对汉族文人以诗词文章明志抒怀疑心尤重，常常能从一些字词文章、诗集史册中寻出诋毁皇帝，攻讦朝廷谋叛大逆的可怕罪名，造出一桩桩恐怖的文字狱案，并且在康熙、雍正，尤其是乾隆时期形成高峰，成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极为特殊的历史景观。

纵观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不外通过文字狱案镇压部分汉族士大夫的反满思想和民族气节；打击对皇权构成威胁的朋党集团，强化文化思想领域的专制统治。但比较而言，顺治、康熙两朝文字狱案在数量上以及自觉运用上大逊于雍、乾。顺治朝是因满清入关不久，多用武力平乱，无心顾忌纸张上的文字。就说前文所述的“函可”案，初时仅为一个偶发的小案，只因涉及巴山和洪承畴这两大统治集团官僚的个人矛盾才越办越大，且为摄政王

多尔袞所办。康熙初年的“庄廷钰明史狱”，也是在专横跋扈的辅臣鳌拜手里由小到大，最后办成颇有名气的文字大案。

庄廷钰家是浙江湖州有名的富户，他是个盲人，受“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鼓舞，也想搞一部传世史作。但他自己并不通晓史事，于是出钱买了一部明末朱国祯的未完成的《明史》，再延揽江南一带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事。在叙及南明史事时，仍奉尊明朝年号，不承认清朝的正统，还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都是清帝极为忌讳的。这部《明史》刊刻后，起初并无事，只因几年后几个无耻小人，想去敲诈庄家，才惹出事来。当时主事者庄廷钰已死去多年，庄父仗着有钱买通官府将敲诈者一一顶回。不想一个叫吴之荣的小官一怒之下告到了北京。鳌拜等人对此大感兴趣，颁旨严究。于是与庄氏《明史》有关连的人大祸临头。康熙二年（1663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山水秀丽的杭州城，清军将《明史》案一千“人犯”70人，在弼教坊同时或凌迟、或杖毙、或处绞，一时血溅人间天堂。“主犯”庄廷钰照大逆律剖棺戮尸，另有数百人受牵连被发配充军。

《明史》案开了以“逆书”索赂的恶劣先河。一些恶棍效法吴之荣，去挑别人书文中的纰漏，牵强附会，指为“逆书”，漫天敲诈。后来竟发展到歹徒们索性自制逆书，想敲诈谁就把谁的名字列上。这要数沈天甫、夏麟奇、吕中等人胆最大、心最黑。他们刻印一本诗集，假托为陈济生所编，书中作者为大江南北名士巨室700余名。康熙六年（1667年）沈天甫到内阁中书吴元莱家索银2000两被拒，遂将此书检举报官，经刑部审理大白真相，沈天甫4人被斩于西市。

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帝亲政，迅即铲除权臣鳌拜，文字狱的恶性发展也很快得到控制。康熙帝难能可贵地采取了一系列宽文网之禁、怀柔汉族知识分子的政策，使得思想界、文化界相当活跃。不少被称道为“胜国（指明朝）遗民”的著作都结集出版了。像前文提到的函可和尚在流放地所著的《千山诗集》就是在这时面世的。

雍正时期，文字狱多了起来，且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显著特点：皇帝带头搞了几起文字要案，并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雍正帝出即位时流出他“矫诏夺篡”的宫闱秘闻，传至全国各地，使得人们对他皇权的正统性发生怀疑。至少在最高统治集团中有相当一部分实力人物并没有对他的承继皇位表示认可。这些人包括皇兄皇弟及他们的满洲铁杆，不少汉族官僚也厕身其间。这些人对雍正的皇位说三道四，自然使雍正寝食难安，即位的头几年便迭兴大狱，无论亲疏满汉、功臣贵胄，只要对他的皇权构成威胁，一律加上“朋党”的罪名格杀勿论。雍正亲兴的几桩文字大狱，目的很明确：打击“朋党”，巩固皇权。

汪景祺是雍正朝第一个因文字掉脑袋的人。他其实是个浮躁轻薄的文人，雍正二年（1724年）离京赴陕西投靠权势薰灼的雍正宠将年羹尧。他写了极为肉麻地吹捧年羹尧的自荐信，遂成了年的入幕之宾。不料年羹尧好景不长，雍正三年（1725年）年党案发。查抄年寓时，发现汪景祺写的《读书堂西征随笔》，从中读出讥讽康熙皇帝的诗句和非议雍正年号的文句。雍正阅后咬牙切齿，亲题该书：“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汪景祺被照大不敬律立斩梟示，其头颅在菜市口悬挂了上十年。

文字狱史上流传最广泛的大案是雍正四年（1726年）的“查嗣庭试题案”。据说礼部侍郎查嗣庭到江南某省主持科考，试题出的是“维民所止”。

这句出自《大学》中的话却被人送到雍正面前，说“维止”二字是去“雍正”首的意思，雍正大怒，杀了查嗣庭的头。这是个很典型、很形象的文字狱案例。实际上，“查嗣庭试题案”仍然是雍正为铲除朋党，以文字罪人的典型案例。雍正要除掉权臣隆科多，向来趋附隆科多的查嗣庭，便被作为隆党，要先行查处，为最后解决隆科多作舆论准备。如此，查嗣庭出的一些试题，查出的两本日记中的某些词句便被雍正附合成了“种种悖逆实迹”。遂以“大逆”罪名将查嗣庭打入大狱候审。谁想查嗣庭没等终审就死在狱中，只好照例戮尸梟示，把他全家远流 3000 里。

雍正后来又亲办了著名的“吕留良文字狱”，把一个死去几十年的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吕留良开棺鞭尸示众，将他的后代、学生以及为他刻书藏书者连同家属一律处死。其深仇大恨源于吕留良遗著中的诋清观点被湖南两个书生利用，到处进行谋反活动，影响甚广。吕留良案表明雍正朝的文字狱开始转化为镇压汉人的民族思想为特征。而吕案又引发了歹徒小人为陷害别人大造文字“逆案”的歪风。翰林院庶吉士徐骏被人告发“思念明朝，出语诋毁，大逆不道”。罪证是两句诗：“明日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经雍正批准，杀了徐骏。荒唐之至，可见一斑。

到了乾隆年间，文字狱有增无减。尤其到乾隆中后期，文字狱达到高峰。其数量几倍于前三朝，且极为严酷和出格。乾隆不仅将他的父辈已宽释的前案重纠严办，而且将已死去一百多年的函可和尚再提出来，捣毁他的旧迹，查缴他的《千山诗集》。就连他父亲雍正所撰的与吕留良辩理的《天义觉迷录》也被他列为禁书，将他父亲在“吕案”中赦罪的谋逆犯曾静、张熙再抓起来凌迟处死。

乾隆年间由牵强附会、望文生义、捕风捉影造出的文字狱，如脱缰野马不可控制。甚至一些疯子胡乱涂抹也被定为“逆案”，凌迟处死，荒唐到极点。

乾隆朝不仅以一百几十起文字狱案而史无前例，更以开动整个国家机器查办、销毁禁书达 20 年之久而登峰造极。其直接后果，是当时的政治局面和学术思想越来越僵硬，万马齐喑，人人自危。社会发展如一潭死水，毫无生气。

虎门销烟

清朝的国力在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音 yè）和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统治期间达到鼎盛时期，史称“康乾盛世”。“康”指康熙、“乾”指乾隆，分别是玄烨、弘历在位时所用的年号。到清仁宗爱新觉罗颙（音 yóng）琰（音 y n）和清宣宗爱新觉罗旻（音 mǐn）宁在位的嘉庆（颙琰所用年号）道光（旻宁所用年号）年间，国势开始下降。那时，西方资本主义却得到迅速的发展，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积极寻求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开拓殖民地。

英国是当时的头号资本主义强国。16 世纪末，英国殖民势力开始侵入印度，并于 1600 年建立了垄断东方贸易的东印度公司。英国殖民者强迫印度人种植罂粟，炼制鸦片。乾隆年间，英国开始向中国贩卖鸦片。嘉庆年间，中国境内吸食鸦片者渐渐多起来。道光年间，吸食鸦片已成为危及中国国计民生的大祸害。有鸦片烟瘾的人，瘾一发，就浑身无力，眼泪鼻涕直流，平常

也是一副耸肩膀，缩脖子，面容枯黑、神情倦怠的病夫模样。满洲贵族、旗丁、太监、官吏、地主、绅士、士人、幕友、商贾、优伶、仆役、绿营兵士、和尚道士、娼妓……各色人等中都有一批“瘾君子”。每年因购买鸦片而流失到英国殖民者手中的白银有数千万两之多。面对这种严重的局面，以林则徐为代表的爱国官员大声疾呼，主张严禁鸦片贸易，彻底消灭烟毒。

林则徐是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生于乾隆五十年（1785年）。他的父亲林宾日是一个以教书为生的穷秀才。林则徐出生时，新近就任福建巡抚的徐嗣曾的官轿正好从林家门口经过，前面有人鸣锣开道，后面有卫兵保护，那尊贵威武的派头给林宾日留下深刻印象。他给刚生下的儿子起名“则徐”，就是希望儿子效法徐嗣曾，读书做官，显扬发达。林则徐小时候就十分聪明，志向远大。有一次，林则徐的老师带着他们一帮学童到鼓山绝顶峰游玩，一时兴起，叫学童们以“山”、“海”二字为题，各作一对七言联句。林则徐才思敏捷，其他学童还在冥思苦想时，他就脱口吟出了“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这样气势宏伟的联句，大受老师的赞赏。

嘉庆十六年（1811年）林则徐考中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登上仕途。嘉庆年间，南方出身的小京官在北京结成一个文学小团体，名叫“宣南诗社”。林则徐、龚自珍、魏源、陶澍（音 shù）、黄爵滋等人都参加过诗社的活动。他们诗酒唱酬、商榷古今、议论风发、互相砥砺，建立了真挚的情谊。林则徐干事练达、公正清廉，得到仁宗颉琰和宣宗旻宁的赏识和重用。

道光十八年（1838年），鸿胪寺卿黄爵滋上疏，请旨明令严禁鸦片。林则徐当时任湖广总督。他极力支持黄爵滋的主张，拿出自己的养廉银（清代官吏正俸以外的津贴）配制大量的断瘾丸，强迫烟民服用，以戒绝烟瘾；并厉行收缴烟土、烟具，使两湖地区禁烟大见成效。旻宁于这年12月，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到广州查办鸦片事件。内阁中书龚自珍在北京深受首席大学士穆彰阿的排挤打击。他写了一篇《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为老朋友出谋划策，鼓励他雷厉风行，禁绝鸦片，在两年内“使中国十八行省银价平，物力实，人心定”，大见成效。林则徐预计到顽固守旧的穆彰阿一流的权臣对禁烟之事一定会伺机破坏，心情“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林则徐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正月抵达广州。他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人，在钦差行辕——越华书院里，突然传见十三行洋商。十三行洋商是清朝政府指定的垄断对外贸易的官商。这些洋商，历来暗中帮助外商贩卖鸦片，走漏白银，勾通官府，刺探消息，祸害同胞，得赃暴富。林则徐大义凛然，对他们严加斥责，并发下预先写好的历数洋商罪状的谕帖一件，要他们据实交待，听候核办；另发勒令外商缴烟具结的谕帖一件，要他们速往商馆传谕外商照办。公堂上气氛庄严紧张。老奸巨猾的怡和行洋商伍绍荣妄图以行贿手段开脱罪行，表示：“我愿以家资报效钦差大臣！”林则徐勃然大怒，对他训斥道：“本大臣不要钱，要你的脑袋！”

林则徐责令外商填写英、汉两种文字的合同甘结，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他向外商严正表示：“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

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指使贩卖鸦片的外商对抗林则徐的缴烟命令。他从澳门赶赴广州，盘据在商馆内，召集全体外商开会，部署对抗措施。林则徐下令严密围守商馆，并撤走为商馆服务的所有中国买办、工役，麇集在商

馆里的鸦片贩子们只得自己扫地、洗衣、做饭。林则徐把这种有理有节的做法称为“不恶而严”的措施，并警告义律：“尔等售卖鸦片，贻害民生，正人君子，无不痛心疾首，……小民亦多抱不平之气，众怒难犯，甚可虑也！”义律指使老鸦片烟商颠地化装逃跑，被清兵查明截回。林则徐下令停止中英贸易，断绝英商趸船与商馆的往来交通。义律迫于无奈，只得“以不列颠女王陛下政府的名义”下令英国的鸦片贩子们向中国政府缴烟。

林则徐规定虎门外的龙穴岛为缴烟地点，并制定了详尽的《收缴趸船烟土章程》。他同邓廷桢等人一起，亲往虎门，调度收缴烟土各项事宜。他们一行人登上沙角炮台，龙穴尽收眼底，海疆万里，澄波似镜。林则徐心潮起伏，耳边仿佛响起阵阵春雷，这是庆祝禁烟斗争胜利的春雷，是催发暴风骤雨以涤荡外国鸦片贩子的污垢泥浊的春雷！

龙穴洋面，时晴时雨。为了加快收缴烟土上的进度，林则徐下令将缴烟地点改到沙角。道光十九年（1839年）5月18日，鸦片收缴工作完竣，共缴鸦片1987箱，又2119袋。

六月三日，林则徐会同广东高级官员，在虎门焚毁从帝国主义分子手中收缴上来的鸦片。这天，久雨初晴，阳光灿烂。虎门寨下，山脚中央，搭起一座礼台，台前台后，布满绿营士兵，旌旗蔽天，戈矛耀日。午后二时许，礼炮震响，林则徐与众官员登上礼台，下令焚烟。在两个长宽各15丈的方形大池上，搭起一条条木板。木板上，一群群袒胸赤脚的工人向池内撒下盐巴，将池水化成卤水。一箱箱鸦片被切成小瓣，抛入池内，在卤水中浸泡。工人随后又向池内倒入一担担烧透的石灰，并用铁锄、木耙反复搅拌。顿时，池水沸腾翻滚，浓油上涌，渣滓下沉，烟雾弥漫，秽气薰蒸。毒害中国人的鸦片被彻底销毁。四周山峦上观看的群众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一池鸦片销毁完毕，涵洞打开，引入海水冲洗，随即又开始下一轮的销烟。到夕阳西下之时，已有170箱鸦片化为黑烟，化为渣沫，随风消散，随波飘流。

虎门销烟历时20天，除了预备解送到北京作为样土的8箱鸦片外，其余收缴上来的鸦片被全部销毁。林则徐发出告示，准许外国人到虎门销烟现场参观。这些外国人不得不惊叹：中国人“在整个工作进行时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出于我们的臆想，不能想象再有任何事情会比执行这一工作更忠实的了。”

在收缴、销毁鸦片的整个过程中，林则徐一直坚持在现场督察。他在销烟池畔的棚厂内接见了来参观销烟的外国人，向他们郑重表示：中国政府对今后走私鸦片，必予以最严厉的惩处，而对于从事正当贸易的外商，则将给以恩惠，并且，走私决不容牵累合法贸易。林则徐还利用这个机会，向外国人了解英国的海军实力和装备情况。他预感到英国侵略者不会甘心失败，他做好了应付武装挑衅的准备，并向那些外国人庄严宣告：“我们不怕战争！”

鸦片战争

虎门销烟后，义律仍指使英国商人抗拒林则徐的甘结要求，暗中贩卖鸦片，并准备武力，要用坚船利炮来维持肮脏的鸦片贸易给英国殖民者带来的滚滚财源。林则徐积极筹备战守。他亲自察看海口形势，安设木排铁链、添置炮台炮位，并督令水师，认真演习操练。他相信“民心可用”，组织团练，

征募渔民壮丁为水勇，训练他们掌握协助水师作战的本领。

道光二十年（1840年）正月，英国政府任命印度水师提督乔治·懿律为对华谈判全权大臣，这是它发动鸦片战争的一个信号。三月，英国国会通过决议，向中国派遣15000人的侵略军。五月，英国军舰逼近广州，林则徐防范严密，英军无隙可乘。侵略军头目伯麦率舰队向北侵扰。六月，英军攻陷浙江定海县（今舟山岛）。清廷中以穆彰阿为首的投降派以定海失陷为契机，全力攻击林则徐，说什么“夷兵之来，系由禁烟而起”。清宣宗^{咸丰}听信谗言，下令将林则徐革职，另派大学士琦善到广州主持对英外交。

琦善是满洲正黄旗人，是^{咸丰}的宠臣，穆彰阿的死党。他的外交方针是“一切力反前任（林则徐）所为”，一心一意地讨好洋人。老鸦片烟商颠地的买办鲍鹏，曾因贩卖鸦片，被林则徐下令访拿。他逃到山东，托人推荐，投奔琦善，成为琦善的心腹亲信。琦善、鲍鹏狼狈为奸，成为义律事实上的代理人。就是这两个卖国贼，同义律议定了一个《川鼻草约》，《草约》中规定中国要向英国赔偿烟价600万元，并把香港岛割让给英国。

清宣宗^{咸丰}不甘心向英国赔钱割地，转而下令同英国交战。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二月初五日，英军进攻虎门要塞。爱国老将关天培率部与侵略者进行殊死的战斗。

关天培是江苏山阳（今淮安）人，生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血洒虎门时已是花甲之年的老人。道光十四年（1834年），他被任命为广东水师提督。他积极支持林则徐的禁烟政策，多次击败挑衅的英军，被林则徐倚为左右手。林则徐曾赋诗称颂他“功高靖海长城倚”，将他比为“傲霜花艳岭南枝”。

英军进攻虎门前，琦善拒不派遣救兵。国事艰难，奸臣误国，关天培遂下定以死报国的决心。他将随身衣物和几颗坠齿装入一个木匣，托人带回家中，表示向亲人诀别。二月初五那天，他坐镇虎门靖远炮台，冒着枪林弹雨，督率部下，数次击退英国侵略军，并拿出私人积蓄发给士兵作为奖励。战斗持续到第二天下午，400名守军大半躺倒在血泊中，关天培也身受数十处伤，战袍被伤口渗出的鲜血染得通红。负责放炮的士兵倒下了，他冲上前去，亲自点燃大炮，射杀蜂拥而来的英军。一批英国侵略军，从炮台后面偷袭过来。关天培见情势危急，将随身的“水师提督”印信扔给随侍的家丁孙长庆，喝令他：“快走！”关天培拔出佩剑，怒目环睁，冲向英军队伍，顷刻之间，刺杀了几名侵略者。英军不敢近前，从远处连连向他开枪射击。关天培伤重力竭，在弹雨中扑倒在地。孙长庆从悬崖缒绳而下，逃出敌阵，将印信呈交给两广总督琦善；随后又潜回靖远炮台，为关天培收尸。当他找到关天培尸体时，发现这位老英雄的尸体已经被战火烧焦了半边。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八月，英军进攻浙江定海、镇海一线，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三总兵牺牲，两江总督裕谦殉国。

葛云飞，浙江山阴（今绍兴）人，生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时为定海镇总兵。郑国鸿，湖南凤凰厅（今凤凰县）人，生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时为处州镇总兵。王锡朋，顺天府宁河（今河北宁河）人，生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时为寿春镇总兵。郑、王两人奉命驰援镇海，均任镇海诸军翼长。

八月十二日上午，英侵略军船舰29艘到达定海附近横水洋海面。葛云飞接到敌情报告，召集三镇将士宣誓：“城亡与亡，不离定海半步！”三镇总

兵作了分工：葛云飞率部守卫城南滨海处新构筑的土城；王锡朋率部驻守晓峰岭；郑国鸿率部驻守竹山门。

王锡朋部在晓峰岭与英国侵略军激战4天，手握重兵的浙江提督余步云坐视不救。十七日，英军又一次发动强攻。王锡朋身先士卒，挥剑冲入敌阵，力战而死；晓峰岭失陷。攻占晓峰岭的英军沿山脊而下，从背后发起对竹山门的进攻。竹山门的守军，从早晨打到中午，此时已矢尽弹绝。有人主张撤退，郑国鸿坚决不从，他慷慨激昂地说道：“武臣战死疆场，是他的本分！”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他指挥士兵死守不退。一颗炮弹在他身边爆炸，他倒下了，竹山门落入敌手。从晓峰岭、竹山门退下的士兵，奔向土城，向葛云飞报告不幸的消息。葛云飞将印信交给随从军官，令他转缴大营，并嘱托他：“请求大营发兵剿灭洋鬼子，我死后有知，一定化为厉鬼协助我军的行动！”此时，英军从竹山门蜂拥而下。葛云飞下令掉转炮筒向竹山门方向轰击。重炮陷进淤泥，转动困难。葛云飞与士兵一起，踩着淤泥，扳转大炮，才发一炮，敌人已窜到阵前。葛云飞大喊：“好汉子，跟我杀贼去！”他纵身跳出土城，200名亲兵紧随其后，向英军冲杀过去。在激烈的肉搏战中，葛云飞挥舞大刀，连斩数敌。大刀砍折了，他就拔出“昭勇”、“成忠”两柄佩刀砍杀敌人。英军集中火力向他射击，他身中数弹，牺牲在竹山门山麓。定海在头年6月首次沦陷，这年3月被裕谦收回，此时又一次陷入侵略者的魔爪。

裕谦，蒙古镶黄旗人，生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他是清政府中的坚决抵抗派，在当时的满蒙大员中是凤毛麟角的人物。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时，裕谦作为江苏巡抚，在江苏省大力禁烟，配合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英国发动肮脏的鸦片战争时期，裕谦任两江总督，为筹备战守呕心沥血。定海失陷后，八月二十六日，侵略军又在镇海登陆。扼守镇海险要招宝山的浙江提督余步云畏敌如虎，临阵脱逃。镇海城无险可守，总兵谢朝恩力战身亡。裕谦此时正驻节于镇海县城。他见大势已去，长叹一声，走下城楼，来到县城书院。他整理好衣冠，向着北京城的方向叩首遥拜，然后投入学宫泮池，自杀殉国。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五月，英军进攻吴淞口，江南水师提督陈化成在吴淞保卫战中用鲜血谱写了又一曲爱国主义颂歌。

陈化成，福建同安（今厦门市）人，生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他出生于金门岛，水性娴熟，来往万顷海涛中如履平地。他为人宽厚，爱兵如子，被士兵称为“陈佛”。英军来犯之前，他列队誓师，对士兵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我在大海大洋中战斗了50年，炮火中出生入死，难以数计。人没有不死的，为国而死，死又何妨！只要我们不怕死，就没有消灭不了的贼寇！”战斗打响后，陈化成屹立西炮台，冷静观察，沉着指挥，几个小时，就击沉击伤英军8艘舰船，吓得其余敌舰纷纷升起蓝旗，表示退兵。没想到两江总督牛鉴、东炮台守将崔吉瑞等人临阵脱逃，使吴淞防线崩坏，西炮台腹背受敌。陈化成眼见胜利成果，毁于一旦，怒火中烧，心情激愤。侵略军集中兵力，四面围攻西炮台。西炮台守军伤亡惨重，鲜血淋漓，尸积如堵。陈化成不顾手裂血流，亲自操炮，连连向侵略强盗发射复仇的炮弹。激战中，陈化成被弹片击伤，血流如注，扑倒在地。英军拥上前来，陈化成的护身亲兵持刀肉搏，相继阵亡。陈化成从昏迷中醒来，挣扎着站立起来，拔出佩剑，扑向敌阵，不幸中弹，倒地身亡。

吴淞口位于江海交汇处。吴淞炮台失陷，英军狼奔豕突，进入长江。投

降派不守长江，英军封锁瓜州，攻陷镇江，直逼南京。七月二十四日，清政府与英国侵略者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鸦片战争以清朝失败告终。南京条约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它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开始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屈辱深渊。

金田起义

鸦片战争以后，国势江河日下，人民苦难重重，终于导致太平天国革命的爆发。

太平天国革命的发动者洪秀全，广东省花县人，生于嘉庆十八年（1814年）。洪家的远祖在宋代从中原地区迁徙到广东，被称为“客家”。洪秀全的父亲洪镜扬，是个忠厚朴实的农民。洪秀全小时读书很聪明；16岁时，家计困穷，辍学务农；18岁时，当了官禄埗村学的教师。他一面教书，一面坚持自学，并接连参加科举考试，想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

道光十七年（1837年），洪秀全到广州应试。正场、复试考完后，有几天等待出榜的闲空时间，他便常到双门底一带逛街。逛街时，无意间碰上临街传教的两个基督教牧师，一个是外国人，咕哩啪啦讲上一阵后，由另一个中国人翻译，还向听众散发宣传品。洪秀全挤上前去，拿了一份；翻了一翻，没有什么兴趣，就随手丢进箱底。出榜那天，洪秀全兴冲冲地去看榜，没想到却名落孙山。洪秀全又气又急，激成大病，卧床不起，被人用肩舆抬回花县家中。他高烧不退，神志昏迷，眼前幻象迭出，嘴中胡言乱语，有时还突然跃床而起，打鸡追猫。两个哥哥怕他出事，守在门口，不让他冲出米。烧退之后，他仍有些痴痴呆呆，又过了40多天，才完全复元。经过这场大病，他性格大变，由活泼热情，健谈诙谐变得沉静庄严，不苟言笑。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洪秀全又到广州应试过一次，结果还是落第。他气愤到极点，把书丢在地上，大喊道：“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士吧！”回乡后，他到继母娘家莲花塘村的村学当教师。他的内侄李敬芳到村学中闲坐，无意翻出基督教牧师散发的宣传品，借回去看了一遍，向洪秀全说：“这几本书的内容实在新奇，谈的道理与中国的经书完全不一样，你不妨看看。”洪秀全这才开始细心阅读起这几本书来。

这几本书是苏格兰长老会牧师马礼逊的中国弟子梁发编撰的《劝世良言》。洪秀全从中了解到基督教的“单一神权”、“平等”等教义，大受启发。他又把自己的体会说给老同学冯云山、族弟洪仁玕（音 g n）两人听，他们也极表赞同。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七月的一天，天气晴朗，艳阳高照，三人相约来到官禄埗村外的一条名叫石角潭的小河，跳进水中，洗净全身；这是在仿照基督教的“洗礼”仪式，象征结束旧我，开始新的生命、新的事业。就在这一天，他们三人结为一个秘密革命团体——拜上帝会。洪秀全请铁匠铸了一把剑，随身佩带，称为“斩妖剑”。他还放出风来，6年前他得的那场病，其实是“上天受命”——上帝接他上天，给他一本书，叫他回到人间诛杀妖魔，为民除害；他是上帝的次子，耶稣是上帝的长子，上帝被称为“天父”，耶稣被称为“天兄”。

第二年的旧历年过后，洪秀全回到莲花塘，把村学的几十个学童召集起

来，对他们说：“世界上只有上帝一个真神。人们用泥巴捏的、木头雕的那些偶像，其实都是妖魔。我们要拜上帝，不能敬妖魔。”他指着学堂正中的孔子牌位说：“这个孔丘就是妖魔，不能拜他！”说着说着，他冲上前去，端起牌位，摔在地上，并用脚狠狠踹了几下，将其踩得稀烂。冯云山、洪仁玕也在自己任教的村学中砸了孔子的牌位；三个人都为此丢掉了教席。

失业之后，洪秀全、冯云山结伴外出，在广东、广西的农村传教，发展拜上帝会组织。洪秀全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十一月回花县，此后，他相继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著作，将其革命思想发展到自成体系阶段。

洪秀全回花县后，冯云山留在广西进行艰苦的宣传组织工作。他在紫荆山，一面教私塾，一面深入到矿工、炭工、农民中间传教。太平天国的领导骨干杨秀清、萧朝贵等人都是由他发展加入拜上帝会的。

杨秀清，原籍广东嘉应州（今梅县），生于道光三年（1823年）。他5岁丧父，9岁丧母，从小至贫至苦，跟着伯父杨庆善在外烧炭，在艰苦的生活中磨练出坚毅的性格。冯云山在紫荆山教书时，杨秀清经常上门送炭。冯云山同他结为朋友，启发他道：“你以烧炭为业，实无出路，长此下去，只有苦一辈子，不如大家共图大业，求谋根本出路。”杨秀清说：“我们这些烧炭人有什么本事，能得温饱，就谢天谢地了。”冯云山向他挑明：“立大志才能成大事，古来多少英雄豪杰都是贫苦出身。我们结成患难兄弟，共拜上帝，同图义举，必有出头之日。”杨秀清加入拜上帝会后，有如蛟龙入海，迅速成长为有胆有识的领袖人物。

萧朝贵，广西武宣人，生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他是杨秀清烧炭的伙伴，通过杨秀清结识冯云山，加入拜上帝会，并协助杨秀清在烧炭工人中发展革命组织。

冯云山朴实干练，不追求名位，不炫耀功绩。他在紫荆山建立起颇具规模的拜上帝会组织后，仍遥奉洪秀全为最高首领。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洪秀全来到紫荆山与冯云山会合。两人在紫荆山建立总部，加紧了各项章程、制度、纪律、仪式的建设工作。他们听说贵县有个石达开，是一个很有才干的青年，就一道去拜访他。

石达开，祖籍广东和平县，后迁至广西贵县。他生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母亲是一位懂族妇女。石家是一个新发迹的小地主。石达开小时一边参加劳动，一边读书，尤其喜欢读《孙子兵法》。他父亲劝诫他：“读兵书有什么用，还是多读八股文，考得个功名，也好光耀门庭！”石达开笑而不答，父亲走后，还是接着读他的《孙子兵法》。后来，他又学习武艺，结交江湖豪杰，带头抗拒向官府交粮，鼓动农民反抗一家地主霸占渠水，成为崭露头角的人物。当石达开听到来访的洪秀全、冯云山宣讲了拜上帝会的教义后，十分兴奋，当即决定参加拜上帝会，并捐出全部家产资助革命事业。

广西桂平县金田村有个小地主韦昌辉，此人生于道光三年（1823年）。韦家是懂族人，有钱无势，常受金田村邻近的界桐村一家洗姓地主的欺负；因为洗家有功名，有钱又有势，总是占上风。韦家起先想培养韦昌辉读书应试，没想到韦昌辉参加县学考试，不但榜上无名，而且还在县里赌博，输得无钱回家。韦父又出钱给儿子捐了个监生。“监生”指在国子监肄业的诸生。国子监在古代叫“成均。韦父做生日，大摆宴席，在门头挂起“成均进士”的匾额，以向乡里炫耀。界桐村一位叫蓝如鉴的烂秀才唆使人在晚间偷偷将

韦家匾上的“成均”两字铲掉。第二天，又带人上门，反诬韦家冒充“进士”，将韦父绑送团局，勒逼罚款。韦昌辉遭此欺凌，气愤万分。他找到洪秀全、冯云山，要求加入拜上帝会。韦昌辉借用拜上帝会的声势，派人捉住蓝如鉴，报了个人私仇。随后，他拿出家财，为拜上帝会打造武器，并拿出家中的存粮，供会众食用。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清宣宗^咸宁去世，皇四子爱新觉罗奕（音 yì）^訢（音 zhǐ）继位，史称清文宗。6月间，洪秀全派人到广东花县接洪、冯二姓族人来广西，以免起义后遭到清政府杀害。7月间，洪秀全发布总动员令，通知各地拜上帝会会员到金田“团营”，计划于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1851年1月11日），即洪秀全38岁生日那一天举行武装起义。

拜上帝会在各地的会员，一个串一个，一户串一户，一村串一村，成帮结队向金田村集中，总数超过两万人。会众到达金田即按军队编制组织起来，所以叫“团营”。团营的会众就是“太平军”。军中建立公库，会员一切财物都要缴纳给公库，衣食由公库供给。男的归男营，女的归女营，男女平等，女兵也横刀立马，持械参战。50岁以上的老年男子随军做些运输、做饭的杂活。15岁以下的儿童，能独立生活的，编为“童子军”，幼小的则随母亲居住。老年妇女被安置在女馆中，做些力所能及的服务工作。团营期间，会众蓄发、改装，以表示对满族统治者的民族压迫政策的反抗。他们向百姓宣传道：“满洲人叫我们穿的衣服，脚上的靴就像马的两只后蹄；两个袖子的下端就像马的两只前蹄，背上还画着马鞍子。满洲人叫我们留着长辫子，就像一条马尾巴。我们就像任他们骑任他们打的马。我们再也不能做这样的马！”

新即位的清文宗奕^訢听到风声，急调在福建原籍养病的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广西巡抚。林则徐在赴任途中被广州十三行的汉奸买办买通的厨子在饭中下黄蜡毒死。奕^訢改任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到广西去扑灭行将燃起的革命烈火。各省清兵也陆续奉调进入广西。清江协副将伊克坦布在1851年元旦那天带领1000多名贵州双枪兵（火药枪加上鸦片烟枪）杀到金田村附近，被洪秀全等人指挥的太平军击败。伊克坦布被斩掉首级，成了清军向金日起义赔送的进见礼。

1851年1月11日，太平军按计划在金田村举行隆重仪式，正式宣布起义。有一首民歌一直传唱到今天：“天国起义在金田，穷人个个乐连连，带领穷人除清妖，从此穷人见青天。”

天京内讧

金田起义后不久，太平军攻克永安州（今广西蒙山）。在永安，太平天国的建国规模大体具备。洪秀全被推为太平天王；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贵列一等；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列二等；石达开为翼王，列三等。

咸丰二年（1852年）二月，永安城被围粮尽。太平军胜利突围，直攻桂林。太平军攻桂林不克，北上攻克全州，乘胜进入湖南。南王冯云山在全州蓑衣渡战死；西王萧朝贵在长沙城下阵亡。此后，太平军克岳州、下武昌，顺江东下，席卷安徽、江苏沿江各镇。咸丰三年（1853年）二月，太平军攻克南京。一路之上，太平军诛戮妖魔（官僚、幕客、吏员、衙役），焚烧官

府、粮册、田契、借券，杀逐豪绅、地主、和尚、道士；人民纷纷归附太平军。

太平天国在南京建都，改南京为天京。在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时候，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却日趋激烈。

早在金日起义前，即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冯云山被桂平石狗村地主分子王作新勾结官府，投进县狱。洪秀全为营救战友，远走广州，打算通过美国牧师罗孝全说通两广总督耆英放人。拜上帝会会众群龙无首，人心涣散，几乎到了瓦解的边缘。这时，杨秀清勇敢地站出来，巧用谋略，稳住了拜上帝会组织。在一次拜上帝会的会众集会上，众人正下跪祈祷的时候，杨秀清假托天父上帝下凡附体，以代天父上帝传言的名义，安定会众情绪。在萧朝贵等人的配合下，杨秀清多次用“附体”、“传言”的方式，批驳官府的恐吓，揭发混进会众的奸细密探的破坏行为，预言拜上帝会的光明前途。杨、萧还发动会众捐款，凑集一笔钱贿赂衙门官吏，把冯云山营救出狱。冯云山出狱后，听说杨秀清代天父传言一事，心情十分复杂，不久就离开紫荆山，去找洪秀全商议对策。冯走后不久，萧朝贵又模仿杨秀清，在拜上帝会的会众集会上，假托天兄耶稣下凡附体，以代天兄耶稣传言的名义指示会众。洪、冯两人反复计议后，决定一方面接受杨、萧二人“传言”的既成事实，承认杨秀清有权代天父传言，萧朝贵有权代天兄传言，一方面决定重新安排宗教位次，尊奉上帝为天父，耶稣为天兄，洪秀全是天父次子，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是天父的三、四、五子。洪秀全把妹妹洪宣娇嫁给萧朝贵，以牵制杨秀清势力的膨胀。

杨秀清有了代天父传言的特权，就有了挟制洪秀全的手段。永安封王时，明定受封各王都要受东王节制，使杨秀清进一步取得太平军的统帅权。杨秀清精明干练，又独断专擅，眼睛里越来越没有洪秀全。冯云山、萧朝贵牺牲后，他同洪秀全更处在直接抗礼的地位上，再也没有人能充当缓冲的中介。

太平天国三年（1853年）十一月，洪秀全安排4个天王府女官在雨雪寒冻的天气下凿池挖塘，不得休息。杨秀清假托天父附体，要洪秀全免除天王府这4个女官的劳役，并斥责他对待有功姊妹太苛刻，要罚打40杖。韦昌辉与众官一齐求情，表示愿代天王受杖，“天父”也不允准。洪秀全以“天王”之尊，也只得俯伏在地，准备受杖；“天父”这才松口，免了杖打。洪秀全起身后还要告诫众官：“尔为官者须知尔东王所言，即是天父所言也！”

杨秀清对在前线统兵作战的韦昌辉、石达开、燕王秦日纲等人的态度也十分粗暴跋扈。秦日纲手下的一个放马人坐在燕王府前，杨秀清一个拜把兄弟的叔父正好从门前经过，放马人没有起身。这个准“王叔”大发脾气，将放马人打了200鞭子，捆送到石达开的岳父黄玉昆那里，要黄玉昆再杖责放马人。黄玉昆劝他息怒，还说：“既然已挨了鞭子，就不用再杖责了！”准“王叔”将黄玉昆的办公案子掀倒，又跑到杨秀清那里去告状。杨秀清也大发脾气，下令石达开将黄玉昆抓起来。黄玉昆愤而辞职，秦日纲也跟着要辞职。杨秀清把他们用铁链锁着，送到韦昌辉那里，责令韦昌辉打秦日纲100杖、黄玉昆300杖，并将那个放马人处以“五马分尸”的酷刑。黄玉昆受到杖责，愤而投水，被救起后，又被杨秀清下令削去爵位，发送到军中当兵卒。

韦昌辉对杨秀清心怀不满，但表面上又竭力谄媚逢迎。他的哥哥与杨秀清的妾的哥哥争夺一处住房。杨秀清将他哥哥抓起来送到他那里去要他治罪。他为了逢迎杨秀清，竟把自己的哥哥从重处以“五马分尸”“的酷刑。

太平天国六年（1856年），杨秀清又玩起“天父附体”的把戏，对洪秀全表示了夺位的野心：“你和东王都是我的儿子，东王有这么大的功劳，怎么只能称九千岁呢？”洪秀全赶忙回答：“东王打江山，也该是万岁。”“天父”又问：“东王的世子岂止是千岁？”洪秀全答：“东王既然是万岁，东王的世子也就是万岁，而且世世代代都是万岁。”“天父”这才喜滋滋地说道：“好！那我就回天了！”

洪秀全遭此逼迫，断然决定解决杨秀清问题，他秘密命令在江西督师的韦昌辉，在武昌督师的石达开，在丹阳督师的秦日纲回天京诛杀杨秀清。

韦昌辉于太平天国六年（1856年）八月初四夜晚带3000余士兵赶回天京。他立刻包围东王府，并控制住各要害地方，带领几个亲兵闯入东王府，将睡梦中的杨秀清杀死，杨秀清的妻儿老小及仆役卫士，也统统被杀死。第二天天一亮，将他的首级送到天王府请功。

韦昌辉蓄意扩大事态，以乘机攫取大权。他定下一计，派到处宣布天王诏谕，诏谕中指责韦昌辉滥杀无辜，下令处以鞭刑400，以示惩罚。杨秀清的亲信士卒听到这道诏谕，纷纷赶到天王府前观看韦昌辉受鞭刑的情况。这五六千人都没带武器，毫无戒备。他们进入布置好的“口袋”后，被韦昌辉全部杀死。尸体由观音门口内漂流出江，一时之间，江水中到处是蓄有长发的太平军战士尸体。

石达开听到韦昌辉大肆杀戮的消息，从武昌洪山急忙赶回天京，指责韦昌辉的暴行，要他停止杀人，妥善收拾局面。韦昌辉已经杀红了眼，不但不听石达开的劝诫，而且还要安排人除掉这个障碍他攫取大权的对手。石达开得到消息，连夜缒城出逃。韦昌辉把他留在天京的妻儿老小全部杀掉。

韦昌辉怀疑洪秀全保护了石达开，带兵直逼天王府，要求洪秀全交出石达开。洪秀全率领亲兵守卫天王府。双方相持一段时间后，天王府中的女官改换男装，手持武器，打着“翼王”的旗号从大门中突然冲出。韦昌辉灭绝人性，部下离心，一见“翼王”旗号，一哄而散。洪秀全趁势追击，包围北王府，并严密封锁各路口，搜捕韦昌辉。三天后的一个深夜，在内桥栅口抓住了韦昌辉。洪秀全下令将韦昌辉肢解处死，并从尸体上割下二寸见方的肉块，悬挂于天京城内各栅口示众。

韦昌辉伏诛后，石达开回到天京，主持政事。洪秀全在杨、韦之变后，疑忌之心甚重。他只信得过他的两个昏庸的哥哥安王洪仁发、福王洪仁达，纵容他们对石达开事事掣肘。

石达开横遭疑忌，不但无法施展军事、政治才能，而且性命也危如累卵。太平天国七年（1857年）五月，石达开被迫含恨率部出走，转战浙江、福建、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太平天国十三年（1863年），石达开的部队在天险大渡河南岸的紫打地（今石棉县安顺场）被清军及当地的反动土司围困，陷入绝境。为保全部属的生命，他亲赴清营谈判，被敌人扣留，解赴成都。石达开对审讯他的清朝四川总督骆秉章说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今生是你杀我，安知来生不是我杀你呢？”他被处以凌迟极刑。从行刑开始，到最后停止呼吸，昂然挺立，神情镇定，没有一点畏缩的表现，不发一声痛苦的呻吟，连他的敌人都不得不发出感叹：“真奇男子也！”

火烧圆明园

正当天京内讧的惨剧发生，太平天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的时候，英国和法国在美国、俄国的支持并参与下，联合发动了新的侵华战争。

英国发动新的侵华战争的借口是“‘亚罗’号事件”。“亚罗”号是一艘海上走私船，船主是中国商人方亚明，船上的水手也都是中国人。方亚明将该船在香港注册，从港英当局那里领了一张执照，以掩护自己的走私活动。咸丰六年（1856年）九月，“亚罗”号自厦门驶抵广州，停泊于黄浦港。广东水师千总梁定国率士兵登船搜查，逮捕了隐藏在船上的两名中国海盗和10名有海盗嫌疑的中国水手。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巴夏礼怒气冲冲地赶到现场，干涉广东水师执勤，胡说“亚罗”号是英国船，要求立即释放被捕人员，遭到值勤人员拒绝。巴夏礼为制造侵略借口，造谣说广东水师扯下了船上悬挂的英国国旗，再三与两广总督叶名琛纠缠，并致书英国公使包令及驻华舰队司令西马糜各厘，示意他们作好战争准备。

叶名琛是一个颡预昏聩的官僚，西马糜各厘率领英国军舰突入省河、进犯广州之时，他还在校场观看武试人员跑马射箭。听到警报，他的措施是到城北的长春仙馆，请供奉在那里的吕洞宾、李太白两位仙人降示乩语、指点迷津。乩语说：“必无事，日暮自走耳。”他也就撒手不管了，导致各炮台连连失守、广州城被攻占的严重后果。侵略军在城内盘据了两个月，烧杀掳掠，奸淫妇女，遭到市民的激烈反抗，不得不撤出城区，退出内河，伺机再次扩大战争。

法国同英国合伙发动侵华战争的借口是“马神甫事件”。马神甫是一个叫马赖的法国天主教神甫。咸丰四年（1854年），他潜入广西省西林县活动。这个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搜罗了一批地痞、流氓、赌棍、烟鬼为教民，进而勾结土匪，包揽词讼，霸占土地、侮辱妇女，民愤极大。新任西林知县张鸣凤查知这些情况后，于咸丰六年（1856年）初，将马赖的爪牙马子农、林入等人依法逮捕处死，同时限令马赖离境。马赖无视中国法律，赖着不走，继续其非法活动。张鸣凤于限期过后，将其逮捕；三次开堂审讯，马赖态度恶劣，咆哮公堂，张鸣凤遂下令将其处死，以平民愤。法国政府打起“为保护圣教而战”的旗号，任命葛罗为特命全权专使，率领一支远征军到中国，同英国侵略军共同行动。

咸丰七年（1857年）十一月，英法联军再次侵犯广州。这一次，吕洞宾、李太白两位仙人的乩语是：“过了十五日，便可无事。”于是，叶名琛对广州战守问题漠然置之，惦记的是如何庆祝自己即将到来的五十大寿。十一月十五日那天，侵略军占领广州。叶名琛藏在左都统署的后园八角亭内，被巴夏礼率英兵搜获，押送到印度加尔各答，囚禁于海边的镇海楼上。他无耻地以“海上苏武”自诩，每日吟诗作画，两年后，死在那里。对于这一个封建官僚制度培养出的怪物，人们曾讥讽道：“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

英法联军还软禁了广东巡抚柏贵，随后又挟持他到抚署复职，成为近代史上中国第一个地方傀儡政权的头子。柏贵发布通告，要“百姓不得再滋生端”，“不得再称‘鬼子’，如遇夷人下乡，官民皆当以礼款待”，“有敢借口起义者，即依军法从事”。但是，广州地区的人民群众没有听从这个汉奸头子的指挥，他们纷纷组织起来，自发地开展了惩罚侵略者的游击战。有一次，巴夏礼率领1000多名英军到东莞骚扰。东莞军民预先埋伏在树丛

中、小路上。待到侵略军进入伏击圈，军民奋起截杀，当场毙敌数百人。巴夏礼在逃跑途中，惊吓落马，几乎被俘。

英法联军于咸丰八年（1858年）春沿海路北犯，美、俄公使也率领舰只参加了侵略行动。侵略军攻陷大沽炮台，逼迫清政府分别同英、法签定《天津条约》。

英、法公使无视中国主权，拒绝中国方面的安排，执意率舰队走白河，经天津进北京换约。侵略军擅自拆除设在海口外的铁钺（海道上的铁制障碍物），强行冲撞横锁海口的铁链，并先行向两岸中国炮台猛烈轰击。炮台守军奋起还击，激战一昼夜，击沉敌舰4艘，重创6艘，歼灭侵略军近500名。

英法侵略军惨败于大沽后，又于咸丰十年（1860年）卷土重来。七月，侵略军向大沽北岸炮台发动猛烈进攻。直隶提督乐善率守军奋力回击。从早晨5时打到8时，炮火连发，扼制住敌人进攻。后因火药库中弹起火，烟雾弥漫，10000多侵略军趁势猛扑上来。守军发射鸟枪、抬枪，拼死拒敌。敌军扑近后，他们又拿起长矛、大刀同敌军展开肉搏战。战斗持续数小时，乐善力竭捐躯，守军大部分阵亡，但侵略者也付出了死伤400余人的代价，其中包括17名英国军官和6名法国军官。

英法侵略军攻陷炮台，占领天津，随后又向北京进犯。八月间，清军与侵略军在通州城西八里桥激战。手持长矛、弓箭的清军马队爱国官兵，以血肉之躯向侵略军发起冲击，毙伤敌军1000余人。侵略军凭借强大的炮火，挽回颓势，攻下八里桥。清文宗奕訢得知前线兵败，慌忙带领后妃、皇子和一批王公大臣，逃往热河避暑山庄。九月，英法联军侵占北京城，800年古都沦于外国强盗铁蹄之下，惨遭蹂躏。

北京西北郊有一座圆明园。它原是明代的贵族花园。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清圣祖玄烨将它赐给四子胤禛（即后来的清世宗）正式建园，并题名“圆明园”。到英法侵略军攻占北京时，它已经经历了150年的历史，由5代皇帝，集中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营造，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式和风景式交融的离宫型皇家园林。它由圆明、长春、万春三座主体园林，以及静明、清漪、近春、熙春等配套园林组成，连绵20余里，占地5000余亩。主体三园有宫殿140余座，风景点100余处，美仑美奂，有如人间仙境。园内还收藏有无数图书字画、档案文献、金银珠宝、瓷器古玩，是一座荟萃文化精华的巨型博物馆。

英法强盗闯入圆明园，疯狂地进行抢掠。法军翻译官德里松这样记述了当时的情景：“这一大群各种肤色、各种式样的人，这一大帮地球上各式人种的代表（联军中的雇佣军份子种族成分十分庞杂），他们全都闹哄哄地，蜂拥而上，扑向这一堆无价之宝。他们用各种语言呼喊，争先恐后，相互扭打，跌跌撞撞，摔倒又爬起，赌咒着、屏骂着、叫喊着，各自都带走了自己的战利器，初看起来，真像是一个被人踏翻了的蚂蜂窝。”“一些士兵头上扛着皇后的红漆箱；另一些士兵身上缠着织锦、丝绸；还有一些士兵把红宝石、蓝宝石、珍珠和一块一块水晶石放进口袋里、衬衫里、帽子里，甚至胸口上还挂着用大珍珠做的项圈。”这些强盗对抢不动，拿不走的文物珍宝，就极力毁损破坏。珍贵的书籍字画被他们当成点燃烟斗的引火纸。为了掩盖自己的强盗行径，侵略军又放火焚燃了这被誉为“万园之园”的无价园林。大火持续了两天两夜，浓烟滚滚，直抵北京城。北京城上空，日光晦暗，仿佛出现了一次没有止境的日蚀。法国伟大的文学家雨果听到这次暴行的消息

后，愤怒地写道：“我们欧洲人总是把自己看作是文明人，对于我们说来，中国人都是野蛮人。看！文明就是这样对待野蛮的。在历史的审判台前，一个强盗将叫做法国，另一个则叫做英国。”

留在北京“督办和局”的恭亲王奕訢（音 x n）在英法侵略军的武力威胁下，分别同英、法签订了《北京条约》。《条约》有一条规定是将九龙割让给英国，进一步破坏了中国领土主权，为英国侵略者提供了新的侵略据点。

俄国趁火打劫，迫使清政府批准《璦琿条约》，并签订中俄《北京条约》，一口气从中国手上抢走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以东的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慈禧垂帘

《北京条约》签定后的第二年，清文宗奕詝死在热河避暑山庄。6岁的皇太子载淳继承皇位，史称清穆宗。奕詝死前，任命了八位襄赞政务大臣。八人中，名义上为首的是怡亲王载垣和郑亲王端华，实际上起核心作用的是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肃顺。

肃顺是清朝宗室，为人颇有才干，敢于任事，但狂傲自大。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肃顺力主重用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汉族官僚，对挽救清王朝的覆亡起了一定作用。文宗奕詝在避暑山庄，时常同肃顺商议重大军政事务，军机大臣都得仰承肃顺鼻息。奕詝死后，肃顺以“顾命大臣”自居，威权由己，势焰薰天，在朝中树敌甚多。

奕詝一死，皇后钮祜禄氏改称皇太后，上徽号为“慈安”，所居宫院座东，史称“东太后”；新皇帝载淳的生母懿贵妃那拉氏，母以子贵，也被尊为太后，上徽号为“慈禧”，所居宫院座西，史称“西太后”。

那拉氏出身于一个潦倒的满洲旗人家庭，乳名兰儿。她父亲是个安徽的候补道，官运不佳，家计颇为艰难。他的朋友吴棠看到兰儿长相俊俏，聪明伶俐，料定她将来是个贵人，时常予以接济。兰儿读书所用书籍笔墨，都由吴棠供应。17岁时，兰儿被宫廷选为秀女，派往皇后钮祜禄氏所住的坤宁宫当差。奕詝见到她后，颇为喜爱，宠为“贵人”；不久晋封为“懿嫔”；生下载淳后，晋级为“懿妃”。咸丰六年，她奉旨归宁省亲，并被加封为“懿贵妃”。

奕詝到热河后，肺病日渐沉重。那拉氏颇通文墨，仗着皇帝的宠幸，就趁机帮同批阅奏章，干预朝政。她是一个工于心计的人，用不多久，就把皇室内部，朝臣之间的勾心斗角的动态摸得一清二楚。

恭亲王奕訢是奕詝的六弟。奕詝幼年丧母，由奕訢的生母静贵妃抚育成人。奕詝视静贵妃如同生母，视奕訢如同胞弟。静贵妃死于咸丰五年（1855年）。奕詝按皇后的等级为她办理丧事，但按皇室制度，不系庙谥（即不称皇后），不祔太庙（即神牌不供奉于太庙）。奕訢坚持要求给生母以系庙谥、祔太庙的待遇。奕詝认为自己的处置情礼兼顾，无可非议，一气之下，免掉奕訢的军机大臣、宗令、都统等职务，兄弟之间，感情出现裂痕。奕訢之后，奕詝最亲近的弟弟是七弟醇亲王奕譞（音 xu n）。那拉氏看准这一点，说动奕詝下旨指婚，把她的胞妹许配给奕譞为福晋（正室夫人）。

奕詝死后不久，御史董元醇突然提出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建议。在载

淳之前，清朝有过两个幼年皇帝：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 6 岁继位，由叔父多尔衮摄政；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 8 岁继位，由大臣鳌拜等人辅政。八大臣援引史实，以“向无前例”为理由，驳回董元醇的建议。那拉氏不动声色，暗中通过常到宫内走动的醇亲王福晋带信给奕䜣；并通过奕䜣联络奕訢，又通过奕訢联络北京的外国使馆；为举行政变，密锣紧鼓地作好前期准备。

奕訢身在北京，对避暑山庄的事情却了然在心。他到热河奔丧时，对肃顺等人处处表示谦让，暗中却与奕䜣碰头，敲定了政变的具体方案，然后又回到北京安排一应事宜。

那拉氏借口护送灵柩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坚持要肃顺亲自承担这个任务，并布置奕䜣留守热河，相机行动。肃顺护送灵柩，走走歇歇，行动缓慢。那拉氏带着载淳抢先回到北京。奕訢说动洋人，放出风来：“只要怡亲王、郑亲王、肃顺继续掌政，我们就不认为中国已确实承认了《北京条约》。”

肃顺一行来到密云，住宿在行馆里。奕䜣接受那拉氏的密诏，从热河追赶上来，半夜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行馆，逮捕肃顺。肃顺从被窝里被抓出来时，还咆哮着追问：“凭什么抓我？”奕䜣回答：“奉旨拿问。”肃顺说：“我还是襄赞政务大臣，未曾革职，先要拿问，简直是奇闻！”奕䜣冷冷地驳斥道：“既然有旨拿问，自然要革职，你不必多言！”

奕訢任命的八位襄赞政务大臣，五个被革职，发往新疆效力赎罪。载垣、端华被赐令自尽。肃顺在宗人府被审问时还咄咄逼人地问道：“新皇尚未登位，拿问我的谕旨盖的是何人大印？”主持审问的宗正回答道：“用的是东、西两宫太后之印。”肃顺顿足叹息：“罢！罢！好一个西太后！”在履行供词签字手续时，同时受审的载垣、端华迟疑着不愿落笔，肃顺却痛痛快快地签了字。他对载垣、端华说道：“承认也死，不承认也死，武曌（音 zhào）重生，顾命大臣还想逃命吗？”宗人府判肃顺“凌迟处死”，那拉氏故作姿态，改为“斩立决”。

肃顺被锁进囚笼，拉往刑场处斩时，两旁观者如堵。一些人朝他扔瓦片石块。他当年曾主张减少八旗俸饷，那些锦衣玉食、好吃懒做的八旗子弟们，自然要对他恨之入骨。

肃顺一死，两宫太后正式下诏垂帘听政，实际大权掌握在那拉氏手中。小皇帝载淳的年号，原来是“祺祥”。“祺祥”是载垣拟定的，不能再用。大学士贾桢建议改用“同治”两字。

那拉氏爬上统治中国的最高宝座的时候，还只有 27 岁。

曾国藩与湘军

满人入关后，成为中国的统治民族，对汉人一向心怀疑忌，在政治上予以歧视。太平天国革命兴起，满洲贵族，八旗子弟、绿营官兵都望风披靡，不堪一击。清朝政府不得不倚重汉族的官僚地主。曾国藩就是被清朝政府赋与大权的第一个汉人。

曾国藩，湖南湘乡人，生于嘉庆十六年（1811 年）。道光十八年（1838 年）考中进士，被选为翰林。在北京，他从满人倭仁、湖南人唐鑑讲习程朱理学。首席大学士穆彰阿对他十分赏识，曾在清宣宗旻宁面前夸奖他是“特等人才”。

太平军进入湖南时，曾国藩正在家乡为母亲守丧，此前，他已官居刑部侍郎。他写了《保民平安歌三首》，广为张贴，歌中劝告地主“莫逃走”，号召他们“要齐心”、“操武艺”。文宗奕訢下谕，命令他到长沙督办团练。他坐镇长沙，组织地主武装，到处捉拿起义农民。半年之中，被斩首、杖毙、监毙的农民就有 200 多人，赢得一个杀人如荆头的“曾剃头”的名号。

曾国藩效法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练兵方法，将地主武装团练训练成颇有战斗力的队伍，号称“湘军”。他在挑选兵员时，以“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为标准，那些“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一概不要。这使湘军的兵员素质胜过极端腐朽的清朝绿营军队。湘军士兵由将领亲自挑选；将领则由曾国藩自己亲自挑选。他挑的将领，不是至亲好友，就是故吏门生。封建的乡谊、戚谊、师友关系把湘军将领捆在一起，上一级对下一级实行家长统治，下一级绝对听命于上一级指挥，全军则听命于曾国藩一人。他的组织、训练方法成为清末及民国期间的军阀们师法的样板。

咸丰三年（1853 年），湘军出湖南，赴江西与太平军交战。没想到，被打得一败涂地。曾国藩这才领教到太平军的厉害。他接受教训，埋头扩充军队，加强训练，添置弓马，配备洋炮，组建水师，准备向太平军反扑。

咸丰四年（1854 年）二月，曾国藩亲率陆军 15 个师，水师 10 个营，共 10000 余人，在湘潭集中，准备与太平军再决雌雄。在此后的作战中，双方互有胜负。曾国藩以“屡败屡战”的顽强精神，勉力支撑清政权的危局。靖港一战，湘军兵败如山倒，曾国藩立起令旗，在旗下仗剑督师，宣布：“过旗者斩！”但依然挽回败局。他既羞愤，又沮丧，几次投水自杀，被左右亲兵救起，拉上船来，逃回长沙。城陵矶一战，湘军水师损失几近一半，曾国藩站在岳州（今岳阳）城头，眼看湘军战船纷纷起火，水勇仓皇跳水逃命，伤心得大哭一场。咸丰四年（1854 年），曾国藩率湘军攻陷武昌。消息传到北京，奕訢大喜过望，感慨地对军机大臣们说：“不图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殊勋！”奴性十足的汉族军机大臣祁寯（音 jùn）藻却提醒满族主子：“曾国藩是一个已离职的侍郎，身分如同匹夫。乡里匹夫，一呼而起，从者万人，这恐怕对国家来说不是什么好事！”奕訢此后就对曾国藩有了戒心，仍然指望满洲贵族、绿营将领替他保护大清的江山。倒是宗室肃顺头脑比较清醒，他公开地对人说：“满族没有一个人中用，国家有大事，非重用汉人不可！”他利用奕訢对他的信用，竭力为曾国藩转圜，使曾国藩得以执掌兵权。后来，那拉氏虽然杀了肃顺，但却继承了肃顺“重用汉人”的政策。听政伊始，她就下令，任命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总兵以下各官，悉归节制；后来又给了他一个协办大学士的头衔。

同治元年（1862 年），曾国藩向太平天国发动全面进攻。南路军由左宗棠统率，军中有一支中、法混合编制的洋枪队，负责浙江方面的军事行动。东路军由李鸿章统率，军中有一支由英国人戈登统领的洋枪队，负责上海、江苏方面的军事行动。中路军由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统率，扎营天京城外的雨花台。杨载福、彭玉麟率水师封锁长江。曾国藩授意曾国荃对天京围而不攻，在陆路将包围圈上留出一个缺口，让太平军运进少量粮食，使“城中强者可得，弱者难求”，制造太平军的内部争夺粮食的动乱。

曾国荃围困天京整整两年，由于太平天国军民奋勇抵抗，湘军损失近 3

万人。清廷接连催促他破城，并要调李鸿章率洋枪队来助战。曾国藩一心想让曾国荃独取破天京的首功、不愿意让李鸿章过来分桃子，但又不敢违背旨意，明目张胆地拒绝李鸿章部向天京挺进。于是，他写了一封信给李鸿章，信中说：天京久攻不克，原因不在用兵不力，而在粮饷不足；若是率部来援，敬请自带饷银。李鸿章看了曾国藩的信，对他的用意心知肚明，也就托故不去参加攻打天京的战役了。

湘军攻破天京后，曾国荃带头抢劫王府。湘军的士兵、差役、文书，人人置办了筐子，抢到东西就往筐子中放。湘军将领，大部分成了富翁。为了防备清廷追查太平天国财富的下落，曾国藩从安庆赶到天京，授意曾国荃在城内纵火。城内数十处浓烟滚滚，火光熊熊，持续七天七夜，尚未熄灭。曾国藩又摇动笔杆，说太平天国并没有什么仓储窖藏，还假作惊讶地写道：“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实出微臣意料之外，亦为从来罕闻之事！”清廷看了奏章，哭笑不得，但也无可奈何。

曾国藩镇压了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挽救了大清的江山。清廷给他加赏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赏戴双眼花翎等一系列封赏。湘军水陆将领 130 余人也各有封赏。

华尔吟咧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清军与太平军中都有外国人参加作战。

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军的外国人以华尔为代表。华尔(Ward, Frederick Townsend)是美国纽约人，生于 1828 年。此人中学没有毕业就进入陆军学校学习，后来在加勒比海上当过海盗，在拉丁美洲各国当过浪人，随美国私贩鸦片的船只到过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是一个典型的兵痞、流氓。

咸丰十年(1860年)，美国将“孔子”号炮舰卖给清政府打内战，华尔混在这艘炮舰上当雇员，跟着炮舰到了中国。华尔在美国有前科，美国驻上海领事要把他抓起来遣送回国。苏松太道吴煦看上了这个兵痞、流氓杀人越货的本事，亡命闯荡的胆量，向美国领事说情，把他请来帮助镇压太平军。华尔在中国招募了几十名西洋人，几百名中国人，组成洋枪队。华尔用西洋阵法训练这支武装：对方开火时，卧倒在地；对方火力一停，就跳起来一同开枪，织成密集的火力网，压倒对方。吴煦叫他带领洋枪队去攻打被太平军占领的松江城。太平军不熟悉洋枪队的这套打法，吃了亏。华尔初战得手，攻陷松江。吴煦事先曾与华尔约定，攻下城后，城内太平军的财产全部归洋枪队所有。华尔率领这伙强盗兴冲冲地闯入太平军驻地及房馆，却发现里面空无所有。为了满足他们的贪欲，吴煦只得向苏松太一带的百姓大肆搜刮，凑齐 5000 两黄金，作为酬金送上。

李鸿章率领淮军到上海一线与太平军作战，召见华尔，着实夸奖他一番，并叫他募兵 3000 人，组建一支“常胜军”，规定“常胜军”官兵的饷银比淮军官兵高出一倍。

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华尔的“常胜军”会同英军 2000 人，法军 900 人，以及大批清军，向太平天国苏福省的嘉定、青浦、太仓等地进犯。“常胜军”与英、法侵略军野蛮成性，沿途烧杀抢掠。每占领一座城市，他们就把住城门，不准清兵进入，自己则在城内为所欲为。清军官兵若有怨言，

这些“洋兵”就扑上去拳脚交加。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选调精兵 10000 余人，组织反攻战。先败英国提督士迪佛立于嘉定，再败“常胜军”于青浦，活捉了“常胜军”副领队法尔思德。太平军宽大为怀，没有杀掉这个强盗，只是用他向敌方交换了一些军火。在这些战斗中，太平军的精兵也使用了洋枪。

青浦之战后不久，华尔带着 3 艘炮舰去援救宁波方面的清军。他带领几百名“常胜军”扑向青浦城。守城的太平军端起“洋枪”，瞄准这个强盗射出了复仇的子弹。子弹贯穿华尔的胸部，他当即负重伤倒地；两天之后，死在宁波。他穿着清廷赏赐给他的四品官服，埋进中国的黄土，结束了自己的强盗生涯。

帮助太平军抵抗清军的外国人以呤唎为代表。呤唎是英国人，原名灵德内（Lindley, Augustus Frederick），到中国后才改名呤唎（音 lin lì），生于 1840 年。他的父亲是一位普通海员。呤唎 13 岁就上船学习驾驶，19 岁作为一个英国海军的下级军官来到香港。

呤唎到香港几个月后，就离开英国海军，到一艘跑生意的小轮船上当了大副。这艘轮船的船主是中国人，船却在英国领事那里注的册。咸丰十年（1860 年）春，轮船由上海出发，到太平天国的苏福省境内收购生丝。在清朝统治区，清军横行霸道，有如盗匪，行船提心吊胆；在太平天国境内，太平军纪律严明，行船安全；两相比较，呤唎觉得还是太平天国好。

苏州是苏福省的省会，太平天国的忠王李秀成当时就住在苏州。呤唎要求谒见忠王，得到批准。李秀成对呤唎说：太平军和英国人都崇拜上帝和耶稣，是同教的兄弟。英国人不应该帮助满妖，因为满妖是天父和天兄的敌人。太平军的理想是传播《圣经》，扫除偶像，驱除满妖，建立天国。天国是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兄弟之邦，天国将输入欧洲的科学和工业。呤唎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新教徒，听了李秀成的这一番话，十分感动，当即要求参加太平军。李秀成任命他为太平军的名誉官员，并发给委任状，在委任状中称他是“洋兄弟呤唎”。

呤唎在太平军中，担任过炮兵教练、军火采办等工作。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向在中国的外国人宣传太平天国的正义事业，介绍著名外籍人士到天京参观，推荐外国人到太平军中服务。他带领的太平军炮队曾直接与华尔的常胜军交过锋。同治二年（1863 年）十月，他得到情报：“常胜军”的炮舰“飞而复来”号在上海作短暂停留。他组织了一支精悍的突击队，出敌不意，远程奔袭上海，将“飞而复来”号俘获，驶往苏州附近的马塘桥。李秀成传令嘉奖呤唎，并将“飞而复来”号改名“太平”号，编入太平军水师。

李鸿章得知太平军中有一个“洋匪”深入他的心腹地带有炮舰开跑的消息，十分震惊。他下令布置密探，严密侦缉，务必擒拿。同治三年（1864 年）初，呤唎与另一名加入太平军的英国人怀特一起，潜入上海，为太平军采办军火。他们在上海活动了一个星期，就被清军密探查到了踪迹。怀特被上海的英国领事逮捕，以暗助“逆匪”的罪名判刑 3 年。他备受虐待，不久就惨死在黑暗的地牢里。密探又到处搜寻呤唎的下落。呤唎东躲西藏，忧劳成疾，只得偷偷离开上海，辗转回到英国。

回国后，呤唎写了《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一书，于 1866 年出版。他庄重宣言，他的书“是遵照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领袖的嘱托”而写的，在书的卷首，他题写道：“献给太平军总司令忠王李秀成——如果他已去世，本书就作为对他的纪念。”

呤喇在中国娶有一个妻子，是葡萄牙人，名叫玛丽。同治二年（1863年）六月，呤喇协助守卫九喇洲要塞，掩护太平军向南京集中。清军水师集结上千艘炮船猛攻要塞。玛丽在这次战役中，中弹牺牲。1872年，呤喇在伦敦与海伦结婚。在结婚证的“身份”一栏内，呤喇填写的是“前太平军陆军上校”。婚后一年，呤喇因心脏病突发去世。海伦尊重丈夫的心愿，在他的死亡登记证的“职业”一栏内，仍为他填上“前太平军陆军上校”。呤喇被埋葬在伦敦坎苏尔墓地，墓碑上镌刻着“中国之友，压迫者之敌”的字样，恰当地总结了这位享年仅仅33岁的太平天国洋兄弟的一生经历。

天京陷落

天京内讧以后，太平天国的创业元老死的死，走的走，支撑天国军政大局的重任，落到陈玉成、李秀成两个青年将领身上。

陈玉成、李秀成都是广西藤县人，陈玉成生于道光十七年（1837年），李秀成生于道光三年（1823年）。两个人的家都在藤县宁凤乡长恭里新旺村。陈玉成的叔父陈承镕是拜上帝会的老会员。拜上帝会会众到金田村“团营”时，陈玉成还只有14岁，跟着叔父一起到了金田，当了一名“童子军”。李秀成那年已经28岁，没有到金田去团营。金田起义后，萧朝贵带领的太平军在宁凤乡驻扎了5天，号召贫苦农民踊跃参军。李秀成同堂弟李世贤一起，加入部队，当上太平军的“圣兵”。陈玉成作战勇敢，很快就在太平军中崭露头角。太平天国四年（1854年），太平军围攻武昌。17岁的陈玉成率500名精兵绕到城东防务薄弱处实施突击。他冲锋在前，第一个登上城墙，打开一个缺口，立下攻占武昌城的首功。李秀成沉稳勤奋，不辞劳苦，从行伍中一步步被提拔到指挥位置。太平天国八年（1858年），洪秀全恢复“五军主将”制度，陈玉成为前军主将（原前军主将为萧朝贵），李秀成为后军主将（原后军主将为冯云山），李世贤为左军主将（原石达开位置），韦志俊为右军主将（原韦昌辉位置），蒙得恩为中军主将（原杨秀清位置）。

要保卫天京，一是要拔掉清军窥伺天京的江北、江南两个大营，二是要保住天京上游的军事重镇安庆。

太平天国八年（1858年），陈玉成、李秀成合力拔除了设在浦口的江北大营。陈玉成把江北大营头子德兴阿赶到扬州去后，迅即回师，把从湖北一路追踪而来的湘军李续宾部打了个措手不及。李续宾是湘军悍将，所部6000人被歼，自己在三河身陷重围，被太平军杀死。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也同时被击毙。曾国藩哀叹这次战败的后果是：“不特大局顿坏，而吾邑士气亦为不扬。”陈玉成在三河大捷后，被封为英王。

曾国藩死死围住安庆，为解安庆之围，太平军制订一个“围魏救赵”的计划，陈玉成、李秀成分别从江北、江南向湖北挺进，包抄武昌。陈玉成迅速攻下黄州，直逼武昌。武昌是楚军头目胡林翼的老巢。胡林翼这时还在跟曾国藩一起包围安庆，听到消息，自叹“笨人下棋，死不顾家”，惊忧成疾，呕血身亡。曾国藩设在祁门的大本营也遭到李秀成军的猛烈攻击。曾国藩写下遗嘱，准备自杀。但他还是不批准他的弟弟曾国荃从安庆城下赶回来援救。陈玉成、李秀成分路挺进，彼此联络不上。陈玉成在黄州接受了英国使馆参赞巴夏礼的斡旋，停止向汉口进军。李秀成攻祁门不下，回师转攻浙江，“围

魏救赵”的计划遂告失败。

太平天国十一年（1861年）九月，清军用地雷轰倒安庆城墙，攻入城内，守军 10000 多人牺牲。安庆失守，天京的锁钥落到清军手中。

安庆失守后，陈玉成的部队在皖北驻守，他本人住在庐州。清将多隆阿包围庐州，到太平天国十二年（1862年）四月，庐州城内的粮草已经接济不上，形势危急。

这时候，太平军驻守寿州的将领苗沛霖派一个亲信扮为乞丐混进庐州，给陈玉成送来一封信。信是写在一块黄缎子上，塞在行乞用的竹棍子里带进来的。信里劝陈玉成到寿州来，并表示他可以帮助募集兵马，一道向河南谋发展。陈玉成本来就有北上的意图，苗沛霖的建议正中他的下怀。他率领庐州城内的太平军，趁夜突围，投奔寿州。苗沛霖本是安徽凤台的一个不第秀才，曾因办团练，剿捻军有功，任过清朝的四川北道道员，因在官场受排挤，才反水投降太平天国，被封为奏王。这个反复无常的投机分子已同清朝的镶黄旗满洲都统兼正蓝旗护军统领胜保挂上钩，准备叛变。陈玉成到寿州后，苗沛霖趁其不备，将他拘捕，解送胜保大营。胜保酒食相待，劝他投降。陈玉成坚定地予以回绝，正气凛然地说道：“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胜保将他押在木笼子里解送北京。陈玉成在河南延津即被杀害，年仅 26 岁。

陈玉成封英王时，李秀成没有封王。他自己并不介意，将士们却议论纷纷，天京也传开了李秀成心怀怨愤的谣言。已经投敌的原太平军将领李昭寿（投敌后改名李世忠）听到流言后，认为有机可乘。他派一个原在李秀成身边当过护旗兵的亲信到浦口向李秀成送劝降信。这个人被太平军士兵截获，当众抄出了劝降信。洪秀全本已对李秀成有了戒心，差了几个侍卫到浦口，以查看军营为名义探听动静。他们正好碰上这件事。消息传到洪秀全耳里，更加重他对李秀成的怀疑。他派人断绝江面交通，禁止李秀成的兵马从浦口过江到天京。

李秀成并没有急于申辩，一心一意地指挥太平军坚守浦口阵地。事实说明李秀成没有变心。洪秀全亲笔在黄缎子上写下“万古忠义”四个字，送到浦口李秀成营中，并封他为“忠王”。

陈玉成一死，李秀成虽能痛击“常胜军”，威震东南，但整个局势对太平天国已极为不利。太平军军事行动屡屡受挫，太平天国疆土日蹙，天京危在旦夕。李秀成主张放弃江南，让出天京，主动出走，纵横皖浙赣鄂，在敌人势力薄弱的地方活动，积蓄力量，再图发展。洪秀全却断然拒绝这一建议，他斥责李秀成道：“朕奉天父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做天下万国独一无二真主，何惧之有！不用你奏，你要外去，听你的便。朕铁统江山，你不扶，有人扶。你说没有兵，朕的天兵比水还多，怕什么曾妖！你怕死，就会死。政事不与你相干！”天京城内，粮食奇缺，洪秀全叫军民吃“甜露”度日。所谓“甜露”，就是草团，天王宫里的人也吃这东西。李秀成要求放民出城，洪秀全也严辞拒绝。李秀成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百姓困在城里饿死，只得秘密下令放人。天京城破之前，出城逃生的百姓约有 14 万人。

洪秀全带头吃“甜露”，健康情况恶化，他又不肯求医问药，病情日益沉重。太平天国十四年（1864年）六月一日，洪秀全病死，享年 51 岁。

洪秀全病死后，长子洪天贵福即位，称幼天王。洪天贵福将兵权交给李秀成掌管，但时势至此，他已难有所作为。7 月 19 日晨，曾国荃从地道用火药轰开城墙 20 多丈，湘军一拥而入，天京终于陷落。

李秀成从城门赶回天王宫，保护洪天贵福撤出。他簇拥着洪天贵福向城外突围，反复冲杀，都被清军堵回。等到天色向晚，他们换上湘军号衣，由李秀成带领从早晨敌军炸开的城墙缺口向外冲，才冲出了城。洪天贵福骑的是李秀成换给他的一匹战马，突围后遇到干王洪仁玕。他们会合太平军堵王黄文金部，继续坚持了几个月的斗争。后来，洪仁玕和洪天贵福先后被俘，被杀害于南昌。

李秀成骑的是洪天贵福换下来的一匹跑不快的坐骑，落在大队后面，躲进天京城外的一座荒山上的破庙里。附近的农民遇到他，感激他平日对百姓的好处，愿意将他隐藏起来，设法同太平军联系。丁村王小二和涧东村的陶大赖听到风声，跑到清军营中报信，提督萧孚泗带人到李秀成藏身处将他俘获。

曾国荃听说抓到李秀成，抓起一把锋利的锥子，赤着脚，急匆匆地跑出营帐，拿起锥子向李秀成身上乱刺，并命令士兵用刀割李秀成臂和腿上的肉。李秀成看着气急败坏的曾国荃，从容说道：“曾九（曾国荃排行第九）何必如此！”过了几天，曾国藩从安庆赶来，亲自审讯李秀成。李秀成在囚笼中亲笔写了五六万字的自传，为太平天国的历史留下一份最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原稿被曾国藩撕毁、删改多处，现仅存 33500 多字。他被处死之前，作《绝命词》十句，也被清军灭迹，没有流传下来。

筑路先驱詹天佑

19 世纪 60 年代初，在中国出现了洋务运动。最早起来兴办洋务的是清政府中一批掌握实权的官僚，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楨等。他们在长期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认识到洋枪洋炮拥有的巨大杀伤威力，从积极倡议购买洋枪洋炮入手，进而大力引进军事装备和军工生产，创办制造局、船政局，兴起了一个办洋务的热潮。洋务运动由初期的以练兵、制器和筹设海防为主的“自强”活动，发展到着手建立近代工矿交通企业的“求富”活动，很自然地提出培养掌握西方科学技术的人才问题，从而兴办学堂和派遣留学生的风气大起。洋务派兴办学堂和派遣留学生，其本意是为了培养能忠心耿耿为朝廷服务的人才，然而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深固影响和西方进步民主思潮的结合，从新兴的学堂和留学生中，也造就了一批既掌握近代科学技术，又具有爱国精神的优秀人才，詹天佑就是其中的一个。

詹天佑（1861 年—1919 年），字眷诚，祖籍安徽婺源，出生于广东南海县（今三水市）。1871 年，根据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的提议，清政府在上海设立了出洋局，招收幼童赴美留学。詹天佑才 11 岁，便去香港报考技艺门，被录取，1872 年，他和另外 29 名幼童一起，作为第一批留美官派学生来到美国。

詹天佑起先在康省威士哈芬的海滨男生学校学习英语，1876 年，考入纽哈芬的山庄高级中学肄业。1878 年，他进入耶鲁大学犀飞利工程学院学习土木及铁路工程，1881 年毕业，获土木工程学士学位。同年回国。

回国后，詹天佑被派往福州船政局学习驾驶，第二年，他以“技艺素优”的考评，派到“扬武”号兵舰服务。1884 年，詹天佑随“扬武”舰参加了抗法战争的马江战役。不久，他应两广总督张之洞聘请，担任广东博学馆的教

习。这期间，他完成了“广东沿海险要图”的测绘。博学馆后改名水陆师学堂，詹天佑担任了该学堂的洋文教习。

1888年，詹天佑应中国铁路公司总办伍廷芳邀请，来到天津，担任工程师，在英籍总工程师金达率领下，参与修建津沽铁路。这年他27岁，从此，他把自己与中国铁路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再也没有分开过。

1890年，清政府决定兴建关东铁路，即把津沽铁路向北伸展，经山海关到达奉天（今沈阳市）。詹天佑担任关内段铁路工程师，在修建滦河大桥时，他采用压气沉箱法获得成功，这在中国铁路建筑史上，尚属首次。

1902年，清皇室打算拜谒西陵，有关当局为了便于来往，宣布拨官款银60万两，从京汉铁路的高碑店（属河北省新城县）到梁格庄（属河北省易县）修筑一条支线。当时英、法两国都想争得这项工程。清政府怕得罪双方，索性一方也不应允，而把这项工程交给了詹天佑。这是詹天佑第一次独力承担一段铁路的建设，而时间又很紧迫，必须赶在第二年谒陵前完成。詹天佑沉着冷静，从设计到施工，以出色的组织才能，仅用4个月如期完成了全长42公里的新易线的架设。为此，清朝廷赏给他以知府衔。新易线的建设，为詹天佑日后建筑京张路提供了经验。

1904年，清政府决定修建从北京到张家口的铁路。英、俄两国为了取得这条铁路的建造权，又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清政府谁也不敢得罪，同时也正好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宣布由中国自筹款项独立修建，这个任务自然又落到了詹天佑身上。詹天佑被任命为会办兼总工程师。

詹天佑接受任命后，对全路进行了仔细的踏勘，据初步测算：全路约长360公里，桥梁约7000余尺，需凿通许多高山峻岭，以石工最多。修建这条铁路的艰巨性前所未有的。但是经济上的价值非常之大，据他估算：铁路建成后，每年货运收入可达180万两，客运收入可达25万9千两。同时，铁路沿线的宣化鸡鸣山煤矿和怀来新保安山煤矿，可改用机器开采，从而提高效率。开采出来的煤既可供铁路用，又可运往外地。因此，他得出结论说：这条路早一天建成，国家早一天获得利益，旅客早一天享受便利。更加重要的，是杜绝了外国人的觊觎之心。1905年，詹天佑向清政府提出了预算：需费银7291860两，时间4年。

1905年9月，京张铁路正式开工。

为了争取早日完工，詹天佑采用分段勘测、分段设计、分段施工和分段通车的办法。从9月开工起，不到一年，从丰台到南口的一段首先通车。

从南口到岔道城一段最为艰巨。到处是层峦迭障，壁峭弯多。必须开凿四条隧道，最长的八达岭隧道计1091·18米。詹天佑首次使用炸药开凿石壁。在修建八达岭隧道时，最初是从开端开凿，由于山腹石质坚硬，每天只能前进两尺，进度很慢。詹天佑后来采用直井开凿方法，从山坡上开凿两个直井，然后分头开挖，这样就形成了六个工作面，大大加快了工程进度。1908年，隧道贯通，经测量，南北直线与水平高低，丝毫不差，可见设计、施工的精细。

1909年7月4日，京张路全部竣工，全长357里，工期提前两个月。经费节省几十万两。

1909年8月19日，在南口车站，举行了隆重的通车典礼，中外来宾1万多人。詹天佑受到人们的欢呼和赞扬。外国工程技术人员金达、柯克斯等应邀参观铁路，对整个工程赞佩不已。

对来自各方面的赞扬，詹天佑内心极不平静。当工程还未开始动工的时候，外国人几乎众口一词，预言这个工程肯定不能完成。他们甚至狂妄而又轻蔑地声称：“在中国，能开凿关沟的工程师还没有诞生！”詹天佑记下了这一切，却不回应，而是默默去干。在工程进行当中，詹天佑兢兢业业，发奋工作。他把办公室搬到工地上，与筑路工人打成一片，注意听取他们的意见，及时改进施工方法，殚精竭虑，不辞辛劳。他曾写信给在美国留学时的老师诺索普夫人，信中说：“中外人士都密切注视着我的工作。如果我失败了，将不仅是我个人的不幸，也将是全体中国工程师和中国人的不幸，因为人们将不再信任中国的工程师。”现在，京张铁路作为现实横亘在中国的大地上，它以铁的事实驳斥了那些西方技术人员的谰言。詹天佑内心充满骄傲，作为一个中国工程师的骄傲。但他朴实无华，谦虚谨慎。詹天佑不善言辞，却非常幽默。他说：“要我谈话，比打通八达岭隧道还难。”

京张路完成以后，詹天佑兼任张绥路（从张家口到呼和浩特）和川汉路总工程师。1910年应聘为河南铁路公司顾问工程师、商办粤汉铁路粤路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等职。

辛亥革命后，詹天佑被临时政府任命为粤汉铁路会办，后转任汉粤川铁路会办，1914年任督办。1917年任交通部“铁路技术委员会”会长，拟订中国国有铁路标准。1919年2月奉北洋政府命，参加设于海参威的协约国西伯利亚铁路监管会，为维护国家主权，带病就任该会技术部的中国代表，4月24日，因病在汉口去世。

詹天佑为了中国的铁路事业献出了他全部的心血。他临死前寄希望于青年工程师，赠给他们四句话：“策划须详，临事以慎。精研学术，以资发明。”

镇南关大捷

镇南关就是今天与越南接壤的友谊关，隶属广西省。1885年3月23日，中国军队与法国军队在这里进行过一场大战。中国军队在年已70的老将冯子材的率领下，与尼格里统率的法国侵略军展开生死肉搏，经过两天激战，法国侵略军全线崩溃，仓皇逃出镇南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镇南关大捷。在这次战役中，法军死亡2100多名，其中军官数十名，法军司令尼格里受重伤。中国军队缴获了大量战利品。这次战役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所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它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士气，沉重地打击了西方侵略者的嚣张气焰。3月底，法军惨败的消息传到巴黎，法国人民举行了游行示威，高呼：“打倒茹费理！”当天晚上，茹费理内阁垮台。

然而，镇南关大捷似乎只是绵延两年的中法战争中的一个插曲，犹如夜空中慧星的瞬时闪亮，在这之前和这之后所发生的一连串历史事件，令人感到痛心疾首，无比愤恨。

中法战争导源于法国殖民者对越南的侵略。

早在1858年6月，正当英、法两国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法国又单独勾结西班牙殖民者开始进攻越南。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法国立即把侵华军队集中到越南，倾全力向越南进攻。1862年6月，法国强迫越南顺化王朝签订了第一次《西贡条约》，霸占了越南南方以西贡为中心的东边三省地区。1867年，法军又占领西部昭笃、河仙、永隆三省。至此，越南南

部六省，全部沦为法殖民地。

法国殖民者的最终目的是中国。法国驻海防领事士尔克说：法国必须占领北圻（音 qí，北圻即越南北部）。因为它是一个理想的军事基地。有了这个基地，一旦欧洲各强国企图瓜分中国时，我们将是一些最先在中国腹地的人。”1873年11月，法国驻西贡总督派安邨率领远征队，攻占了河内及附近四省。这时，越南国王阮福时请求当时驻扎在中越边境保胜地方的刘永福黑旗军，进军河内，协助越南抵抗法军侵略。刘永福是广东钦州（今广西防城）人，出身贫苦，13岁便开始做工，15岁跟随大人学习拳棒，精通武艺。1857年，刘永福参加了天地会起义。他所带领的部队，常执黑旗作战，被称为黑旗军。1865年，在清军进击下，刘永福率领黑旗军转入越南境内，1870年进驻保胜，在那里开辟山林，聚众耕牧。由于他善于团结部众，军纪严明，勇敢善战，他的部队日益壮大，人数扩充到2000余人。1873年12月21日，刘永福率黑旗军，配合越南军队，在河内城郊大败法军，歼敌数百人，侵略军头子安邨当场被砍下脑袋，法军被迫退出河内，败守海防。1880年9月，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茹费理出任法国内阁总理，这个家伙一上台，就狂妄叫嚣：“必须征服那个巨大的中华帝国。”他又说，为了征服中国，就必须“站在那个富庶的通路（指越南）之上。”1882年4月，法军再陷河内，企图打通红河，直窥云南。1883年5月，黑旗军和越南人民又一次配合，在河内附近的纸桥与法军决战。黑旗军战士个个奋勇直前，犹如波涛汹涌，以白刃战迎击装备精良的法军，直杀得法国鬼子尸横遍野，血流成渠。侵略军司令李维业，副司令卢眉以下30余名军官和200余名士兵被击毙。

法国侵略军在越南北部被黑旗军打得惨败，而由孤拔率领的南路法军却攻占了越南都城顺化，并强迫越南统治者签订了《顺化条约》，将越南变成法国殖民地。接着，法国侵略者就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

1883年12月11日，法军6000人在法国远征军总司令孤拔率领下，对协助越南守护山西的清军和黑旗军发动进攻，中法战争正式爆发了。

中法战争经过了三个阶段：从1883年12月山西之战开始，到1884年5月《中法会议简明条款》签订，是中法战争第一阶段。战争局限在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从1884年法军攻击基隆起，到马尾海战中国失败为止，战争主要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从1884年8月清政府下诏宣战，到1885年4月清政府下令停战，是中法战争第三阶段，战争除在东南沿海继续进行之外，主要战场在中越边境。

在第一个阶段，由于清政府的投降主义路线影响，清军指挥混乱，士气低落，清政府驻扎山西的清军统帅、云南巡抚唐炯未战先逃，留下黑旗军和少数清军御敌。黑旗军与法军激战5日，终因众寡悬殊，被迫撤离，山西失守。法军随即占领红河三角洲。

1884年5月11日，惊慌失措的清政府派李鸿章与法国代表福禄诺谈判，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款》，正式承认法国对越南“保护权”，并允诺从北圻撤军。李鸿章曲意迎合法国侵略者的意志，因此受到茹费理的夸奖。

但是法国侵略者并不因此止步。1884年8月4日，由利士比率领的法国舰队，发动了向台湾基隆的进攻。在中国守军的奋勇反击下，法国海军陆战队遭受失败，狼狈逃回海上。8月22日，由孤拔率领的另一支舰队，在福建马尾向中国福建水师的军舰突然开火。福建水师是中国仅次于北洋水师、南

洋水师的第三大海军部队，拥有 11 艘兵舰，官兵 1117 人。当时法军是 9 艘军舰，舰上官兵为 1790 人。可是，由于清政府官吏的昏庸腐败，闽浙总督何璟、船政大臣何如璋等害怕得罪法国侵略者，影响中法“和议”和列强“调解”，不仅不积极作好防御，反而对福建水师进行种种约束，如不准先开炮等等。这样，在法舰的突然袭击面前，福建水师仓促应战，有的军舰还未来得及起锚就被击沉，有的船身起火，连遭法舰夹击。在这种极为不利的形势下，福建水师部分爱国官兵临危不惧，英勇抗敌。许多舰艇在舰身下沉的情况下，仍向敌人射出一排排愤怒的炮弹，直到全舰覆灭。

这次海战，福建水师兵舰 11 艘，运输船 19 艘，在短短的 20 多分钟内，全部被击沉、击毁，官兵阵亡 521 人，受伤 150 人，下落不明者 51 人。清军遭受惨败。

法国侵略军的暴行激起全体中国人的义愤，全国各地掀起抗法斗争的怒潮。1884 年 8 月 26 日，清政府迫于民众的压力，不得不向法宣战。

法军在封锁台湾，侵扰镇海的同时，又在中越边界地区增兵，从陆路发动进攻。

1885 年 2 月 4 日，法国侵略军司令尼格里率兵向中越边境东路清军进攻。广西巡抚潘鼎新不战自退，闻风而逃。2 月 23 日，法军占领镇南关。正当这个危急时刻，本已辞职的老将冯子材被重新起用，率兵开往前线抵抗法国侵略军。法军见中国军队经过整顿，军力大增，便炸毁镇南关，退兵文渊城。冯子材率兵进驻镇南关后，立即在关的隘口处抢筑了一条 3 里长横跨东西高岭的长墙，在关前两旁山上赶修炮台。3 月 23 日，尼格里率法军分三路扑向关前。这时，冯子材用一块红绸子缠着头，光脚穿着草鞋，手持长矛，大喊一声：“跟我去杀尽强虏！”便从关上向法军冲去。将士们见白发蹒跚的统帅带头杀向敌人，一个个无不奋勇争先，向敌人扑去。一时间，镇南关前喊杀声震天，血肉横飞。一个法国军官后来回忆道：“在我们的脚下，敌人从地上的一切缝隙出来，手持短戟。开始了可怖的混战，……所有军官和士兵都被围住、俘虏，敌人由各方面射杀他们，然后割去他们的头。”

在镇南关前，侵略者遭到正义的无情惩罚。

然而，将士们的浴血奋战，却成了腐败的清政府向敌人投降讨价的砝码。1885 年 4 月 7 日，清政府诏令前线停战，撤兵。5 月 13 日，李鸿章在天津与法国政府代表巴德诺开始谈判，6 月 9 日，中法签订《越南条约》，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并同意在云南、广西两省中越边界，开埠通商。这样，法国在战败的形势下，仍然达到了发动这场侵略战争的全部目的。

在中法战争中，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似乎是给公正的历史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中日甲午战争

黄海之战是甲午（1894 年）中日战争中的一次海战。

早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就确立了对外扩张的所谓“大陆政策”，其步骤是先占领朝鲜和台湾，进而征服中国大陆乃至世界。明治天皇美其名曰“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

1875 年 9 月，日本迈出了侵占朝鲜的第一步，派军舰闯入汉江汉城，并

占领永宗岛。1876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从此，日本加快了侵占朝鲜的步伐。1882年，日本借口“壬午兵变”，强迫朝鲜签订《济物浦条约》，获得在朝鲜的驻兵权。1885年，日本又利用朝鲜的“甲申事变”，要挟清政府订立了中日《天津条约》，规定朝鲜今后若发生重大变乱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需要出兵朝鲜时，必须事先相互通知。这样，日本又获得了向朝鲜出兵的特权。

19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到1890年，便出现了经济危机，国内阶级矛盾非常尖锐。日本统治集团为了摆脱困境，加快了侵略战争准备的步伐：一方面增加军费，以国家财政的百分之六十来扩充军备，建立和发展近代化的海陆军；一方面大造舆论，日本首相山县友朋在帝国议会发表施政演说，竟把朝鲜、中国东北、台湾说成是与日本安危相关的地区，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已经做好了从各方面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准备。

1894年5月，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国王请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当时负责朝鲜事务的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6月5日，李鸿章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兵1500人渡海赴朝。日本探知消息，早于6月2日便开始向朝鲜派兵，6月5日成立了战时大本营，同时派出一支七八千人的混成旅，火速运往朝鲜。6月8日，日本侵略军先头部队在仁川登陆。6月10日，从仁川到汉城一带战略要地，全被日军控制，并逐渐包围驻守牙山的清军。战争一触即发。

面对日本的侵略态势，李鸿章大为惊慌，既不敢抵抗，也不敢增援，进退失据。他建议两国同时撤兵，以求早日“收场”，但被日军拒绝。这时，国内的舆论强烈要求清政府增援备战。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却爆发了主战与主和的激烈斗争。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极力主和。慈禧是个骄奢淫逸、贪婪成性的权欲狂，她这时虽然“还政”于光绪帝，但仍然攫住军政实权不放。这年正是她的60寿辰。为了举办盛大庆典，从年初开始就在北京大兴土木，从紫禁城到颐和园，沿路搭盖彩棚。她极力反战，因为一旦爆发战争，非但“万寿庆典”办不成，而且她的统治地位也有被削弱的危险。李鸿章正是她的依托和支柱。以光绪帝为首的帝党竭力主张整顿军旅，抵抗侵略。光绪帝的抗战主张，一方面体现了国内公众舆论的意向，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摆脱慈禧的控制，争取他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他多次谕令李鸿章“整军奋击”。李鸿章依恃慈禧做后台，对光绪帝阳奉阴违，仍极力推行“以夷制夷”政策，乞求俄、英等国调停，以达到避战自保的目的。然而列强各国都居心叵测，为了各自的利益，暗中怂恿日本发动侵略。李鸿章的“调停”希望破灭。

1894年7月24日，李鸿章迫于光绪帝和主战派的压力，派卫汝贵、马玉昆、左宝贵、丰陞阿等四军，从辽东渡鸭绿江进军平壤，又雇用英国商船“高升”号运兵增援牙山，由北洋舰队的济远、广乙、扬威三舰护航。日本获悉情报，派遣联合舰队去进行截击。

7月25日凌晨，济远、广乙二舰从牙山返航，行至牙山口外的丰岛海面，正与日本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舰相遇。日舰立即向济远、广乙开火，日本侵略者不宣而战，正式挑起了侵华战争。这年农历是甲午，历史上称为甲午战争。北洋舰队被迫还击。战斗开始不久，广乙便中弹起火，管带林国祥命令南驶搁浅，然后将军舰炸毁。济远势孤，管带方伯谦贪生怕死，命令挂上白旗，向西逃跑。吉野紧追不舍。在紧急情况下，爱国水手王国成、李仕茂

抗命发炮回击，连发4炮，3发命中吉野，吉野受伤逃遁。济远驶往威海卫。正当日舰炮击济远时，高升号运载士兵由天津驶至。高升号被日舰包围。日舰逼迫高升号投降，遭到船上千余名中国将士拒绝，日舰接连开炮，高升号被击沉，船上官兵大部分壮烈殉国。

就在同一天，日军4000多人向牙山清军发起进攻。主将叶志超弃守牙山，逃往平壤。聂士成在成欢驿率部迎战，因众寡悬殊，也不得不撤回平壤。

8月1日，中日两国同时正式宣战。

但是李鸿章在慈禧的支持下，仍然采取消极抵抗的战略方针，命令陆军可守则守，不可守则退；命令海军“保船制敌”，“但令游戈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不得与日舰拼击。这种妥协退让的政策，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压抑和破坏了广大爱国将士的抗敌热情。

9月15日，日本陆军分四路进攻平壤，中国军队奋勇还击。马玉昆部在平壤南门重创日军。左宝贵部坚守玄武门，也给敌人重大杀伤。但左宝贵不幸中炮牺牲，玄武门失守。这时，统帅叶志超贪生怕死，再次下令撤退，丢下大量军火物资，仓皇逃跑，一路狂奔500里，渡过鸭绿江，退到了凤凰城。

在海上，日本联合舰队寻求与北洋舰队决战。

9月16日，海军提督丁汝昌率北洋舰队护送援军至大东沟，9月17日从大东沟返航，上午11时，行至大东沟以南黄海海面，正与日本舰队相遇。日舰共12艘，以松岛为旗舰。北洋舰队是10艘，以定远号为旗舰。丁汝昌发现日舰后，即令各舰升火，以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居中，为“人”字阵列迎战。12时50分，双方开始交火。北洋舰队远远地发出第一排炮弹，都没有命中。日本吉野等四舰，凭借它的快速，横越定远、镇远两铁甲舰，绕攻右翼超勇、扬威两小舰，超勇中弹起火，旋即沉没，扬威也中弹起火，驶出阵外救火，因搁浅而失去战斗力。与此同时，定远舰因施放大炮，船身猛簸，致使站在飞桥上督战的丁汝昌摔下受伤，于是由定远号管带刘步蟾代他指挥，丁汝昌仍坐在甲板上鼓励士气。定远等舰猛击日舰比睿、赤城，致使日舰遭受重大伤亡，退出了战列。

战斗进行到下午两点半钟，号称日本精锐的吉野等先锋队4舰由北洋舰队右翼向左回旋，驶至定远前方，并向中国旗舰逼进，企图施放鱼雷。这时，致远舰管带邓世昌见旗舰遭遇危险，为保护旗舰，下令开足机轮，疾驶至定远之前迎战日舰。致远受到日本吉野四舰围攻，在激战中多处受伤，舰身倾斜，而且弹药将尽。下午三点钟前后，致远正与吉野相遇。邓世昌眼中射出怒火，对帮带大副都司陈金揆说：“倭舰全靠吉野，如果把它击沉，足使倭奴丧气！”于是加大马力，朝吉野冲击，誓与它同归于尽。吉野急忙躲避，同时施放鱼雷，致远被鱼雷击中，机器锅炉迸裂，顷刻沉没。邓世昌以下将士200余名，除20多名获救，其余全部壮烈殉国。

邓世昌原名永昌，字正卿，广东番禺人。18岁考入福州沿政学堂学习航海。1875年任海东云炮舰管带，1880年调到化洋舰队，任飞霆炮舰管带，1887年被派往德国，接收订购致远等四艘快舰，回国后担任致远管带，一直到黄海海战。邓世昌平时严格训练，军事业务熟练，同事们赞他使船如使马。邓世昌常说：“人谁不死，但愿死得其所！”丰岛海战后，北洋广大将士齐感义愤，誓与日军决胜负于海上。邓世昌对部下将士说：“设有不测，誓与敌舰同沉！”他与致远广大将士终于实践了自己的誓言。

除致远外，经远舰在管带林永升指挥下，与敌舰激战，林永升中弹阵亡，经远舰随之被击沉。全船将士 200 余人，仅 6 人获救，其余都壮烈牺牲。处在北洋舰队左翼的济远、广甲二舰，见致远沉没，竟可耻逃跑。管带方伯谦、吴敬荣成了民族千古罪人。

黄海之战，日本军舰重伤 5 艘，北洋舰队沉没 5 艘，北洋舰队的损失比日本舰队大。但是北洋舰队仍保持相当的战斗力。可是此后，李鸿章为了保住自己利益，再不敢要北洋舰队出战，竟把舰队深藏于威海卫，以致于 1895 年 2 月被日本舰队覆灭。

马关奇耻

1894 年 10 月下旬，平壤之战与黄海海战后一个多月，日本侵略军分两路进攻中国辽东。一路从平壤北上，渡过鸭绿江，清军除聂士成部在虎山有所抵抗外，其他各军纷纷溃退，到 12 月中，凤凰、宽甸、岫岩、海城相继失守。一路在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11 月初，日军进攻大连，守将先一天逃走，大连不战而陷。11 月 18 日，日军进攻旅顺。旅顺为北洋海军主要基地，清政府为建设旅顺港，花费几千万两银子，为时达 7 年之久。这时，北洋舰队奉李鸿章命令，全部躲藏在威海卫，与旅顺隔海相望。当日军向旅顺发动攻击时，只有徐邦道部奋勇反击，而黄仕林等守将率部潜逃，11 月 22 日，旅顺沦陷。日军进入旅顺后，兽性大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全城幸免于难的仅 36 人，这 36 人是由日军驱遣掩埋被杀者尸体的。

大连、旅顺失守后，清政府中以慈禧、李鸿章为代表的主和派更加急于求和，于是派侍郎张荫桓，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媾和。然而日本却因为没有达到侵略目的，以时机尚未成熟为由，拒绝谈判，张、邵二人被迫回国，清政府的求和活动再次受挫。

1895 年 1 月，日军从陆、海两路向山东半岛的威海卫发起了包抄进攻，陆军在荣成成山头登陆，包抄威海卫后路，日本联合舰队则从海上发动了攻击。

北洋舰队当时还保有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靖远等 5 艘巡洋舰，此外尚有炮艇 6 艘，鱼雷艇 12 艘，具有相当的战斗力。当旅顺危急时，北洋舰队统帅丁汝昌曾亲自到天津见李鸿章，要求率北洋舰队增援旅顺，与日军决一死战。但李鸿章严令丁汝昌“保船避战”，并说如果违令出战，即使胜了；也要治他的罪。因此，从日军进攻大连以来，北洋舰队一直隐藏在威海卫港内，不作战斗准备，结果造成被动挨打的局面。从 1 月 30 日起至 2 月 11 日，日本联合舰队对威海卫发动 8 次进攻，北洋舰队受日本海、陆军夹击，定远舰、靖远舰先后中鱼雷搁浅，来远舰中鱼雷倾覆，威远舰中雷沉没，12 艘鱼雷艇擅自逃跑。战斗开始前，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写信给丁汝昌，劝他率舰队投降，遭丁汝昌严词拒绝。这时，在面临危急的情势下，总教习英国人马格录、美国人浩威策动舰上外国人及威海卫营务处提调牛炳麇等又胁迫丁汝昌投降，丁汝昌誓死不投降，下令各管带同时沉船，但遭到反对，只有定远管带刘步蟾派人将定远炸沉，然后用手枪自杀。丁汝昌见大势已去，服毒自杀，以身殉国。北洋舰队余下的舰艇，都向日本投降。1895 年 2 月 17 日，日本舰队开进威海卫，北洋舰队全军覆灭。

在辽东战场，从关内调来的湘军，也是全线崩溃，日军3月7日攻占营口，3月9日攻占日庄台，至此，整个辽东半岛为日本占有。

既然清政府早就抱定投降的方针，日本在战场上也已取得绝对优势，占有中国大片土地，加上国内财政困难，同时也担心再打下去，引起西方列强干涉，因此日本接受了清政府和谈要求。

1895年3月13日，李鸿章以美国人科士达为顾问，带领他的儿子李经方及随员马建忠、伍廷芳，乘船从天津出发，往日本马关议和。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合肥人，1823年2月15日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17岁考取秀才，24岁考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太平天国起义不久，李鸿章以一介书生，投笔从戎，从工部侍郎吕贤基回乡办团练，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1861年，李鸿章受曾国藩命令，编练淮军，接着受任江苏巡抚。李鸿章率领淮军在镇压捻军中卓立功勋，1868年接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并在此任上干了25年。1875年受光绪上谕，督办北洋水师。由此可见，李鸿章是清朝重臣，是一个老练的政治家，一贯对清朝廷忠心耿耿，对民众反抗凶狠镇压，而对洋人则是柔媚和顺，因此清政府一切外交方面的事情，都由李鸿章出面。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李鸿章“大节无亏”，功名赫赫，为朝野所敬重。李鸿章也自慰功名事业，达到了颠峰，如果没有别的意外，他的一生可谓“圆满”了。万没有想到日本发动了侵略朝鲜、觊觎中国的战争。因此，李鸿章一开始就站到了和慈禧一样的立场上，为了保名誉，保地位，归根到底为了保自己，而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于是千方百计保住北洋水师也就成了保住自己的关键。然而，战争一旦打响，便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日本侵略者的欲壑难填，既占朝鲜，又占辽东半岛，既占辽东半岛，又攻占威海卫，以致北洋水师全军覆灭。李鸿章一而再，再而三地丧师辱国激起朝野公愤，他多次受到光绪的训斥，也曾被摘去三眼花翎和扒下黄马褂。因此，这一次去日本议和之前，他把能否割地这一关键问题提交清政府决定。他自己声称：“割地之说不敢担承。”又说：“割地不行，议不成就回。”实际上，他是以此要挟政府。清政府内两派意见分歧。光绪帝开始坚决不允割地，寄希望于英、俄等国干预，可是列强不表态，光绪向慈禧太后请示，慈禧也很狡猾，这时反要光绪做主。光绪迫于形势，终于授予李鸿章“商让土地之权”。李鸿章就是带着这样的全权代表的敕书来到日本的。

3月20日，李鸿章与日本全权代表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在马关春帆楼开始举行会谈。李鸿章要求议和之前先停战，伊藤摆出战胜者骄横姿态，乘机要挟，提出要停战就先交出天津、大沽、山海关，及负担停战期间日军经费。第二天，李鸿章放弃停战要求，先议和款。这天会议结束后，李鸿章在返回寓所途中，被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用手枪击中左眼下部，谈判暂时停止。这一来，日本受到舆论指责，日本担心如果李鸿章以负伤为由撤回，形势将对日本不利。于是由天皇出面，表示严惩凶手，并派御医前往诊治，同时主动宣布除澎湖、台湾外，实现停战。李鸿章没有对被刺作出进一步反应，相反，在得到日方停战决定后，尽管绷带外面仅露一眼，仍“露出十分高兴神情”。4月1日，日方摆出议和条款，包括：承认朝鲜独立自主；割让奉天南部、台湾、澎湖；赔偿军费3亿两；缔结新的通商行船条约；开放北京等7处为通商口岸，等等。

李鸿章一面将和款内容电告清政府，一面开始向日方讨价还价。光绪得知条款，电告李鸿章：割地只一处为限，赔偿以一亿两为限。慈禧则声称：

“两地都不可弃，即使再战也在所不惜。”但是日方提出的最后条款却是：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赔款2亿两。伊藤博文蛮狠地对李鸿章说：“日本已让到尽头，中国只需‘允’和‘不允’两句话罢了。”李鸿章在凶顽的日本侵略者面前，只有哀声乞怜，而对清政府，却施加了压力：一面说他力竭计穷，已无能为力；一面又说，日本已派兵到大连湾，如谈判破裂，京津难保。

慈禧和光绪都是色厉内荏的人。一听到京城可能不保，社稷可能危殆的恐吓，态度都软化下来。最后由光绪下谕：“如竟无可商议，即遵前旨与之定约。”

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中日《马关条约》上签了字。

《马关条约》共11款，最主要的有：中国将辽东半岛、台湾全岛、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船可以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日本臣民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设厂制造工业品，并得免征一切杂税。

《马关条约》是继《南京条约》之后又一最严重的丧权辱国条约。《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至国内，全国舆论哗然，人民切齿愤恨。

4月18日，李鸿章回到天津，立即称病不敢出门。7月29日李鸿章回到北京，光绪指斥他“伤国体”，后党指责他“误国”，这当然都是嫁祸于人的手法。慈禧也改变了对他的欢心，转而信任起奕訢、荣禄。李鸿章除了保留文华殿大学士衔，失去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宝座。

李鸿章不由哀叹说：“正当自己在仕途上一路扶摇之际，却从天外降下一个中日交涉差使，以致一生事业，扫地无余这是环境所迫，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

康有为上书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危机更加严重。一些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爱国知识分子掀起了救亡图存的新高潮，他们认识到，只有变法、维新，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才能使国家富强起来。为此，他们发动了变法维新的政治改革运动。实行变法维新的这一年是中国农历的戊戌年（1894年），所以这次变法维新运动又叫戊戌变法。领导这次变法维新运动的，就是著名的改良主义思想家康有为。他前后七次给光绪皇帝载湉（音 tián）上书，陈述他的变法主张，光绪皇帝在读到他的《上清帝第五书》之后，终于下定了变法的决心，于是维新运动正式展开。

康有为（1858—1927年），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县人。他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少年时期受过严格的儒家传统教育。19岁时，他拜九江人朱次琦为师，跟随他学习了3年。朱次琦是今文经学家，今文经学主张“济人经世”，用学问为现实服务。康有为深受他的影响，思想发生变化，开始对封建传统文化表示怀疑与失望。从1879年起，他受在北京任职的张鼎华的影响，开始阅读介绍西方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学知识的书刊，接触西方资本主义的事物。就在这年，他游历了香港，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作了实地考察，他感到资本主义制度比古老的中国封建制度要优越得多。民族的危亡和国弱民穷的社会现实，特别是清政府的昏庸腐败，使他痛感必须进行社会制度的改

革。经过几年的思考和摸索，他得出一个认识：“要救中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从此，他走上了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模式，来改变中国的封建制度的救国图新的道路。

1888年12月，正当中法战争之后，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他利用这个机会写了《上清帝第一书》，请求变法。在信中，他首先陈述了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中国的阴谋，指出要抵御外敌，就必须“内修政事”，要“内修政事”，就必需变法，阐明了变法图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他在信中对顽固派的苟且偷安和洋务派的腐败等弊端进行了抨击。他要求皇帝赶紧“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以挽救国家的危亡。他充满信心地指出，只要中国实行变法维新，10年之内，“富强可致”，20年即可“雪耻”。

这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第一次向清政府正式提出的建议。由于顽固派的阻挠，这封上书没有送到光绪皇帝手中。康有为没有灰心，他要为他的变法思想寻找更坚实的理论支柱。

1889年秋，康有为离开北京，年底回到广东。次年春，他移居广州安徽会馆。这时，他会晤了今文经学家廖平，在他的启发下，进一步钻研了汉代今文大师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终于从儒学中找到了改革变法的理论依据。他把改良主义思想同儒家今文学说结合起来，用改良主义观点对儒家学说作了重新解释，从而为变法运动建立了系统的理论依据。从这以后，他聚徒讲学，著书立说，积极从事变法维新思想的宣传鼓动工作。1891年，康有为应陈千秋、梁启超之请，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开始讲学，梁启超等成为他的首批弟子和变法维新思想的忠实追随者。后来，讲学活动又扩展到广西。与此同时，他完成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理论著作。《孔子改制考》在当时思想界曾引起震荡，被称为是“火山大喷火”，清政府将它作为“悖书”加以严禁。因为根据《孔子改制考》，孔子成了变法维新的祖师，什么民权、议院、选举、民主、平等等等，都可以从孔子那里找到依据，或者说，就是他始创的。

1895年4月，康有为与梁启超等一道到北京参加会试。正在这时，《马关条约》签字的消息传来，全国人民痛心疾首，掀起抗议的热潮。康有为更是感到无比义愤，他联合各省应试举人1300多人，于5月2日联名上书请愿。这就是震惊朝野的“公车上书”。所谓“公车”，用的是汉代典故。汉代用公家的车马接送被征举的士人，所以后代把入京应试的举人称作公车。这封书是康有为连夜起草的，洋洋万言，因此也是他上的第二封书。在这封书中，康有为提出了“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四项主张，请求皇帝下诏，处分丧权辱国大臣；迁都西安，整军再战；加紧练兵，着重选将购械；发愤变法，推行富国、养民、教民之策。在这封书中，康有为提出了他变法维新的系统主张，这封书递到都察院，都察院以清政府已在《马关条约》上签字，无法挽回，拒绝接受。但是它被广为传抄、印刷，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要求变法的呼声越来越高涨。

“公车上书”后不久，会试放榜，康有为考中进士，授工部主事。同年5月，康有为写下《上清帝第三书》。在这封书中，他对“公车上书”的内容作了补充说明，同时提出了变法的步骤。他诚恳指出，要实现富国养民之策，首先要做的就是求人才，慎左右，通下情。这封书，光绪皇帝看到了，命阁臣抄录副本三份：一份呈送慈禧太后，一份留在乾清宫，一份抄发各省将军督抚议处。光绪皇帝在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下，逐步加速变法的决心。

康有为等人的变法维新思想，通过他的老师、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及一些朝臣，他早有所闻。震惊朝野的“公车上书”，也通过翁同龢、给事中高燮曾，已知道它的内容。正是在康有为一而再，再而三的上书促动下，他颁发了“举人才诏”。从此，光绪皇帝“毅然有改革之志”。6月30日，康有为又有《上清帝第四书》。在这封又是洋洋万言的书中，更详尽地阐述了具体实施变法的许多措施和办法。特别是提出了“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但是这封书又被朝廷中顽固派所阻扼，都察院、康有为所在的工部都拒绝接受、转递，因此，光绪皇帝未能见到。

为了争取更多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支持，扩大变法维新思想的影响，康有为等开始致力于组织学会和创办、发行报刊。他先后在北京、上海成立了强学会，创办和发行《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等报刊。强学会是中国资产阶级最早发起成立的政治团体，以“广联人才，创通风气”为宗旨，但由于康有为主要依赖皇帝、大臣自上而下进行改革的改良主义路线，许多官僚、甚至投机分子也加入了强学会，强学会成员复杂，组织涣散，并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且不久即遭清政府封禁。然而强学会毕竟开了组织团体之风气，各地纷纷仿效，与此相配合，发行报刊之风也大为盛行。这时，在澳门出版了《知新报》，在天津有《国闻报》等，当时有影响的刊物不下30种。在湖南，变法维新运动更加蓬勃发展，成立了南学会，创办了《湘学报》，谭嗣同发表了《仁学》这部很有影响的变法维新的哲学理论著作。

1898年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消息传出，康有为第五次上书光绪皇帝，这就是《上清帝第五书》。在这封书中，康有为提出三点具体计划：一、采法俄、日以定国是；二、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三、听任疆臣各自变法。最后向光绪皇帝提出了警告：如果再不变法图强，恐怕想当一个老百姓，只怕也不可能了。

这封奏章通过几番周折，终于递到光绪皇帝手里。光绪皇帝看后，说：“像这样的直言，如果不是忠肝义胆，不顾生死的人，哪个有胆量说出口并且呈送到朕的面前来呢？”光绪谕告总理衙门事务大臣：今后康有为如有条陈，即日呈递，不得延误！

经过康有为百折不回的努力，在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的紧迫形势下，在全国蓬勃发展的变法维新运动的巨大压力下，光绪皇帝终于在1898年6月11日“下诏定国是”，宣布变法，于是，百日维新开始了。

百日维新

19世纪末叶，由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是一次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它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在维护清朝封建统治的前提下，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发展民族工商业，从而挽救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使国家独立富强。因此，它的理论基础是托古改制，把孔子抬出来作为改革的祖师爷，它的政治路线是依靠皇帝，和皇帝身边的大臣。寄希望于他们自觉的变法维新。

在维新派的不断努力之下，清王室中的光皇帝，站出来担当起自觉变法维新的重要角色。

光绪帝，名载湉，他是醇亲王奕訢（音 xu n）的儿子。奕訢是咸丰的弟弟，又是慈禧太后的妹夫。载湉与同治皇帝（载淳）是堂兄弟，又是姨表兄弟，因为载湉的母亲与慈禧是同胞姐妹。同治没有儿子，同治死后，慈禧怕皇权外落，提议让载湉继承皇位。这是因为：一，载湉是她的外甥；二，载湉才4岁，年纪幼小。这样，朝廷大权仍可控制在她手里。慈禧一提议，军机大臣谁敢不答应？于是，才4岁的载湉登上皇帝的宝座，这就是光绪皇帝。太后垂帘听政，牢牢控制着朝廷的一切大权。光绪在慈禧的监护淫威下战战兢兢成长。光绪十四年（1888年），光绪18岁，已经成年。慈禧将自己的侄女册立为皇后，于第二年为光绪举行了成婚大典，同时将朝政大权归还光绪，自己则住在颐和园中颐养天年。

光绪皇帝虽然亲政，但仍事事须向慈禧报，不敢专断。慈禧通过皇后、太监李莲英在光绪身边遍布耳目，光绪一举一动都被慈禧掌握。然而光绪毕竟正当青年，也是一个有血气的人。他不甘心当一个傀儡，试图开始组织自己的政治力量，以摆脱慈禧的控制。他首先依靠的是翁同龢，时任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他是光绪的老师。除翁同龢外，还有军机大臣李鸿藻，工部侍郎汪鸣銮等，于是无形中在朝廷形成了一个帝党。光绪依赖帝党，与以慈禧为首的后党相抗衡。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以光绪为首的帝党和以慈禧为首的后党，产生了主战与主和之争。然而帝党没有实权，当时掌握和、战实权的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实际上的中国统帅。李鸿章则迎合慈禧旨意，采取妥协投降方针，终于酿至甲午战争的惨败，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

甲午战争之后，国内民众的反抗怒火愈加炽烈，巨额赔款造成的经济危机日益严重，外患有增无已，长此下去，势必“国将不国”。光绪一方面“不欲为亡国之主”，使祖宗基业在他手中断送，另一方面极力要摆脱慈禧的控制，把朝政大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因此，光绪逐渐下定改革图强的决心。而要改革图强，只有依靠改良派。在改良派的支持下，1898年6月17日，光绪召集全体军机大臣，“下诏定国是”，宣布变法。这个诏书史称“明定国是”诏。新政从这一天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为止，共实行了103天，历史上称作“百日维新”。

在这一百天中，光绪发布了近180条诏令。主要内容有：一，改革考试制度，废除八股，改试策论；二，设立学校，筹办京师大学堂；三，派人出国留学、游历；四、保护和发 展农工商业，设立农工商部；五、提倡开办实业，奖励新发明、新创造；六、设立铁路、矿产总局，设立邮政局；七、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八、精简机构，裁汰冗员；九、编练新式海、陆军；十、选拔，任用通达时务的人才；等等。

为了推行新政，首要任务是引荐人才。6月16日，光绪第一次召见康有为，商讨和确定变法的步骤与措施。召见在颐和园仁寿殿举行。康有为问光绪道：“皇上既然知道非变法不可，为什么长久没有举动，看着国家危亡？”光绪防人偷听，注视了一下帘外，叹口气说：“我受到种种牵制，不能放手干。”康有为明白了皇上的意思，建议变法新政“不必尽撤旧衙门，只须增设新衙门，不必尽撤旧大臣的职，只要擢用有才干的官员，多多接见维新志士”。康有为的建议显然是为了减少顽固派对实行新政的阻力。然而从这里可以看到，维新派从一开始就是妥协的、软弱的。接见以后，光绪因顽固派阻挠，只授予康有为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即办文稿的六品小官，但可以“专

折奏事”，以后康有为有奏折可直呈皇上。7月，梁启超以布衣破例召见，赐六品衔，办理大学堂和译书局事务。9月5日，光绪帝特别赐给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等4品卿衔，担任军机处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与此同时，光绪将阻挠变法的顽固派、慈禧亲信、礼部尚书怀塔布等6个大臣革职，将李鸿章等也赶出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随着变法运动的深入，形势发展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光绪在斗争中也增添了许多勇气和才干。

然而顽固保守势力更为强大。以慈禧为首的后党密切关注推行新政事态的发展，同时采取了一系列阻扼、压制维新派的措施。6月15日，即“明定国是”诏颁布后4天，慈禧迫使光绪下令免去翁同龢军机大臣职务，并驱逐出京。同时宣布，以后凡新任职的二品以上大臣，须到太后面前谢恩，这项谕命等于是把人事大权重新掌握在自己手里。接着，慈禧又逼令光绪任命她的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加文渊阁大学士衔，统率董福祥（甘军）、聂士成（武毅军）、袁世凯（新建陆军）三军。与此同时，慈禧又派亲信掌握了北京城内外和颐和园的警卫权。

慈禧毕竟比光绪老练和狡猾。

当光绪为推行新政，涉及到罢免顽固派，任用维新志士等人事问题时，双方的矛盾尖锐化了。怀塔布被撤职，通过他的妻子到颐和园向太后哭诉，说皇上听信维新派意见，要“尽除满人”。慈禧早就对维新派不满，对光绪的离心有了警觉。现在光绪动了“真格的”，撤掉了她的班底——以怀塔布为首的六部堂官，她认为政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她一面向光绪发出警告，不要“以远间亲，以新间旧”，一面派怀塔布等去天津与荣禄密商。荣禄立即将聂士成武毅军调驻天津，命董福祥甘军移驻长辛店。

光绪已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9月14日，光绪到颐和园向太后请安，慈禧太后颜色迥异寻常，格外冷峻，光绪自知有变，急忙诏见杨锐，要他将拟好的一封密诏立即交给康有为。诏上说，朕位难保，要康等设法相救。康有为等面对政变阴谋，束手无策，只有把希望寄托在英、日干涉和袁世凯身上。康有为到英、日使馆乞求支持，没有结果，只好向光绪推荐袁世凯。袁世凯早年投靠淮军将领吴长庆，1895年，几经钻营，以道员衔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建陆军，逐渐拥有一支7000人的新式武装。袁世凯善于看风转舵，在维新运动高涨时，曾加入过康有为组织的强学会，现在情势危急，维新派把宝押到了他身上。

9月16日，光绪召见袁世凯，主要是摸底，未谈实质问题，授予他侍郎衔，专办练兵事宜。召见出来，袁世凯却立即去拜访顽固派刑部尚书刚毅等，与保守派拉关系。9月17日，光绪再次召见袁世凯，这次态度比较明确，要袁世凯与荣禄“分开办事”，袁世凯表示“谢恩”，可是出来后又马上钻入庆亲王奕劻的府邸。维新派对袁世凯的两面行为没有警觉，9月18日深夜，谭嗣同只身前往袁世凯寓所，劝袁世凯拥护光绪，杀掉荣禄。袁世凯表面对光绪表示忠诚，同时借口事机紧迫，赶回天津。9月19日，慈禧从颐和园回宫，荣禄同时化装入京，与慈禧密谋后返津，随即聂士成部进驻北京。9月20日，光绪第三次召见袁世凯，袁世凯当面表示忠于皇上，召见出来，却立即赶往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即将光绪给袁世凯密谕，及谭嗣同等要包围颐和园情况密告慈禧太后。

9月21日清晨，当光绪皇帝到中和殿阅览祭文时，一群侍卫太监和一队荣禄手下兵士，闯入殿中，声称奉太后命，将光绪押到中南海的瀛台看管起

来。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戊戌政变。与此同时，谭嗣同、杨锐、刘光第、康广仁、林旭、杨深秀等被捕，康有为早一天离京赴沪，在英国保护下逃往香港，梁启超在日本人掩护下，由天津去日本。谭嗣同拒绝了友人要他逃走的劝告，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9月28日，谭嗣同等6人被杀于北京菜市口。

改良主义的变法维新运动失败了。

庚子之变

戊戌变法之后又过了两年，是农历的庚子年（1900年）。在这一年，发生了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事件，这一事件被称为“庚子之变”。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与义和团运动有关。

“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义和团运动首先兴起于山东，不是偶然的。山东是帝国主义侵略者激烈争夺的地方。在甲午战争中，山东人民备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恶浪，又最早从这里掀起。1879年底，德帝国主义在沙俄支持下，出兵强占山东重要港口胶州湾；第二年，把山东划为它的势力范围。1898年，英国强租威海卫，圈占文登、荣城两县地方，强迫界内农民纳税，推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帝国主义在这里修铁路，开矿山，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山东地区教会势力也异常猖獗。19世纪末期，山东共有大小教堂1300多处，教士150多人，教民8万多人。教士、教民依仗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盗窃情报，霸占田产，包揽词讼，拐骗妇女，作恶多端，老百姓深受其害。可是清政府的大小官吏却匍匐在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脚下，庇护教士，压迫民众，“护教抑民”。

人民群众控诉无门，只有挺身反抗，自动组织起来，捍卫自己的身家性命。

义和团，原名义和拳，是民间反清秘密结社的一种。早期的民间秘密结社，原以反清复明为己任。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日益严重，与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超过了与清政府的阶级矛盾，义和拳也就以“杀洋灭教”作为自己的目标。“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1898年10月，山东冠县发生了以赵三多、阎占勤为首的义和拳武装起义，首先举起“助清灭洋”的旗帜，揭开了义和团运动的序幕。义和拳改称义和团，最早见于1898年6月山东巡抚张汝梅的奏折，1899年夏，继任山东巡抚毓贤发布的告示将义和拳改称义和团，从此义和团的名称流传开来。

与赵三多起义同时，以朱红灯、心诚和尚为首，在茌平、高唐、长清和平原地区，也开展了义和拳的反洋教斗争。1899年10月，平原县杠子李庄拳民遭受平原县令蒋楷镇压，拳民6人被捕，朱红灯率领高唐等县义和团前来援救，严惩了恶霸地主李金榜等十几家不法教民，冲进教堂，并严令蒋楷释放被捕拳民。蒋楷闻讯，率步骑100余人前去镇压。朱红灯头戴大红风帽，身着红裤，拳民手执红旗，刀枪上饰以红布，在“兴清灭洋”的大旗下，列队迎战。蒋楷被打得抱头鼠窜。义和团取得初步胜利，声威大振。蒋楷向山东巡抚毓贤告变求救。毓贤派济南知府卢昌诒率大队步骑，前往平原县镇压。

结果在森罗殿又被义和团打得大败。平原战斗后，朱红灯率领义和团转战禹城、长清、茌平等地，向教会发起一次又一次冲击，并接连打败前来镇压的清军。这年12月，朱红灯、心诚和尚不幸被捕，惨遭杀害。

但是义和团运动却以更猛烈的声势蓬勃发展。从山东到直隶，到处燃起了义和团反抗斗争的怒火。在天津，至迟在1899年春天，已开始组织义和团。到5、6月间，天津已是神坛林立，大街小巷，都竖起冶炉，铸造刀枪。义和团以“灭洋”为己任，提出“先练义和拳，后练红灯照，杀了洋鬼子，灭了天主教”的口号。1900年春天，北京开始有义和团的活动。6月中旬，北京附近各县的义和团，头裹红巾，手持大刀、长矛，结队进入北京城。北京城内设坛800多所；满街都是反帝的揭帖，“灭洋”的旗帜，参加义和团的群众，达10万人。整个北京城都已处在义和团的控制之下。

义和团在直隶、京津地区的发展，引起帝国主义列强的恐慌。各国驻华公使，一再向清政府施加压力，逼令它用严厉的手段镇压义和团，同时开始策划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面对义和团和帝国主义势力两方面的压力，清政府表现出举棋不定。以慈禧为代表的腐朽集团，因为在废黜光绪和立嗣等问题上，得不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对帝国主义心怀不满，产生了利用义和团的想法。因此，清政府对义和团，是剿、抚并施。招抚的结果，使团民大量涌入北京。

帝国主义鉴于清政府已无力控制形势，便开始了赤裸裸的武装干涉。1900年6月10日，英、法、日、俄、德、美、意、奥八国，拼凑一支2千余人的侵略联军，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下，由天津乘火车向北京进犯。在行进当中，沿途受到义和团和清军爱国官兵的拦阻和袭击。14日晚上，侵略军进到廊坊时，被义和团所包围。义和团不顾机枪扫射，直逼火车。侵略军被围困在廊坊车站，进退两难。18日，当侵略军从廊坊车站撤退，准备改由杨村水路进犯北京，义和团与董福祥甘军再次猛攻敌军。在枪林弹雨中，义和团战士争先恐后，勇猛拼杀，杀伤敌人多名。西摩尔被迫率部逃奔杨村，又遭到义和团与聂士成部的攻击，死伤近40人。西摩尔哀叹“进京之路，水陆俱穷”，只好撤回天津。

当西摩尔联军在廊坊遭到阻击时，列强海军向大沽炮台发起进攻。大沽炮台守将罗荣光率部英勇还击。经过6个小时的激战，大沽失陷。各国侵略军从大沽纷纷登陆，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战争。7月14日，天津在经过义和团近一个月的英勇奋战之后，被侵略军攻陷。8月4日，八国联军近2万人，从天津出发分两路向北京进犯。8月14日，联军攻入北京。8月15日凌晨，当联军进攻皇城东华门时，慈禧太后惊慌失措，急忙带着光绪皇帝、皇后、太监李莲英、大阿哥等从西华门仓皇出逃。临行前，慈禧太后命太监将不驯服于她的光绪妃子珍妃，推堕井中淹死。慈禧行经怀来、宣化、大同，奔太原，一直逃亡到西安。

八国联军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疯狂地进行烧杀抢掠，显露出无比凶残、贪婪、野蛮的强盗面目。联军攻陷北京后，首先是对义和团和一般百姓进行疯狂的报复。他们“毁门而入，见人就杀”，或路遇中国人，就把他们逼进一条“不通小巷，机关枪即轰击于陷阱之中，直至不留一人而后已”。德国侵略军奉命：在作战中，只要碰着中国人民，无论男女老幼，一概格杀勿论。其次是抢劫。联军司令部公开命令全体官兵抢劫3天。从公使、各级军官、教士和普通士兵，无一例外地都参加了抢劫。皇宫，颐和园所珍藏的大量珍

贵的历史文物：珍宝金银，包括《永乐大典》等数万册珍本图书，均被抢劫一空。日军从户部抢去 300 万两银子之后，立即放火烧房，毁灭罪证。事实上，联军在整个占领期间，抢劫没有一天停止过。它如焚烧房屋，奸淫妇女，种种暴行，令人发指。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后，清政府委派李鸿章与联军进行和议谈判。12 月底，帝国主义方面经过一番争吵之后，抛出《议和大纲十二条》，基本上确定了后来条约的主要内容。慈禧太后看到大纲，见大纲上没有把她列为罪魁祸首，仍能保持她的地位，竟然感激涕零，立即下令给李鸿章：“所有 12 条大纲，应即照允。”

1901 年 9 月 7 日，庆亲王奕劻与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同英、俄、美、法、日、德、意、奥、西、比、荷 11 国代表，在北京签订了《辛丑和约》：中国赔款 4 亿 5 千万两白银；在北京东交民巷设立使馆界；拆除大沽和北京至大沽沿途炮台；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入任何反帝组织，等等。

1901 年是辛丑年。《辛丑条约》是又一个空前严重的丧权辱国的奴役性条约。它把卖国的清政府再一次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孙中山与同盟会

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重大发展，也是孙中山前期革命活动的最重要成果。

孙中山（1866 年—1925 年），名文，字德明，号逸仙。因留居日本期间曾化名为中山樵，所以又名中山。1866 年 11 月 12 日，他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县）翠亨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父亲孙达成靠租种的二亩半田，维持一家生计。孙中山的哥哥孙眉 15 岁给别人做长工，1871 年只身到檀香山谋生，先在一家菜园做工，又到一个牧场做雇工，后来开垦荒地，经营畜牧业，开办商店，兼营酿酒、伐木，逐渐成了一个资本家。

孙中山自幼参加农业劳动，刚 6 岁，跟随姐姐上山砍柴，稍长，下田插秧、除草，干许多力所能及的农活。10 岁时，家里把他送到本村的一个私塾读书，在那里，他常听太平军的一个老战士冯爽观讲述太平天国的故事，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在他心目中留下很深的印象。

1878 年 5 月初，孙中山跟随母亲一起，从香港乘轮船，来到檀香山，依赖哥哥孙眉生活。他起初在茂宜岛茄荷雷埠他哥哥开设的店铺当店员，第二年，他哥哥送他到火奴鲁鲁基督教监理会所办的意奥兰尼学校（男子中学）读书。1882 年毕业。他在这里学习到许多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基础知识。之后，他又进入美基督教公理会设立的奥阿厚书院（高级中学）读书。在这里，他受到基督教义所宣扬的平等、博爱思想影响，热衷读《圣经》，甚至想入教，他哥哥不愿他加入基督教，便中止他的学业，把他送回老家。

在檀香山的学习、生活经历使孙中山产生了“改良祖国，拯救同群”的愿望，他决心要“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回家后，一面帮家庭做些劳务，一面在村里宣传改革，抨击清政府腐败政治与落后习俗。有一次，他与同伴竟然把村里北极庙的北极帝君捣毁了，乡里的绅士们大为恼火，孙中山在乡里呆不住了，便去了香港。他进入中央书院（香港殖民当局办的中等学校）学习。

1884年11月，他哥哥孙眉又要他去檀香山，仍然让他到茄荷雷埠做店员，孙中山不满意这种生活，私自回了老家，继续入中央书院读书，1886年夏天，他完成了中学学业。这时，他对前途可以有多种选择，但他选择了“救人之术”，决定学医。他进入香港西医书院学习。在5年的学习期间，他除了刻苦钻研医学，还广泛研读了西方政治、军事、历史、物理、农学等方面著作，特别爱读《法国革命史》，达尔文《物种起源》。课余，他致力于革命的宣传，经常来往于香港、澳门之间，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

1892年7月，孙中山以“最优异”的成绩，从西医书院毕业。他曾在澳门独立行医，可是受到葡萄牙医生的排挤，于是回到广州开设东西药局。他的医术高明，尤其擅长外科和治疗肺病，态度又热情，来求医的病人非常之多。但是，国内政治的黑暗和帝国主义不断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使孙中山认识到“医术救人，所济有限”，他认为医国比医人更重要，决心“借医术为入世之谋”，因此在行医的同时，广泛结交爱国志士。不过这时候他的主导思想还是改良主义，寄希望于朝廷大臣。1894年夏天，孙中山经上海，来到天津，写了一封8000字的《上李鸿章书》，想面交作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信中提出以西方资产阶级国家为楷模，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发展工农业生产，使工商业摆脱封建束缚，改革教育制度和选拔人才制度，等等。李鸿章对他不予理睬。孙中山开始认识到，改良主义在中国行不通。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更使他惊醒，他已认识到“和平方法无可复施”，他已下定用“强迫”即革命的方法来改造中国的决心。

1894年10月，孙中山从上海经日本赴檀香山，在2万多华侨中宣传革命思想。11月，他联合了20多人，创立了革命团体——兴中会。11月24日，在火奴鲁鲁美商卑涉银行华人经理何宽的寓所举行了成立大会，会上，通过了孙中山起草的《兴中会章程》。这个章程充满强烈的爱国情绪，它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所造成的民族危机，谴责清统治者的昏庸无能，号召人们起来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振兴中华。在会场上，每个与会的人都填写了入会盟书，并举行秘密宣誓，誓词中明确写道：“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它第一次提出了推翻清政府、建立欧美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个纲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正式开始了。

1895年1月下旬，孙中山由檀香山回到香港。2月21日，在中环士丹顿街13号建立了兴中会总机关，之后，孙中山来到广州，建立了广州兴中会，同时开始筹集军费，召集宋居仁等组织兵操队，积极准备武装起义。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定，孙中山认为时机已到，立即筹备以暴力推翻清政府。他先在广州成立“农学会”，作为掩护机关；同时决定10月26日炸毁两广总督署，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陆皓东还设计了青天白日旗。可是在10月25日晚，起义活动被清政府察觉，两广总督谭钟麟破获了起义机关，大批革命党人被捕，陆皓东等英勇牺牲，孙中山被通缉，起义流产了。

10月27日，孙中山东渡日本。在横滨，孙中山剪掉了辫子，表示了反清的决心。此后，孙中山先后赴美国旧金山、芝加哥、纽约联络华侨，继续宣传革命。在英国伦敦，孙中山被驻美公使龚照璠绑架，龚照璠企图把他装入木箱，偷偷运回国内杀害。孙中山通过使馆一个英国女工，透露信息给英国报界，引起社会舆论大哗，结果在英政府干预下被释放。孙中山在英国逗留一年，潜心研读和从事著述，他进一步研究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也

接触了有关社会主义运动学说，考察了英国社会经济情况，看到了英国工人的罢工，在他脑海里，产生了民生主义社会经济观点。

1897年7月，孙中山回到日本横滨。1900年，孙中山又派郑士良在惠州组织了起义，起义军坚持了半个月，因弹尽援绝而失败。此后，孙中山开始把注意力转向觉悟的知识分子，他在东京青山秘密创办革命军事学校，以培养军事人才。

从1902年到1905年，孙中山作了一次环球旅行，到处在华侨中宣传革命思想，发展革命组织，进一步扩大革命的影响。与此同时，在国内，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在上海、东京两地，兴起办革命刊物的热潮，随着革命思想的传播，出现了以黄兴为首的华兴会，以蔡元培为首的光复会，在湖北武昌，成立科学补习所。革命形势的发展，提出了统一组织、统一领导的客观要求，同盟会随之应运而生。

1905年夏，孙中山从欧洲到达日本，受到中国留日学生和各革命团体热烈欢迎。在孙中山倡议下，各革命团体决定联合。7月30日举行了筹备会议，孙中山提议定名为中国革命同盟会，讨论结果，简称为中国同盟会。孙中山又提议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有些人对“平均地权”表示怀疑，经孙中山解释后获得通过。

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孙中山被选为总理。这样，一个具有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性质的革命组织建立起来了，它成为当时领导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武昌起义

1911年10月10日，在湖北省武汉市的武昌城，爆发了由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领导的武装起义。经过一夜的苦战，革命武装攻占了湖广总督衙门，清湖广总督瑞澂（音 chéng）惊慌逃走。翌日清晨，武昌黄鹤楼顶高高飘扬起一面深红底色的九角十八星旗，起义成功了。武昌起义犹如一声惊雷，震响在祖国中部长空，它激发了全国性的革命潮流。在滚滚硝烟中，中国3000年的封建帝制，清王朝268年的残酷统治终于被彻底埋葬了。1911年，按阴历是辛亥年，因此历史家把由武昌首义引发的这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称为辛亥革命。

说起武昌起义的胜利，的确来之不易。

在武昌起义之前，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曾在国内发动过一系列的武装起义，如1906年的萍乡、浏阳、醴陵起义，1907年5月至1908年4月在华南沿海和沿边地区的起义，1910年2月的广州起义，1911年4月的黄花岗起义，等等，这些起义都失败了。起义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原因显然与革命力量相对薄弱有关。尽管一系列的起义都遭致失败，但革命党人前仆后继、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却是非常可贵的，它不断给后人以鼓舞。

武昌起义正是在一个特殊的环境和背景之下，由于革命党人发扬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终于取得了胜利。

武汉号称“九省通衢”，是长江中游重镇，在鸦片战争之后，自然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争夺的重点。1861年，根据屈辱的《北京条约》，汉口正

式对外开放，英、美、俄、法、日、德、意、比、丹、荷、瑞典、墨等国纷纷来汉设立领事馆，并相继建立租界。随着租界的建立，外国商人纷纷来汉开设银行、办工厂、开洋行、辟航运、兴学校，对武汉及湖北地区进行经济掠夺。另一方面，清政府的一些上层统治者为了挽救自己的衰颓命运，开始兴办洋务，张之洞就是其中之一。1889年，他出任湖广总督，开始了大力兴办洋务的活动，如1889年，建起了湖北枪炮厂、湖北炼铁厂，1890年起，建起了湖北丝麻四局等等。与此同时，张之洞深感培养人才的重要，便大力兴建新型的学堂、书院，并派遣留学生。到1904年，湖北派往德、法、英、美等国留学生达83人，派往日本的留学生达289人，占全国第一位。除此之外，张之洞还组建了湖北新军，聘任德国军官任总教习，使用新式武器装备，为了提高军队素质，征召有文化的青年入伍，并开设军事学校，培养掌握近代军事技术的军官。

张之洞的种种洋务新政，本意是要借以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专制制度，然而事与愿违，西方近代文化科学知识和资产阶级进步社会学说，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具有爱国热情的青年知识分子吸取了西方的进化论、民权论、民约论，以及民主共和思想，走上了反满革命道路，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张之洞苦心经营的湖北新军，最后也成为推翻清王朝的中坚力量。

武汉是一个富于革命传统的城市。1905年，汉口铜货业、手工业工人3000多人举行罢工，反对资方减发工资，1908年5月30日，汉口爆发后湖反清斗争。在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的烈火中，革命党人的组织便应运而生了。

1904年春，武汉第一个革命组织——科学补习所在武昌成立。革命组织把新军作为进行革命活动的主要对象，它把许多成员输送入伍。1907年，在许多革命小团体分化，重新组合的基础上，成立了文学社和共进会。文学社由蒋翊武任会长，共进会主要负责人为孙武。文学社社员多分布在新军中，人数达5000人之多。

1911年5月1日，黄花岗起义失败的消息传到武汉，起义虽然失败，但革命先烈的奋发精神使革命党人深受鼓舞。这时四川正在兴起保路风潮，因此，湖北革命党人决定利用这个时机，在武汉发动起义。9月1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正式实行联合。9月24日，在武昌胭脂巷11号，由孙武主持会议，制定了起义计划，决定成立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蒋翊武任总指挥，孙武任参谋长，定于这年中秋（10月6日）举行起义。

1911年10月9日下午，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政治筹备处作起义前准备工作，在装填炸药时，炸弹突然发生爆炸，一时间浓烟滚滚，孙武面部和右手烧伤。俄国巡捕房巡捕听见爆炸声，立即赶来。孙武等人虽已撤走，但宝善里机关被抄查，起义计划败露，旗帜、文告、名册被抄走。俄国驻汉总领事马上将此事通知了瑞澂。瑞澂大为惊恐，立即宣布全城戒严，同时按照名册、地址搜捕革命党人。当晚，杨洪胜在自己的小杂货店被捕，蒋翊武、彭楚藩、刘复基等在武昌小朝街85号起义总指挥部被捕。蒋翊武乘机逃脱，彭楚藩等被押至总督署，瑞澂命令连夜审讯。刘复基是指挥部的军事筹备员，号称“小诸葛”，他足智多谋，整个的起义计划就是他起草的。彭楚藩在指挥部任侦查，杨洪胜任交通，也都是起义的骨干。清兵军事参议官铁忠首先提审彭楚藩。彭楚藩在敌人面前傲然屹立。铁忠大怒，咆哮道：“你是何人，怎么不跪下！”彭楚藩冷冷一笑，说：“我是革命党人，你好大狗脸，我岂肯跪你！”看守将彭楚藩推坐在地上。铁忠又问：“你为何要革命？”

彭楚藩愤怒指斥道：“大好江山，被你们主奴蹂躏，破坏，断送，为何不要革命！”铁忠无言以对，稟明瑞澂，判以斩刑。接着提审刘复基，刘复基自认革命不讳，大骂清官吏无耻，铁忠报告瑞澂，瑞澂连声说：“杀！杀！杀！”杨洪胜脸部受伤，焦如黑炭，不等清官吏提问，怒吼道：“我是革命党，你们杀吧！你们奴才们的末日就要到了！”10月10日凌晨，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人在督署东辕门被斩首。为了纪念三位烈士，今日武昌有一条以三位烈士的姓命名的路，叫彭刘杨路。

革命机关被破坏，大批革命党人被捕，彭、刘、杨三位烈士被害，形势十分危急。但由于革命党人在新军中做了长期扎实的工作，革命的士兵群众没有畏惧退缩，在失去指挥机关的紧急情况下，自行联系，坚决果断地发动了武装起义。

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革命党代表熊秉坤率领全营革命士兵首先发难，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熊秉坤等打死了9个反动军官，立即带领40余名士兵，进攻楚望台军械库。当晚守卫楚望台军械库的是革命党人罗炳顺等，因此军械库迅即被占领。这时，工程营的其他士兵以及步、炮、辎重各营和军事学堂学生也相继聚集到楚望台。起义队伍临时推举原日知会员、左队队官吴兆麟担任总指挥。吴兆麟进过参谋学校和军官讲习所，懂军事，在营里很有威信。吴兆麟受任后，立即部署向总督署发起进攻。

总督署位于武昌城西南角，文昌门与望山门之间，有负城郭，左邻市街，紧靠大江，后屏围墙，是一处易守难攻的军事据点。当夜守卫督署的兵力有3000人，瑞澂便凭借这股精锐力量，负隅顽抗。为了捣毁总督署，消灭反动力量，革命军向督署发动了三次大规模进攻，战斗十分激烈。进攻督署的战斗，仍以工程营为主力。革命军兵分三路，三面夹击总督署。在炮队的支援下，革命军经过殊死的战斗，终于攻破了督署的大门，瑞澂见势不妙，凿开督署围墙，慌忙登上楚豫兵舰，逃往汉口去了。

此时，天已大明，经过整整一夜的浴血激战，革命军占领了武昌城，武昌起义胜利了。

